

海峡教育研究

Cross-strait Education Resear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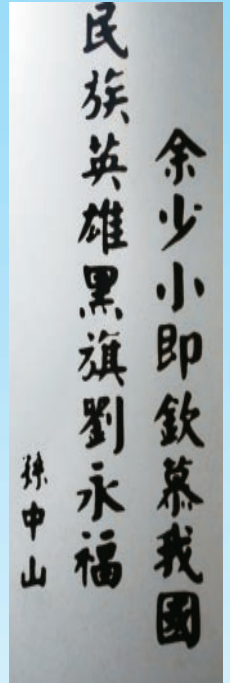


海峡两岸职业教育的共同发展
朱熹与莆田名儒陈俊卿的交往
儒家集会中合唱诗歌的传统
元代福州摩崖石刻考述
“四书译注”的若干特色

2017.2 季刊

抗日保台英雄刘永福故居

刘永福(1837-1917)，广西钦州人。1883年，率黑旗军参加中法战争，屡次大败法军，威名远扬。甲午战争期间，赴台与日军激战，是著名的抗日保台英雄，在海峡两岸关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刘永福故居“三宣堂”位于钦州市板桂街，其晚年在这里度过。



新权 摄



海峡教育

海峡两岸职业教育的共同发展 / 杨竣宇 2
比特实验室的创办与小学教育的创新 / 王 强 8
加强中职学生网络德育的策略 / 胡智华 郑志鸿 李廷诚 12



海西文史

朱熹与莆田名儒陈俊卿的交往 / 黄新宪 19
陈寿祺对林则徐的影响 / 萧忠生 34



闽学研究

《朱子家礼》的化民成俗作用 / 黄柏翰 43
儒家集会中合唱诗歌的传统 / 袁鑫恣 刘 刚 48



区域文化

元代福州摩崖石刻考述 / 詹建林 54
尤溪县桂峰村文化建设中传统文化的价值 / 胡志明 60



教育史苑

蔡元培与国文教育改革 / 颜 禾 70



纸上博物馆

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 / 丁清华 78



海峡书评

“四书译注”的若干特色 / 骆承烈 84



光影世界

抗日保台英雄刘永福故居 封二
兴安灵渠 封底





海峡两岸 职业教育的共同发展

■ 杨竣宇

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持续增强、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国际化时代，为大力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贯彻好“一带一路”所倡导的互惠共赢原则，国家需要大量适应性强、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以满足国际市场需求，顺应国际环境变化，从而提升综合国力。这同时也表明，职业教育发展正进入新的黄金时期。由此，应当促成海峡两岸职业教育的共同发展。

关键词 海峡两岸 职业教育

作者 杨竣宇，厦门大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厦门 361000）

长期以来，台湾通过职业教育，培育量多质精的技职人才于各产业，在促进产业升级中扮演重要角色。台湾职业教育吸收先进国家在职业教育上的成功典范，转化为符合华人社会的职业教育政策与制度，诸如实施现代学徒制中的双轨旗舰计划、轮调式或阶梯式建教合作等，有相当成功基础可供参考。同时，在职业教育的精致化、国际化、优质化方面，以及台湾正实行的“技职业教育再造工

程第二期计划”，都有值得借鉴的经验。

近年来，福建省的部分应用型本科、高职院校等与台湾高校建立长期可持续性的合作，在不断加深合作的过程中吸取借鉴台湾职业教育的许多办学经验，使福建省职业教育办学水平得到良好提升。

福建省颁布《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若干意见（闽政〔2015〕46号）》《福建省人

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若干意见实施细则（闽政办〔2015〕129号）》《福建省促进闽台职业教育合作条例》等，以积极推动职业教育建设及闽台职业教育深化合作，闽台职业教育的合作交流被推到了新的高度。

在这些利多背景下，台湾知识库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台湾师范大学，通过成熟高效的产学研合作机制，由台湾知识库规划提案，申请成立“两岸产学研联盟启航计划”，并成立台湾师范大学两岸产学研教育中心，设立联络办公室于福建省厦门市，以此适应两岸职业教育交流对接的需求，承接两岸职业教育合作共建的任务。

台湾师范大学是台湾知名大学，现有教育、文、理、艺术、科技与工程、运动与休闲、国际与社会科学、音乐、管理等9个学院。根据英国QS世界大学排名，其世界大学综合排名为前500名，2011年亚洲大学综合排名87名，2012年亚洲大学综合排名64名。2013年教育类世界大学排名前50名，2014年教育类世界大学排名42名，2015年教育类世界大学排名22名，列两岸大学教育类排名前列。

台湾师范大学近年来广泛与台湾各集团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产学研合作是指将高校的研究实力、科研成果、优质人力等软性技术，向产业进行输出，解决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技术瓶颈或市场问题。高校的专家团队可以是战略顾问、技术问题解决者、生产管理规划者，是现代知识经济时代下“知识有价”的最佳体现。

台湾知识库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以“传动知

识、创造价值”为核心价值；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使命；以“全球华人第一品牌文化教育事业”为愿景，致力于打造有教无类的文化教育第一品牌。台湾知识库还开发各领域的教育课程与平台系统，从幼儿至老年，从个人至企业，都可进行学习与进修。以新科技的开发，打破时间、地点限制，提供让所有人皆可享有随时随地学习的最佳体验。

台湾有精致完善的职业教育内容和实践成果，大陆有广大待开发的职业教育应用市场，两者存在优势互补。有感于两岸职业教育发展前景与契机，台湾知识库联合台湾知名学会和协会，与台湾师范大学工业教育系联合推动实施“两岸产学研联盟启航计划”，促进两岸教育技术与资源的合作，将台湾成熟优质的教育内容转化成大陆可用之模式，共同创造产、学、研、训双赢之局面。

台湾在2008年邀请众多职业教育学者、校长、专家，通过8次咨询会议，深度研讨职业教育改革方向与具体措施。后再经一年的论证与修正，规划启动“台湾技职业教育再造方案”，提出3大目标、5大面向、10大具体实施策略。又在2013年实施第二期台湾技职业教育再造计划，于2017年底结束。实施第二期计划的目的是希望职业教育院校学生具有立即就业的能力，为产业提供优质技术人力，改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看法，最终提升台湾职业教育的整体竞争力。第二期计划将执行策略调整为3个面向、9项策略。制度调整面向：政策统整、系科统整、实务选才；课程活化面向：课程弹性、设备更新、实务增能；就业促进面向：就业接轨、创新创业、证能合一。



厦门—台湾现代化职业教育论坛



海峡两岸职业教育研讨

福建省的职业教育起步稍晚，2006年教育部和财政部正式启动《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位列计划名单内的福建高职院校有2所。在2010年《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计划的意见》中，福建省共33所中职学校列居其中。福建省于2015年11月印发《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福建省示范性现代职业院校建设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正式开启福建省职业教育后期示范校建设的大门。在通知中，规划9项建设项目、36项建设要素、90个建设要素内涵指标，为院校专业建设提出明确方向与内涵要求。比较台湾第二期技职业教育再造计划与福建省示范性现代职业院校建设工程实施方案，发现双方有许多可相互参考学习之处，有许多经验可供借鉴。

Lassar(1996)认为，技术能够通过共享达到价值倍增的效应，而企业技术合作创新是实现技术共享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是企业建立持续竞争优势的可靠保障，这将成为许多企业技术创新的一种新模式。罗炜、唐元虎（2000）提到合作创新通常以追求合作伙伴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以资源共享或优势互补为前提，有明确的合作目标、合作期限和合作规则，合作各方在技术创新的全过程或某些环节共同投入，共同参与，共享成果，共担风险。合作创新一般集中在新兴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以合作进

行研究开发为主要形式。产学合作在全球各地已被证明是知识经济时代下，实现知识驱动创新并创造经济利益的有效策略。产学合作的初衷，是希望在市场运作机制下，有效推动高校或研究机构与企业集团的优势合作、共同发展，在产学合作的模式下，企业可专注于市场机会的寻找与突破，将技术瓶颈及产品研发交由高校或研究机构协助完成，进而提升企业的研发实力，也助推高校及研究机构的科研成果能够得到市场应用的价值。

“两岸产学联盟启航计划”于2016年启动，后期包括造舰计划、旗舰计划、引舰计划，通过阶段性任务的实施，逐步推动两岸职业教育合作共建机制的形成。各阶段计划重点内容如下：（1）启航计划。做好顶层设计的环



第二届闽台现代职业教育论坛

节，成立台湾师范大学两岸产学教育中心，进行推广，制作产学合作计划文宣材料，成立计划推动小组，设立产学合作计划推动办公室于福建省厦门市。中心主要依托欧美先进国家技职业教育理念、研究成果和台湾职业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推动两岸技职学校在课程教材、师资培育、课题研究、创新创业等方面的产学合作。最终，借助产学合作促进两岸青年职业技能素养的全面发展和职场专业水平提升。通过国际证照课程体系的开发与导入，辅助两岸青年获取国际专业证照，以接轨国际职业人才标准，培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人才。在启航计划阶段，台湾师范大学两岸产学教育中心主动承担举办两岸现代化职业教育论坛，协助福建省各中高职院校在“福建省示范性现代职业院校建设工程”的建设内容上进行规划建设，特别针对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职业教育信息化等领域，提供成功经验。台湾师范大学两岸产学教育中心规划提供优质化、特色化、创新化的院校专业建设服务内容。如优质化的教育质量确保工程、优质化的现代职涯辅导咨询、优质化的现代精致管理标准；特色化的教师专业精进计划、特色化的国际认证辅导模式；创新化的双创课程共建与教学、创新化的工作导向课程设计与

教学。（2）造舰计划。旨在促进福建省各中高职院校在“福建省示范性现代职业院校建设工程”实施中的适应性，持续举办有利两岸职业教育交流合作的教育论坛，承接福建省教育厅“第四届海峡两岸应用技术类大学校长论坛”活动，将服务对象由福建省中高职院校延伸至福建省应用技术类本科院校。同时，规划筹组两岸职业教育智库组织，使智库具有政策建言的功能，吸收两岸权威专家、研究人员、校长、骨干教师等热衷于职业教育建设的教育人士，共同为职业教育政策的引领提供宝贵意见。（3）旗舰计划。将本计划在福建省的成果进行汇总，并对他省进行输出推广，重点服务教育资源落后地区，包含陕西、广西、内蒙、新疆等地。让这些教育资源稀缺的区域也能获取优质的职业教育内容，并通过职业教育发展，培育优质技术人才，带动当地产业经济的起飞。（4）引舰计划。将两岸职业教育合作成果加以总结，联合两岸职业教育权威机构、高校、社会团体等，共同将职业教育内容资源向国际进行推广与输出，并力争使之成为国际标竿。

两岸产学联盟启航计划实施以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举办2016年厦门与台湾现代化职业教育论坛。此次



注重创新的台湾现代职业教育



师生交流

论坛于厦门市信息学校举办，邀请福建省教育厅、厦门市教育局、福建省教育学会、厦门市教育学会共同举办。论坛邀请到70余所福建省内中高职院校，参与院校领导干部人数达180位。通过专家沙龙对话、主题演讲等活动，两岸专家深度交流探讨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并提出展望。论坛强调借鉴台湾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先进理念，以及台湾职业教育再造等成功经验，加速福建省现代职业教育建设进程，促进福建省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快速培养。在论坛中，深度探讨引进国际权威的职业技能认证证书与课程，两岸广泛开展职业技能大赛等项目，分析研究两岸联合办学、托管等模式，促进双方校校、师师、生生高度互动。论坛邀请的台湾嘉宾有：台湾教育大学系统总校长吴清基先生，台湾私立科技大学院校协进会第七届理事长葛自祥先生，台湾师范大学工业教育系原主任李景峰先生，台湾师范大学技术与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戴建耘先生，台湾铭传大学教育研究所教授谢念慈先生，台湾健行科技大学企管系教授苏景进先生。大陆嘉宾有福建省教育厅、厦门市教育局、厦门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

举办2017年闽台现代化职业教育论坛。在2016年论坛的基础上，此次论坛进一步上升至省级活动，邀请

了福建省30余所应用技术类本科大学校长共襄盛举。论坛内容更加立体化，涉及层面包含应用技术类大学30余所、高职高专院校与中职中专院校70余所，参会人数达到300人以上。有针对性地设计三个分论坛，分别是应用技术类大学分论坛、高职高专院校分论坛、中职中专院校分论坛。分论坛的设定是以参会人员所属单位的差异而定，分论坛的设计能让讨论内容更有针对性与可操作性。此次论坛主题紧密围绕着应用技术类大学群科专业建设、中高职现代职业教育建设工程、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精致化校园管理机制等展开讨论。议题内容皆是近年来职业教育发展上特别关注的方向，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除以上尝试外，近年来以海峡两岸教育交流为契机，广大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实践中，大力协作，开拓进取，取得喜人的成果。

中职院校师资队伍培训。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从欧洲工业4.0、日本工业4.1 J计划、台湾地区生产力4.0，以及中国制造2025，不难看出互联网（Internet+）、物联网（IOT）、巨量数据（Big Data）所引领的产业增加值应用的成效，包括行动电子商务、用户消费分析、创新

加值服务等。先进国家在教育人才培育方案中，均大力培养人才具有国际化能力，包括跨文化团队合作、语言沟通能力，以及培养符合国际职能标准的技术人才。相关研究指出，拥有语文能力、利基专长与关键技术证照者，是目前产业最迫切需求的人才。欧盟关键能力、美国21世纪关键能力、澳大利亚公民关键能力，体现出未来人才需求将以国际化、信息化、智能化技术为趋势。台湾在未来人才培养上亦强调移动力的重要性，而移动力包括个体的语言能力，以及信息科技的使用能力。语言能力强调个体使用听说读写方面的国际性操作手册，实现有效的沟通和跨文化团队合作等。信息科技使用能力，则是智能化生活的关键能力。因此，在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培养上，台湾师范大学两岸产学教育中心特别注重培养台湾教师在学校实际教学活动中所需的实务技能，包括课程设计、教材教法、教学评量与行动研究之职能系统。以国际化及信息化作为培训考核要点，提出“双核心关键技术能力”，要求所有受训教师除了本科专业力求精进外，更强调教学职能与国际化能力的提升，以利于与国际接轨。在培训计划设计上，台湾师范大学两岸产学教育中心提出“三阶段培训法”，整合在线学习、集中面授、专家辅导等三个环节，为中职学校提供完整的年度师资队伍精进计划。目前，已于厦门、漳州、福州、三明、天津、上海、金华等地分别开展培训服务。

筹组两岸职业教育智库组织。在与海峡两岸专家多次研讨后，台湾师范大学两岸产学教育中心将于2017年下半年启动两岸职业教育智库的筹建工作。刘国瑞、王少媛（2014）提出，智库又称“思想库”“脑库”或“智囊团”，是由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组成，为政府、企业等组织及其决策者处理公共事务和应对突发事件出谋划策，提供最佳思想理论、方法和策略的咨询机构。智库推出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和针对性特点的应用研究成果，在分析形势、影响公共决策和社会舆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针对智库的研究，在国外最早源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学者Paul Dickson对智库提出设想与定义，并出版专著《智库》，但对于教育智库的研究极少。国内针对教育智库的研

究始于2000年，赵中建（2000）以美国教育政策联盟为研究对象，对美国的教育智库管理体系、成果、宣传等问题做了系列性探讨，开启了国内对教育智库研究之先河。当前，正处于我国教育发展的转折期，教育生存环境复杂，利益要求多元，在教育质量与教育公平等多重压力下，迫切需要建设一批高素质高水平的教育智库组织，以应对教育改革发展的顶层规划、制度设计、实务问题排解等工作。刘国瑞、王少媛（2014）提出，应推进省级教育研究机构向地方教育智库转型，这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也是一项急迫的工作。据此，台湾师范大学两岸产学教育中心将与福建省高等职业教育研究发展中心联合，在福建省高等职业教育研究发展中心的架构基础上，探索筹办两岸职业教育智库的可行性。目前，教育智库的筹组工作已进入实质阶段，预计于2017年年底成立。

主要参考文献：

1. Lassar, W M. Strategy and Control in Supplier Distributor Relationships: An Agency Perspectiv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17): 613-632.
2. 罗炜、唐元虎：《国内外合作创新研究述评》，《科学管理研究》2000年第4期。
3. 赵中建：《“美国教育政策研究中心”的个案分析》，《外国教育资料》2000年第3期。

（本文图片由 作者提供）



提升闽台职教师资的教学素养



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

比特实验室的创办 与小学教育的创新

■ 王强

摘要 本文简要探讨了比特实验室的创办与小学教育创新之间的内在关系，认为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促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关键词 比特实验室 小学教育 创新

作者 王强，福州实验小学教师（福州 350003）

当今世界进入了互联网时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仅是国家物质资源的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我们的人才应该有高尚的社会道德品质，丰富的创新能力以及良好的社会适应力。教育是培养社会人才和增强民族创新能力的基础。创新是一个民族成长的动力，创新能力是创新人才的智慧资源，也是创新学研究的一个

重要问题。为什么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等思想家、科学家们能够引起人类思想史、科学史的革命？是他们能发人之所未发，具有创造性的思维能力。显然，创新是我们民族的希望，也是人类的希望。没有创新，社会将会停滞不前。

2016年7月，福建省福州实验小学从培养创新、合作、

探究、分享等角度入手，大胆从江苏引进新课程：比特实验室。在比特实验室里，我们教会孩子在未来世界中生存的最重要的能力，包括发明创造能力、领导和团队合作能力、积极思维和问题解决的能力、运用物联网的能力、观察和获取信息的能力、细致的理解能力、自主学习的能力，并以想象力、创造力和爱心力贯穿教学始终。从比特实验室走出来的孩子，被认为是富有爱心、自信心，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创造的未來人才。

“比特实验室”是一个高效的课堂创新教室，把最先进的物联网科技与创新三维七巧板艺术融合在一起，通过激发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兴趣的引导，利用多种电子传感器与3D构件的艺术设计和组合，创造出各种丰富多彩的作品。学生们经过合作与思考，对作品展开极大的想象力，使作品的功能不断丰富，为未来的成长积累大量的想象素材，为培养创新型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础。互动学习平台是由“比特课程”的团队提供的，它由四部分组成。（1）使命感。通过了解发明者的故事，学习爱迪生、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牛顿等科学家的专注探究精神，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能力。（2）做一个创造性的艺术家。在比特课程的第二部分，要求学生大胆发挥想象力，通过绘画设计表现创新性。要求设计出不同的构想，再通过动手实践，让设计变为现实。（3）做一个好的工程师。通过

对电子模块的了解，引导学生学会使用电子传感器的各种功能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4）学会合作。比特实验室每组由三到四个学生组成。在每个活动项目中，学生们相互分工合作，在商议讨论中形成良好的思路，达成完美的设计。完成原型之后，团队说明和介绍制作的过程，提高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表达力。以四个学生为一个学习小组，各自以能力分工，自选角色。如从一个感人的情景故事开始，让学生聚精会神地从故事中感受科学家们强烈的求知精神和主动忘我的探究精神，培养积极动手实践的能力。

通过对作品的构思，培养学生的绘画能力，让学生在实验的互动过程中，提高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学会了解自我、理解他人、分享合作。

在刚开始上课时，我们发现学生存在着许多的不足。首先是专注力不足，这是目前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原因是孩子专注力被家长们“人为破坏”，以及被多信息化的智能产品迁移，表现为注意力时间短、易分心。其次是角色的定位存在偏差。由于平时缺少对自我的了解，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和优势，难以给自己准确定位。再次，绘画自信心不足，只有少部分学生敢于构思。另外，合作能力欠缺，这是这个时代独生子女普遍存在的不足。在选择力方面，表现为选择盲目、焦虑和恐惧，原因是目前家庭条



福州实验小学的比特实验室



实验成功的喜悦

件优越，家长往往轻易满足孩子的行为。但是，我们也发现孩子们有许多优势，如动手能力强，想象力丰富，语言表达能力强。

为此，我们在上课过程中针对性地加强相关因素的培养，由易到难、由简到繁，采取“小步前进，大胆尝试”的策略，逐步引导学生自信、快乐、积极、主动，大胆体验。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取得良好的效果。

随着学生专注力和构思水平的大幅提高，绘画明显进步，创意不断涌现，合作能力大大加强，表现欲望越来越强，新颖的、充满智慧的作品不断呈现。学生在课堂上呈现的是自信的笑容，欢快的表情。

在完成第一阶段实验课活动后，学生们能基本掌握操作和制作，教师决定在原来四人一组的基础上进行自由组合。其中，一部分学生保持原组合，一部分自行组合并开始开展活动。这时来了个女学生对教师说：“老师我不懂要去哪

里？”经教师询问了解到基本情况，有两组的学生都要她，她不知该如何选择，并且表现出焦虑情绪。教师问她：

“平时你妈妈有让你选择过吗？”“没有。”针对这一情况，教师建议进行随机自然抽选，最终让她去一个组活动。这个学生家庭条件好，家长尽量满足孩子，孩子要什么，家长都答应。课后，教师针对孩子的选择困难，建议家长在家里对孩子进行这方面的引导和实践训练，逐步培养孩子的选择能力。我们认为，选择力是孩子将来适应社会的重要能力之一，也影响到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应当从小进行培养。

在一次课堂教学中，教师发现一个学生自己玩，而且闷闷不乐。教师上前了解，学生说：“他们都很自私，不让我玩！”教师问：“为什么？”“他们都不听我的。”教师说：“他们三个在一起，达成一致意见了没有？”“达成了”。教师说：“他们三个都一致了，就要一起配合。让他们三个都听你的，你是不是自私啊？”这位学生低下了头。教师说：“我带你过去，大家一起配合，把你的智慧表现出来。”



小伙伴之间的友好交流

在一次以动物为造型的课堂演示中，一个学生兴冲冲跑过来说：“老师，我做了个猫头鹰！”教师鼓励说：“很好，能否再想想，如何将造型的功能再丰富完善。”“我做不了，我不做了”，该学生出现了畏难情绪。针对这一现象，每一次的比特课上，我都会鼓励学生在家里完成自己的想象创作。先画一幅图，要求备注作者名字、作品名称、功能以及彩色图案。有一个学生几次都没有交稿。我问：“你为什么没有画？”“老师，我画不好，不敢画。”“为什么？”“因为过去我妈说我画得不好。”我说：“老师没有要求评比，只要有画，先简单画一张，老师相信你能画好，对自己要有信心！”课中，这位学生画了一幅画，虽稚嫩粗糙，但是我鼓励了他。从此，他每节都开始交画，线条、色彩、创意都有改进，自信心不断提高。

在当下的家庭教育中，一些家长一切都顺着孩子，让着孩子，没有培养孩子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导致这些孩子在学校课堂活动中需要合作时不知所云，易与他人产生矛盾。这样发展下去，会影响孩子的社会适应性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与传统的教学相比，比特实验室强调的不止是知识，而且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学生从生活寻找问题，解决问题，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同时，以兴趣为先导，以沟通交流为平台，让学生在“做中学，做中议，做中成长”，让孩子们找到自己的兴趣。通过团队合作，做出的创意产品展现了学生的童心、丰富的想象力，满满的爱，体现了团队的力量。

通过比特实验室学习，班主任及科任教师普遍反映，学生学习兴趣浓厚，敢于提问题，纪律方面也有进步。我们在课堂中进一步呈现问题引导学生积极表现，和家长们保持有效的沟通，让家长了解实验课程，支持实验课程，关注孩子的行为和情感表现，并给予积极的帮助。

比特实验室的活动体验，不仅使

孩子们在心智活动方面得到发展，而且我们从中更可看到目前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家长对孩子教育的理念、方法、手段上存在的问题。了解这些，有利于开展亲子家庭教育和家长学校工作的研究。

通过家校共同努力，比特实验室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有了实践就有了体验，有了体验就有了自信心，有了自信心，就会有创新。同样，有了快乐就有了激情，有了激情就迸发出智慧，有了智慧就享受到幸福。我们将不断努力，不断总结经验，激发和唤醒学生的自信心、创新能力、表现力和合作能力。同时，依据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以及现代社会信息化发展的特点，为培养智慧、幸福、健康的人才而努力。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学生成果展示



福建经济学校校园

加强中职学生网络 德育的策略

■ 胡智华 郑志鸿 李廷诚

摘要 本课题以福建经济学校721名学生为样本，对中职学校学生的网络资源应用问题进行调查。通过分析调查数据，深入了解当前中职学生“网育”的主要成因，进而提出加强中职学生网络德育工作的新方法、新策略。

关键词 中职学生 网络德育

作者 胡智华，福建经济学校教师（福州 350003）

郑志鸿，福建经济学校教师（福州 350003）

李廷诚，福建经济学校教师（福州 350003）

随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和移动智能技术的日益普及，计算机（如PC）或移动终端（如手机APP）逐渐成为当代青少年学生获取互联网资讯，进行互联网学习、游戏的重要渠道。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互联网在给中职学生带来

学习、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带来许多良莠不齐的各类信息。大量事实表明，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和广泛应用，从积极方面看，它为学校的德育提供了丰富、便捷、有用的教育资源，为开展中职德育工作提供了新平台、新手段和新

思路。从消极方面看，互联网上存在大量不健康的资讯、视频、游戏，甚至存在黄赌毒等网络违法犯罪内容，这些都给中职德育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因此，在互联网环境下深入分析中职校德育工作的新形势、新特点和新办法，积极引导和教育中职学生做“网络文明使者”，是一个紧迫而现实的课题。

1. 问卷设计的原则和出发点

调查样本设定。以福建经济学校学生为调查样本，通过样本数据，对当前网络环境下中职德育工作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加强和改进中职学校网络德育的策略建议。

调查采用问卷法。调查问卷共设计三个部分，32个题项。第一部分为受访者基本信息，有3个题项，主要有性别、年龄、年级、专业、家庭结构、家长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第二部分为受访者上网情况，有23个题项，主要了解调查对象上网的基本情况。第三部分为网络与中职德育的关系，包含6个题项，主要分析研究网络对调查对象的影响，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同时，辅以个案，通过与学生个别谈话，收集相关信息。

2. 关于样本的说明

本次调查以福建经济学校2015级、2016级721名学生（共14个大专业）为对象，采用无记名方式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465份。其中，女生269人，男生196人，回收的问卷真实有效。

3. 问卷统计的方法

问卷回收后，根据答卷内容进行分类统计，计算选项人数所占的百分比。

4. 主要结论

从问卷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中职校学生每天上网的介质主要是手机，上网的时间平均2至5小时。其中，55%的学生上网主要是娱乐、消遣，如聊天、看电影、听音乐等，17%的学生在玩玩游戏，5%的学生上网查资料，5%的学生上网浏览资讯。也就是说，只有约10%的中职学生日常上网与学习有关，过多的网络游戏和聊天会影响学生的正常学习。

调查问卷数据统计显示，有35%的学生在聊天中经常使用不文明用语，从来没有使用的仅占9%。在心情不好、对方先出口伤人、与别人意见不合、帮别人骂人等情况下，更会使用不文明用语的达85%。另外，对网络不文明用语持无所谓态度的有60%。可见，学生文明上网的意识不强，缺乏网络道德责任，自控能力弱，法律意识淡薄。

当前，中职学生不良“触网”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校园网无法满足学生的网络需求，增加了学校网育难度。中职学生大部分是住校生，闲暇时间较多。但是，学校校园网建设落后，设备陈旧，网速过慢，信息滞后，功能较少，特别是校园网关闭了一些功能后对学



优化德育网络建设



教师辅导

生就更没吸引力。学生在没有过滤的网吧上网, 网络负面作用和学校的正向教育产生冲突, 造成中职校的德育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充满挑战。

过多的玩游戏和网聊, 降低了学校网育的实效。移动4G网络覆盖中职校校园后, 不少学生上课期间沉迷于手机游戏而难于自拔, 有的学生为了玩游戏旷课逃课, 通宵

泡在网吧。自律不严的中职学生参与过多的网聊和游戏, 不仅严重影响正常学业, 还增加了学校德育的难度。

网络上的信息, 其中有一大部分如色情、淫秽、暴力、传销等, 严重侵蚀中职学生的身心健康。这些不良信息存在和对中职学生的诱惑, 加大了中职学校网络德育的难度。

中职学生不良触网行为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方面。

中职学生的身心正处于急剧变化的时期, 他们思维活跃, 好奇心强, 接受新事物快, 但分辨是非的能力比较弱, 良好的行为习惯养成比较差。特别是在中考失利后, 社会的偏见让他们心生自卑。不少学生通过沉溺网络来逃避现实, 以获得虚拟世界里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互联网是一个开放、匿名、充满各种诱惑的虚拟世界。互联网信息有些来源不明、良莠不齐, 那些有害、有毒的游戏和黄赌毒信息, 对正在形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中职学生会产生极大的迷惑, 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和健全人格的形成。

和健全人格的形成。

中职校的大多数教师都能制作比较简单的课件, 使用多媒体授课, 但对一些网络功能和网络信息了解不多, 网页制作以及BBS和BLOG操作技能普遍不强。面对网络上参差不齐的信息, 中职校广大教师和德育工作者的综合网络素质和网络信息技术跟不上。

目前, 虽然一些地方和单位(学校)建有与中职学生思想品德教育有关的网页或网



网络德育模式的实践

站,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网页或网站内容枯燥空洞,更新比较缓慢,娱乐性、交互性和服务性明显不足,对中职学生吸引力不强。

1. 充分利用网络特点,开展有效中职网络德育

利用网络实现德育主体的平等性。传统的德育常采用面对面的理论灌输方式,容易造成师生之间关系不平等,学生心理压力大,对教师的引导、教育存在抵触心理。在相对自由平等的网络空间里,中职学生往往愿意放下心理戒备与教师进行交流,师生互动显得更轻松愉快、深入持久,利用网络展开德育的优势可以更好地发挥出来。

利用网络实现德育内容的丰富性。目前,网络打破了地域的制约,容量浩瀚、文化多元、内容丰富,中职学生可以做到“一机在手,天下我有”,网络大大地拓宽了中职学生的视野。在多数情况下,中职学生遇到问题或难题也能够上网向人请教求助,情绪不好时可以找到人进行倾诉,网络的丰富功能大大增加了德育工作的宽度和深度。

利用网络实现德育方式的便捷性。网络信息自身的便捷性是网络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网络的出现和发展,使得中职校教师和学生能够同时了解国内外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各方面信息,学生可以和教师一起发表看法、讨论

问题、交流思想。这样,教师可以及时了解中职学生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动态,提高中职校德育工作的效率。

利用网络实现德育手段的形象性。多媒体技术的运用,能够克服传统德育课堂以单一的讲授、说教、理论灌输为主的教育形式的弊端。通过创设图文并茂、声情融合、轻松活泼、幽默风趣的网络学习环境,使中职学生在形象、生动、直观和快乐的活动中获取有用的知识,提高对德育学习的积极性。

2. 优化德育网站,加快校园网络建设

提高网络德育质量,丰富校园网络资源。校园网已成为网络时代学校教育的重要载体,中职校应把建设校园网的规划与学校的长远发展统一起来,把服务教学与服务德育结合起来,在优化和丰富校园网资源方面做到:版面活泼,个性突出,贴近师生的学习和生活;形式生动,内容丰富,把书本中生硬、抽象、呆板的教育内容,用生动、具体的事例、游戏、故事和视频影像的方式呈现,从而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细心维护,及时更新,德育专题网站建立之后,学校须设有固定技术人员进行维护。

切实抓好校园网络的舆论引导。一方面,由于网络信息具有多元性、匿名性、虚拟性特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乘机会在网络上发表虚假信息 and 谣言。另一方面,部分学



学生参与网络德育直播问答



学生参加茶道实训

生受挫后容易在网上进行人身攻击，泄愤，发布虚假和不健康的信息。因此，应切实加强校园网络的舆论导向，找准学生关注度高的热点问题，深入到虚拟社区主动和学生在线交流，有针对性地引导校园网络的舆论导向，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络对德育工作的积极作用。

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正日益成为中职学生开展社交活动、进行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中职校应适应新媒体变化，探索以新媒体为载体的网络德育新形式，利用各种媒体和多维空间角度提升中职学生的德育素养。让正能量的信息在校园里占据主体地位，进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切实加强校园网络的技术保障和监督。中职校要充分利用技术，对不良的网络信息进行有效过滤、识别、屏蔽。同时，建立健全校园网络管理机制，教育学生自觉遵守网络法规，提倡文明上网，鼓励学生举报不良信息或网站，杜绝不良信息的传播，实现校园网络建设的良性循环。

3. 提高中职德育网络队伍的素质

中职德育工作者要树立“网络教育”的观念。网络带

来了丰富的信息资源，也带来了多元的文化，里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中职校教师应树立现代化的网络德育意识，主动学习普及性的网络技术，努力做到能与学生在网络平台上进行平等的交流，并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学生上网的指导，努力帮助学生在网络世界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接受德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中职德育工作者要改变教育模式。大多数中职学生都是应届初中毕业生，年龄在16-18岁之间。他们具有较强的叛逆思想，有厌学情绪，责任心弱，自制力差。网络的出现，使中职学生感到了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一定程度上转移了他们的心理压力，找到了自我情绪宣泄的出口。传统的德育方法，如先灌输后消化的“填鸭式”策略已难奏效。因此，中职校德育工作者必须改变教育教学模式，主动到学生身边，通过和学生的网上接触，了解他们的情绪波动，掌握他们的真实想法，从而更好地实现德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要增强驾驭网络的能力。中职校德育工作者要切实加强网络技术的学习，特别是多媒体技术的学习。切实增强开展网络德育工作的使命感，充分利用网络拓展德育工作

的时间和空间,从课内延伸至课外,从学习延伸至生活,使之成为中职学生的良师益友。可以通过建立个人主页、微博等形式,加强与学生的沟通、联系。通过开辟专栏、虚拟社区等形式,加强对学生学习生活的实践指导,打造德育工作的新阵地。

4. 培养和提高中职学生的网络素质

中职校要加强学生网络知识的学习。现实中,手机成了中职学生日常不可或缺的随身物品,上网也成了中职学生不可替代的生活习惯。因此,学校要加强中职学生对计算机知识、网络知识的学习,让他们全面了解计算机和网络的基本情况、主要功能和安全防护,促使他们自觉、自发地把计算机、网络作为现代学习、生活、交际的载体和方式。

中职校要加强学生网络道德的教育。问卷数据显示,针对“你认为网络道德是什么”的回答,中职学生回答“诚信”的42%,回答“公平”的38%,回答“安

全”“公开”“公正”“互助”“抵制不良信息”“独善其身”和其他的分别占32%、23%、34%、23%、21%、16%、13%。可见,中职学生的道德自律意识不强,心理总体还不够成熟。因此,德育工作者要教育和帮助学生提升上网主体意识,重点培养学生在网络世界里的道德判断力。只有学生的判断能力增强了,才能识别网络资讯的真假、正误,才能把握自己的底线,才能辨别和抵御各种有害信息,成为有道德、有品行、守秩序的文明网民。

中职校要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网络文明行为。网络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大部分网民在网上使用的都是虚拟的身份。中职学生的辨别、判断能力不强,极易受到不文明行为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其中去,成为不文明上网行为的“参与者”。要强化德育工作者的教育手段,通过开展一系列文明上网活动,以正面和反面事例,教育中职学生全面、深刻认识文明上网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



师生走进社区开展学雷锋活动

性，注重强化学生的自我约束和管理，在日常的上网过程中培养良好、文明的行为习惯。

中职校要探索将网络游戏融入德育工作的新模式。网络游戏对于中职学生的影响，是学校德育工作不可忽视的大问题。中职校可以尝试通过学生喜闻乐见的游戏方式，把娱乐性与教育性、真实性与虚拟性结合起来，拉近德育与学生的距离。如开发“吸毒的危害”“为什么不提倡早恋”“竞争与合作”等专题游戏，让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做人的道理。这样，用传统教育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通过网络方式得到解决，使学校德育工作丰富多彩。

总之，在高度发达的互联网环境下，应充分利用和发挥网络的优势，让网络正能量成为中职学生树立正确“三观”，促进自身健康成长的重要动力。同时，拓展中职校开展德育工作的新思路新途径，为加强和改进中职学生网络德育工作，提供了新手段和新平台。

主要参考文献：

1. 李士群：《网络道德》，北方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年。
2. 黄向阳：《德育原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3. 班华：《现代德育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
4. 王经涛、王俊英：《青少年网络道德教育》，开明出版社，2001年。
5. 束亚芳：《开展学校网络道德教育的思考》，《教育研究》2006年第4期。
6. 刘微：《网络，对青少年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中国教育报》2002年5月19日。
7. 谢海光：《互联网负性信息传播的特征及其防御技术对策》，《思想·理论·教育》2000年第2期。
8. 罗军强：《虚拟环境下青少年网络犯罪问题研究》，《世纪桥》2008年第3期。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师生参加义务植树



福建省莆田市阔口村的陈俊卿故居

朱熹与莆田名儒陈俊卿的交往

■ 黄新宪

摘要 本文以朱熹的视角，从多个层面探讨了朱熹与南宋时期莆田籍名儒陈俊卿的交往，试图进一步深入认识两人之间存在的深厚渊源及其中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



陈俊卿像

关键词 朱熹 陈俊卿 莆田

作者 黄新宪，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福州 350007）

陈俊卿（1113 - 1186），字应求，宋莆田县白湖（今福建莆田市阔口村）人。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中进士，曾任泉州观察推官、秘书省教书郎、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殿中侍御史、礼部侍郎并参赞军事、知建宁府、吏部尚书、知枢密院事等。孝宗乾道四年（1168）出任宰相。从淳熙二年（1175）起，先后知福州、提举洞霄宫、判建康府、任江南东路安抚使兼行宫留守。淳熙八年（1181）告老还乡，朝廷先是封申国公，后加少师，进封魏国公。去世后，赠太师，谥正献。从这段履历可以看出，陈俊卿是经由科举这一途径步入政坛并获得高位的，称其为“名宦”自是名实相副。但是，陈俊卿还是一位秉持理学理念并身体力行的理学家，与不少理学人物都保持着密切联系，在理学向东南传播与发展过程中发挥过作用。陈俊卿与朱熹交往频繁，是朱熹朋友圈中的重要人物，两人的友谊持续了一生。从这一角度考量，称陈俊卿为“名儒”也是恰当的。

自唐代以来，莆田的学人便注重著书立说，迄今留存有大量乡邦文献（一说有两千余种），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人们熟悉的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莆田籍学人，如唐代的黄滔、宋代的刘克庄等，都有文集刊行于世。在科考中与陈俊卿同榜的莆田籍状元黄公度，虽然英年早逝，但后人之为之刊刻了《知稼翁集》，由陈俊卿撰写序言。至于与陈俊卿处于同一时代的郑樵，更是著作等身，传世文字多，在史林中具有重要地位。令人遗憾的是，除了留下几首诗作和一些序文外，今人难觅陈俊卿的更多系统性的作品。由此，在探讨陈俊卿与朱熹关系时，便很难从陈俊卿的视角来进行完整的考量。好在朱熹的文集中保留了不少与陈俊卿交往的文字记载，其中有数十处提到陈俊卿，这使得从朱熹的视角探讨两人的关系，尤其是了解朱熹对陈俊卿的认识和评价，有了较大的可能。据考证，朱熹致应求、陈应求、信安公、福公、福国、福国公、福国陈公、陈福公、申国公、魏国、魏国公、魏国陈公、正献、正献公、陈正献公、陈侍郎、陈少傅、陈丞相、陈少保、陈帅、陈公、陈丈的文字，都是写给陈俊卿的。这些文字的内容涉及对朝政的看法、相关官员的评价、重大变革的建议，乃至个人境遇和家庭情况的知会，交流的范围广，行文比较

轻松，表明两人关系确实很密切。

朱熹初识陈俊卿约在绍兴二十三年（1153）五月。当时，朱熹前往同安县（今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任主簿途经莆田，慕名拜访了因丁忧在家守丧的陈俊卿，及理学前辈林光朝、方翥等。陈俊卿已颇有官声，朱熹则初出茅庐，在仕途上刚刚起步。年龄上，陈俊卿年长朱熹十余岁。“陈俊卿绍兴二十三年方丁忧居莆田（感德乡胡公里）。朱熹之见陈必在其时。盖陈为绍兴八年科榜眼，亦已名响莆中。”^①虽然经历不同，社会地位和年龄差距大，但两人一见如故。按常理，两人结交后便会有书信往返，可能是相关文献缺失的原因，今天我们见到的现存两人较早的交往文字比实际交往要晚，致使一些研究者在交往时间上存在误判。有日本学者认为：“他们两人何时开始交际，虽然无文献可征，但朱熹给陈俊卿的不少书简之中，最初的是陈俊卿为吏部侍郎时，就是乾道元年（1165）。所以我们看见，那时他们已经认识了。”^②尽管在交往时间上存在不同说法，但朱熹与陈俊卿都视对方为知己则是不争的事实。

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朱熹与陈俊卿的交往有明显的历史轨迹可寻，且存有一些侧重点，本文将按大致的时



福建省武夷山市五夫镇的朱熹故居

间顺序，结合一些文献，对此加以概述。

一

在朱熹与陈俊卿的交往中，对国是的关注及改革朝政方面的讨论占有重要位置。朱熹具有浓烈的家国情怀，这为世人所熟知，一段时间里这方面情感的表达和倾诉对象之一便是陈俊卿。朱熹关心时政，对国是日非局面的存在深感忧虑，通过信函向陈俊卿提出不少有关改进国是的建议。同时，希望陈俊卿能够发挥影响力，在匡正时弊等方面有大的作为。

朱熹与陈俊卿在讨论严重的内忧问题的解决时，认为应当先明确本末，主张正其本，本正则末之不治非所忧矣。“且以今日天下之事论之，上则天心未豫而饥馑荐臻，下则民力已殫而赋敛方急，盗贼四起，人心动摇。将一二以究其弊，而求所以为图回之术，则岂可以胜言哉？然语其大患之本，则固有在矣。”所谓固其本，就是要整肃吏治、安定社会、改善民生。

解决内忧需要正其本，排除外患更需要正其本。面对宋金长期对峙的状态，作为主战派重要人物的朱熹认为，恢复中原只能用军事手段，若单纯讲和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所谓“三纲颓、万事隳，独断之言进而主意骄于上，国是之说行而公论郁于下”，进而出现内部局面的失控。将这番话说给同样是主战派人物的陈俊卿听，有试图通过他向高层传导反对讲和的社会舆论的用意所在。朱熹向陈俊卿强调，破坏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莫过于讲和之说。具体而言，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苟道目前宵旰之忧，而养成异日宴安之毒者；都是讲和之说所导致的恶果。更严重的是，讲和之说使人们忘了金对宋造成的巨大危害，导致统治阶层试图通过赔款送礼来谋求偏安的局面，而不思恢复中原之策。由于进不能攻，退不能守，只好卑辞厚礼以乞怜于仇讎之戎狄，幸而得之，则又君臣相庆，而肆然以令于天下曰：凡前日之博物细故，吾既捐之矣，欣欣焉无复豪分忍痛，含冤、迫不得已之言，以存天下之防者。朱熹告诉陈俊卿，本其为说，虽原于讲和之一言，然其为祸则又不止于讲和之一事而已，这样做将重误吾君，使之傲然自圣，上不畏皇天之谴告，下不畏公论之是非，挟其雷霆之威、万钧之重以肆于民上，而莫之敢撻者，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朱熹认为这是不仁的做法，仁人君子不可以坐视不管，而任由这种现象滋长。朱熹对统治阶层的批评直接而深刻，既体现其政治品质磊落而坦荡，也表明朱熹对陈俊卿具有高度信任感。



朱熹就读过的闽北屏山书院旧址

对于置内忧外患不顾而空谈“国是”者，朱熹深恶痛绝。他告诉陈俊卿，“夫所谓国是者，岂不谓夫顺天理、合人心而天下之所同是者耶？诚天下之所同是也，则虽无尺土一民之柄，而天下莫得以为非，况有天下之利势者哉？惟其不合乎天下之所同是而疆欲天下之是之也，故必悬赏以诱之，严刑以督之，然后仅足以劫制士夫不齐之口，而天下之真是非则有终不可诬者矣。”至于宋金和议的倡导，他认为既不顺天理，也不合人心，是假国是之名以行欺世盗名之实。“不识今日之所为若和议之比，果顺乎天理否耶？合乎人心否耶？诚顺天理、合人心，则固天下之所同是也，异论何自而生乎？若犹未也，而欲主其偏见，济其私心，强为之名，号曰国是，假人主之威以战天下万口一词之公论，吾恐古人所谓德惟一者似不如是，而子思所称‘具曰予圣，谁知鸟之雌雄’者，不幸而近之矣。”朱熹希望陈俊卿能够认识相关现象的本质，在朝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挽狂澜于既倒，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

“明公不在朝廷则已，一日立乎其位，则天下之责四面而至。与其颠沛于末流而未知所济，孰若汲汲焉以勉于大人之事，而成己物之功一举而两得之也？”^③朱熹表示自己“杜门求志，不敢复论天下之事久矣”，相关的言论只是有感而发。不过，希望陈俊卿能够体悟“时难得而易失，事易毁而难成”，与有志者同力合谋，图天下事之缓解良策。

朱熹长期退隐山林从事讲学活动，在人生的多数时段扮演着隐逸之士的角色。但是，因了与陈俊卿的交往，在野期间也时时对庙堂之事发表见解。其不仅只是有感而发，泛泛而论，而是抱持对国家与社会的重大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一种真情流露和坦诚告白。此外，朱熹能够直言无忌地将所思所想以激越的言语和盘托出，表明在其潜意识中视陈俊卿为自己的同道者。

乾道元年（1165）七月，陈俊卿因奏论钱端礼一事而出知建宁（今福建省建瓯市）。朱熹闻讯到建宁看望。据《汪文定公家乘·与汪圣锡》记载：“近日陈应求侍郎来守建宁，一再相见，谈当世之事，慨然忧愤。盖亦以为今日非阁下，殆不能济东方之事，上天眷顾宗社，救败扶衰之期，非大贤孰能任之！”张栻在致朱熹的信中也提到：“复和仇虏（指隆兴和议），使命交驰，痛心，痛心！陈应求时通书，极知忧国，但未见所以济之之策。”^④即便处在不利状态，陈俊卿与朱熹一样依然满怀忧国忧民之心，国家社稷之安危时时都在念中，只是由于阻力重重，一时难以拿出有效对策。

在朱熹与陈俊卿的交往中，除常通过书信讨论时事政治外，还分析官场弊端，谋求解决之道。在《与陈福公书》中，朱熹向陈俊卿转述自己所了解到的前方消息并进行了一番分析。“北方消息传闻不真，春间有上封事者，前言虏为西夏所逼，盖迂国以避之，其后乃虑其设诈以谋我。此已是揣摸，无一定之计。最后又只泛言乞诏枢廷严为边备而已，乃大中上意，改秩除官。其后乃闻卢帅王希吕奏，虏为契丹遗种大石林牙所袭，失亡甚多，

老酋遁走，不知所在，三日而后得之，朝廷颇信其言。然去冬有亲戚自淮上归，已传此言，却云渤海所袭，寻亦不闻的耗。然则此报又未知其信否也。若鄙意，则以为此虏盛极而衰，举措颠错，就如所闻未必得实，其势不足深虑。彼其修城浚汴，特为虚声以惧我耳。然朝廷已为之调发海舟，一番骚动，此正高颀、王朴之遗策，而我已落在计中。”^⑤对敌情的误传、误判，及一些将官的怯战和欺瞒朝廷，令朱熹深感忧虑。更为担忧的是，在一种不正常的大环境下，朝中很多官员对国之大事漠不关心。“士大夫稍有气节、敢议论者，尽在远外，寂然不闻有一人能为明主忠言，以指奸佞、裨阙失、固邦本、达民情者。闻其语及天变，则尽以归之虏酋，使应天道，此已为谄谀不忠之大。”朱熹希望陈俊卿能够率先垂范，积极进言，努力改变这种状况。“明公果有乃心王室之意，但当以此曲折极言于上，劝以博询刍蕘，深求己阙之意，则明公虽不尽言天下之事，而天下之言因我而达，此功固已大矣，又何必刺探隐谋，密陈秘计然后为论事哉？”朱熹进而指出：“近年以来，将相大臣始终全德，无可指议如明公者，指不可以再屈。诚能及此更为此举，则功烈被于当年，声称垂于后世者，又不止于前日矣。不然，不过今日苟全上下之交，而后之忠臣义士考观岁月，计虑安危，必将有大不满于明公者。”^⑥朱熹对国政日非的担忧一以贯之，在《与陈丞相书》中向陈俊卿表达了类似的心情。“今日之忧，正在精锐销铄，惯习燕安，庙堂无经远之谋，近列无尽规之义，阿谀朋党，贤知伏藏，军政弄于刑臣，邦宪屈于豪吏，民穷兵怨，久不自聊。季孙之忧，恐不在于颛臾也。不审尊意以为如何？”^⑦朱熹所处身份和地位使其在言论的表述上更为自由和无忌，这与老成持重的陈俊卿明显不同。朱熹希望陈俊卿能对朝政大声发声并发挥影响力的心情是急迫的，直言的表达说明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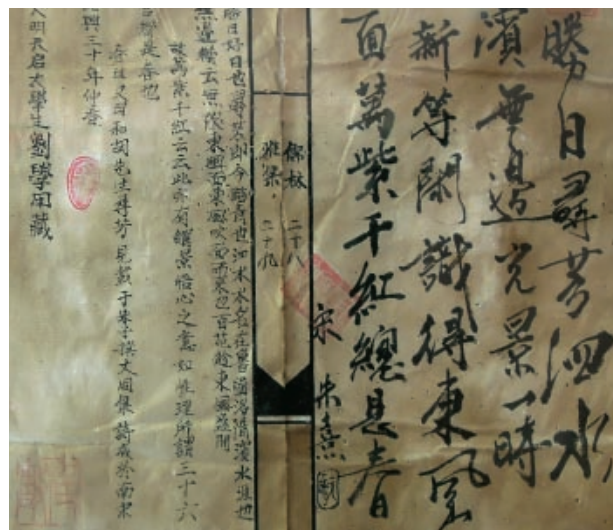
乾道四年（1168），朱熹在《贺陈丞相书》中指出，“伏惟明公以大忠壮节早负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赞襄密勿，凡所论执，皆系安危。至其甚者，辄以身之去就争之，虽未即从，而天子之信公也益笃，天下之望公也益深，懔懔然惟惧其一旦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于上下者，岂徒然哉！”鉴于陈俊卿身居高位，且受到皇帝信任，说话有一定份量，朱熹希望其能为天下之事发声，大胆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今也进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莫不欣然，咸曰陈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争之不得，危于去矣，而今乃为相，则是天子有味乎陈公之言而将卒从之也。陈公其必以是要说上前，而决辞受之几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急者又不特此，陈公果不



朱熹在闽北创立的社仓

得谢而立乎其位，必且次第为上言之，为上行之，其不默然而受，兀然而居也明矣。”朱熹长期在野自是很难影响朝廷的施政，他希望能借助好朋友陈俊卿身居相位的机会来进行相应的革新。但是，陈俊卿已上任一段时间，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卓然大变于前日。他认为，陈俊卿“未尝以中外之望于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这颇有点批评和指责的意味在。他希望陈俊卿能够在其位谋其政，名副其实地承担起应当承担的重任。“盖闻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于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余，则汲汲及其时而勇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则咨访讲求以进其知，振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缓。上不敢愚其君，以为不足与言仁义；下不敢鄙其民，以为不足以兴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为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则一日业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则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爱而不肯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无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为其职之所当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济时，而于大臣之责可以无愧。不审明公图所以善其后者，其有合于此乎？其有近于此乎？”^⑧朱熹对老朋友在寄予厚望的同时，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甚而不乏批评之辞，字里行间饱含着急切的期盼，表明其自觉地将自己置于诤友的位置上。

淳熙四年（1177），时任福建安抚使的陈俊卿解职告归，朱熹多次致函表示慰问。在《答陈丞相书》中指出：“方欲别伸问讯之礼，忽闻拜章公车，祈就间退，圣主重违明公之意，峻其班秩而后赐可。窃自惟念虽与一道穷民同失膏雨之润，不无怊怅，然想税驾里门，雍容就第，超然事物之外，其乐有不可涯者。至于圣主不忘之意，则又海内搢绅之所共庆，而熹之愚昧，窃独深有感焉。盖今时论归趣益异于前，后来诸公未见卓然有望望以回天意者，有识之士日夕寒心。”尽管有诸多的不舍与不解，但朱熹仍然以看似轻松的行文宽慰陈俊卿。“明公受国家大恩，起布衣至将相，位尊禄厚，德流子孙。今又为圣主所优尊，士大夫所归乡如此，谊岂以一身之乐而忘天下之忧哉？伏惟高明深念此意，亟于此时反躬探本，远佞亲贤，以新盛德、广贤业，庶几异时复起，有以格君定国，划弊锄奸，慰斯人之望者。”^⑨在这段话中，朱熹对陈俊卿告归一事给予正面理解，认为是一种功成名就之后的荣归，此后可以过一种超然的生活，其中不乏疏导、宽慰、关切之情。不过，朱熹也借机提出自己对士大夫和为政者的要求，认为像陈俊卿这样的归隐士大夫仍然应当关注天下之忧乐，不能完全与时代脱节；对于为政者而言，应当从陈俊卿告归这件事中得到一些教训，那就是要亲贤



清代贡生张一点摘抄的朱熹《春日》诗

臣，远小人，进而新盛德，广贤业。朱熹看待这件事的视角比较别致，具有比较高的历史站位。

在《与陈公别纸》中，朱熹除了安慰陈俊卿，并指出：“盖在今日，此事利害尤不难见。惟试思平日所以愿忠于国者云何，而反求诸其身，则其得失之数，隐然心目之间矣。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况欲格君心以救一时之祸，此岂细事？而可不责之于吾身，积之于平日，而苟焉以一朝之智力图之哉？”^⑩意犹未尽的朱熹想告诉陈俊卿什么呢？其所思所想恐还在于希望朝廷能“亲贤远佞”，这一理念源自传统的儒家思想。

显然，朱熹没有简单地从荣辱得失的角度看待陈俊卿的告归，而是向陈俊卿提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命题，即强调要增强士大夫的历史责任感，规劝统治阶层奉行传统的较为清明的选人用人规则。在内忧外患的南宋中后期，朱熹这一理念的提出和坚守，具有促进救亡图存事功的重要意义。

淳熙七年（1180）夏天，朱熹致书时任江东安抚使的陈俊卿，鼓动其奏论政事，以格正君心，远斥奸佞。

“夫谏说主于忠诚，不尚文饰，且今日之言有不可缓者，犹救火追亡人也……愿相公因辞谢之章，而因有以附见其说，不必引据铺张，不须委曲回互，直以心之所欲言、时之所甚患者，条件剖析，为明主言之，其所病者乃在于文之过，而不病其不足也。”在向陈俊卿提出具体建议的同时，朱熹还强调要牢牢把握时机，大胆发声，而不应一味沉默不语，从而失去良机。“失今不言，于天下之事固失其机，而在我者不无昧利之嫌，一旦虽欲复有所言，人亦莫之听矣。”^⑪



陈俊卿故里的玉湖书院

朱熹与陈俊卿就官场生态展开的交流，不是泛泛而谈，就事论事，而是更多地针对弊端提出匡正之策。在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能这样做需要有足够的定力和信心。

二

为挽救国运，必须借重人才，朱熹向陈俊卿强调了选贤任能的紧迫性。他指出：“熹窃观古之君子有志于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贤为急。而其所以急于求贤者，非欲使之缀缉言语，誉道功德，以为一时观听之美而已，盖将以广其见闻之所不及，思虑之所不至，且虑夫处己接物之间或有未尽善者，而将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求之不得不博，其礼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诚，必使天下之贤识与不识莫不乐自致于吾前以辅吾过，然后吾之德业得以无愧乎隐微而寔极乎光大耳。”朱熹希望陈俊卿在这方面切实负起责任来。“恭惟明公以厚德重望为海内所宗仰者有年矣，而天下之贤士大夫似未得尽出于门下也。岂明公所以好之者未至欤？所以求之者未力欤？所以待之者未尽欤？此则必有可得而言之者矣。盖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语之间，则道学德行之士吾不得而闻之矣；求士而取之投书

献启之流，则自重有耻之士吾不得而见之矣；待士而杂之妄庸便佞之伍，则志节慷慨之士宁有长揖而去耳。”他认为，江右的广大地区有许多人才，希望陈俊卿能够善加发现和选拔，既达到人才为我所用的目的，又可以改变以往官吏选用上的陋习。“江右旧多文士，而近岁以来行谊志节之士有闻者亦彬彬焉。惟明公留意，取其强明正直者以自辅，而又表其醇厚廉退者以厉俗，毋先文艺以后器识，则陈太傅不得专美于前，而天下之士亦庶乎不失望于明公矣。”^⑫

目前尚没有史料说明陈俊卿对朱熹这番见解如何回应，但在仕宦生涯中，陈俊卿对举贤任能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朱熹在与陈俊卿的交往中，也时时见到陈俊卿出于公心，大胆拔掖人才的事例，对陈俊卿乐于举贤任能及敬重忠义之士给予高度评价。

朱熹在为抗金名将张浚撰写的《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下》中，多处提到陈俊卿与张浚的交集。如“先是，公谓新政以人才为急，人才以刚正为先，因疏当今小大之臣有经挫折而不挠，论事切直者几十数人荐于上，且乞以间暇时数引贤者自近，赐以从容，庶几启沃之间有所广益。复荐陈俊卿、汪应辰可为宣抚判官，有旨差俊卿。”^⑬这里说的是张浚推荐陈俊卿等

人出任新职。此处的“公”指张浚。再如“公既入辅，首奏当旁招仁贤，共济国事。上令条具，公奏虞允文、陈俊卿、汪应辰、王十朋、张阐可备执政，刘珙、王大宝、杜莘老宜即召还，胡铨可备风宪，张孝祥可付事任，马时行、任尽言、冯方皆可备近臣，朝士中林栗、王柅、莫冲、张宋卿议论据正，可任台谏，皆一时选也”^⑭。此处说的是张浚推荐了陈俊卿等一众才干之人出任要职。又如“十一月，有旨召宣抚判官陈俊卿及公子栻赴行在。公附俊卿等奏曰：‘今日之事，非大驾亲临建康，则决不能尽革宿弊，一新令图，鼓军民之气，动中原之心。臣自太上时，已为此谋。盖江南形势实在于此，舍而不为，未见其策。’又奏曰：‘汉文帝初立，有司请早建太子，以尊宗庙，其为天下国家计甚远。愿陛下留意焉。’”^⑮陈俊卿和张浚的儿子张栻被宣召，张浚借机随陈俊卿等人一起向皇上提出御驾亲征及立太子等在当时堪称要务的建议。这里说的是陈俊卿与张浚的密切合作。又如“上见俊卿等，问公动静饮食颜貌曰：‘朕倚公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⑯此处的“公”亦指张浚，朱熹通过皇上召见陈俊卿探询张浚有关情况的描述，说明朝廷对张浚的倚重。

但是，陈俊卿对张浚的支持更多，也更有力量。隆兴元年（1163）八月丙寅，陈俊卿以张浚降秩徙治，上疏曰：“若浚不用，宜别属贤将，如欲责其后效，降官示罚

可也。今削都督重权，置扬州死地，如有奏请，台谏沮之，人情解体，尚何后效之图？议者但知恶浚而欲杀之，不复为宗社计。愿下诏戒中外协济，使浚自效！”^⑰“疏入，帝悟，即复浚都督江淮军马。”^⑱关键时刻仗义直言，大力举荐和支持抗金名将张浚，体现了陈俊卿对救国之才的高度重视，及对有作为、敢担当的重臣的声援，朱熹等人对此是认同的。

陈俊卿担任宰相期间，给朱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其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且善于倾听下属意见。“公为相以用人为己任，所除吏皆一时选。尤抑奔竞、奖廉退，或才可用而资历尚浅，即密荐于上，退未尝以语人。有忽被召对，改秩除用而不知所自者。每接朝士及牧守来自远方者，必问以时政得失，人才贤否。见给舍必勉之曰：‘朝廷政令，安得每事尽善？主上从谏如流，公等意有未安，勿惮举职，朝廷唯是之从，初不以为忤也。’”^⑲从朱熹的这段描述可以看出陈俊卿是一位爱才、惜才、善于用才的重臣，且十分善解人意，这应是其能长期受重用、居高位的原因。

朱熹在致林子方的信中，由推荐布衣曹南升一事，提及陈俊卿重视荐贤。“伏见大礼赦书有荐士之文，而乡人之议，欲以布衣曹南升为请。如熊左史诸长者，皆已列明具状，而某亦已书其后矣。某与之游为最久，知其人为最



玉湖书院一角

深。盖其学问不为空言，举动必循正理，识虑精审，才气老成。虽自中年即谢场屋，而安常务实，不为激发过中之行，本实当世有用之才，非但狷介一节之士也。昨陈献公作帅之日，尝欲论荐，会以移镇不果，论者至今惜之。”^⑩朱熹认为曹南升有许多长处，是可用之才，陈俊卿主政时期便欲拔掖荐用，只是后来陈俊卿调了官职，所以未能如愿，实在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

朱熹在为他人撰写的序文、墓志铭、行状及相关文字中，时时会提到陈俊卿敬重忠义之臣，且善于举贤任能，认为这是陈俊卿从政为官的一大特色。

陈俊卿曾一度在福州主政。期间，爱国名臣李纲的后人汇集李纲生前表章奏札八十卷，于刊刻之前送陈俊卿校阅并求其撰序。陈俊卿在序中高度评价李纲的历史性贡献，指出“予窃怪方虜骑闯城之际，在廷之臣，争为讲解迂避之说。公子然孤忠，殆未易以口舌争，卒能感悟万乘，为坚守之策，以何道而致然？及观公之奏议，明白条畅，反复曲折，其叙成败利害，灼然如在目前。宜乎感动明主之听而亟从之也！使公之谋尽用，则胡骑必无再下之祸。而起勋业可以绍寇莱、韩、范矣。惜乎其夺于逸而不知竟也”。在为李纲境遇抱不平之后，陈俊卿进而断言其是一个学、材、节三者兼备的人物。“世之有其学者，尝患乎无其材；有其材者，尝患乎无其节；三者备矣，然使其辞之不达，则不足以动人主之听；言之不文，则不足以永后世之传；是以君子贵其全也。公学本于经，材见于用，节著于论水灾、赞禅议之日，是其章较，盖天下之所共知焉。”^⑪在请陈俊卿撰序的同时，李纲的后人也请朱熹撰序。朱熹在《丞相李公奏议后序》中同样高度评价李纲的贡献，并提到陈俊卿为李纲文集所作的序言。他指出：“今少傅丞相福国陈公序其篇端，所以发挥引重固已尽其美矣。公之孙晋复使熹书其后以推明之。熹谢不敢，而其请愈力，不得辞也。顾尝论之，以为使公之言用于宣和之初，则都城必无围迫之忧；用于靖康，则宗国必无颠覆之祸；用于建炎，则中原必不至于沦陷；用于绍兴，则旋轸旧京，汛扫陵庙，以复祖宗之宇，而卒报不共戴天之仇，其已久矣。”^⑫朱熹对李纲十分推崇，认为其是一个中流砥柱式的人物，假如生前受到重用，则国势不至于颓败到如此地步。他谦逊地表示，陈俊卿已经对李纲作了系统评价，自己完全赞成，时下所写的相关文字只是建立在陈俊卿评价基础上的发挥。

在《笃行赵君彦远墓碣铭》中，朱熹指出：“淳熙四年冬十有二月戊寅，崇道赵公善应卒于余干私第之正寝。明年，葬县东北华林冈。后六年，今少傅福国陈公乃

大书其碣之首曰：‘皇宋笃行赵君彦远之墓。’于是赵公嗣子汝愚方以敷文阁待制知福州，充福建路安抚使，涕泣手疏，使人奉其书及故荆州牧张侯栻、鄂州守罗君愿所序行实若状两通，致之新安朱熹曰：‘请得铭而刻于下方。’”^⑬赵彦远是朱熹好友赵汝愚的父亲，张栻是张浚的儿子，也是朱熹的好朋友，如前所述张浚与陈俊卿的关系十分密切。这篇墓志铭的引文部分隐含了众多人际方面的信息，但重要之处在于朱熹点明陈俊卿为赵彦远墓碑题字，以此凸显墓主地位的尊崇，也凸显陈俊卿对忠义之臣的敬重之情。

在为曾任兴化军司理参军的福建建宁人黄清臣撰写的《转运判官黄公墓碣铭》中，朱熹指出墓主生前有段时间曾遭遇家丧，生活很贫困，有关方面想接济，但担心其会以“非其义不取”为由加以拒绝。这时陈俊卿伸出援手，推荐他出任新职以缓解生活压力。“陈正献公时在从班，应诏举公可奉使典州。丧毕，除知南雄州。”黄清臣不负陈俊卿之期盼，在南雄州任内做出了成绩。“公至，一切罢之，人以便安，而郡亦未尝乏事也。州故与建、饶、赣州代输坑冶司岁贡白金各若干两，故事皆取于民以办。公请以郡大小为差，诏悉蠲之，郡人赖焉。”^⑭

在为曾任漳州龙溪丞、左宣教郎，知福州闽县的南剑州人张维撰写的《右司张公墓志铭》中，朱熹指出，某个时期张维曾在官场遭遇挫折，陈俊卿及时给予帮助。“会陈正献公知建康府，辟公通判府事，事无大小悉委。又遣摄守当涂，吏戢而民安之。朝廷亦知其治行，擢以为广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⑮

有意思的是，在朱熹的观察视角中，善于选拔人才和敬重忠义之士的陈俊卿，自身也被朝中大臣作为人才向皇帝加以推荐。朱熹在为刘子羽的儿子刘珙撰写的行状中指出，任观文殿学士的刘珙因身体原因请求退休时，上书皇帝对陈俊卿给予高度评价。朱熹引述了刘珙的相关言论。

“若群臣之贤，臣所知者则唯陈俊卿忠良确实，可以任重致远。张栻学问醇正，可以拾遗补阙。愿陛下亟召用之，则众贤汇进而群小黜伏矣。”^⑯通过刘珙的话，朱熹想表达的意思很明确，那就是在国难当头之际，陈俊卿等人就是贤良忠臣，应进一步受到重用，从而使之能够“任重致远”。

三

朱熹在与陈俊卿的交往中，深深感受到陈俊卿对自己的知遇之情。

陈俊卿对朱熹的才识十分赏识，对其理学思想很认同，常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向朝廷引荐朱熹，希望其能够得到重用。朱熹对出仕不在意，甚而有些畏惧，乃至抵触，但对陈俊卿的好意很是感激。诚如有研究者所言，“陈俊卿与朱熹差不多为同时代人，陈俊卿年长朱熹十余岁，也比朱熹早卒十余年。陈俊卿在朝中执政时，虽身居高位，对于朱熹的道德文章却甚为钦佩，屡屡向宋孝宗举荐朱熹。朱熹为其他官僚所攻击时，陈俊卿亦屡屡加以保护”^{②6}。

《宋史·朱熹传》称：“陈俊卿以旧相守金陵，过阙入见，荐熹甚力。宰相赵雄言于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则人之誉之愈众，无乃适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长而用之，彼渐当事任，能否自见矣。’上以为然，乃除熹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旋录救荒之劳，除直秘阁，以前所奏纳粟人未推赏，辞。”^{②7}这段话似乎是较早的关于陈俊卿举荐朱熹的历史记录。

乾道元年（1165）春正月，陈俊卿入为吏部侍郎，与丞相陈康伯及重臣汪应辰共同推荐朱熹出任官职。朱熹在《陈俊卿行状》中谈及此事时，认为当时必是陈康伯、陈俊卿之荐，而汪应辰从中推挽。在《与陈侍郎书》中，

朱熹指出：“昨者伏蒙还赐手书，慰藉甚厚，拜领感激，不知所言。而奉祠冒昧之请，又蒙台慈引重再三，卒以得之所欲。所示堂帖，谨以祇受，仰荷恩眷，尤不敢忘，而不知所以报也。盖熹赋性朴愚，惟知自守，间一发口，枘凿顿乖。度终未能有以自振于当世，退守丘园，坐待沟壑而已。今以阁下之力得窃廩假，以供水菽之养，其为私幸，亦已大矣。顾于义分犹有僭冒之嫌，而阁下推挽之初心犹以为不止于此，此则岂熹所敢闻哉！”^{②8}上述话语并不纯然是一种官场上的客套话，而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表明对陈俊卿的引荐很感激。

乾道三年（1167）正月，汪应辰致书时任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的陈俊卿，极力推荐朱熹。“庙堂登用正臣，中外拭目，以观举直措枉之政。然右府之事，固亦有未易为者。窃谓如刘宾之、龚实之、刘子驹纵未还朝，岂易久置闲散？朱元晦直谅多闻，然已除武学博士，今若更除都下一差遣，其人必有以报补知遇，裨赞盛德。”^{②9}此事得到陈俊卿的赞成和支持。

乾道三年（1167）十二月，朱熹在豫章得到陈俊卿除参知政事、刘珙除同知枢密院事的消息，遂投书刘珙，为其出谋划策。当月，陈俊卿和刘珙推荐朱熹担任枢密院



陈俊卿故居内景

编修官。《宋史·朱熹传》指出：“陈俊卿、刘珙荐为枢密院编修官，待次。”

尽管陈俊卿希望朱熹能出任官职以充分发挥才干，并为此多次向朝廷力荐，但朱熹始终坚持己见而不仕，这其中有所谓的不得已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其志向不在此。不过，朱熹也没把话说绝，预留了一些余地，表示今后有机会还是可以出任官职。

乾道五年（1169），朱熹在《与陈丞相书》中先是表示上封信语言直率，担心会引起陈俊卿的不快，甚至遭到遣斥。陈俊卿在复信中却“抚存开纳，礼意勤厚”，这使朱熹很感动。“伏读三叹，有以见明公位愈高而心愈下，德弥盛而礼弥恭，果非小人之腹所能料也。”同时，向陈俊卿表明自己不愿接受征召出任官职，而只愿用力于古人之学，阅天下之义理。“岂不知外有君臣之义，内有母子之情？而平生知己如明公者，待之又不为不厚，岂不愿及明时，效尺寸以报君亲，酬知遇，而直逡巡退缩，以求守此东冈之陂乎？此其中必有甚不得已者。惟明公幸察焉，而听其所欲，使得窃祠官之禄以养其亲，而自放于荒闲寂寞之境，以益求其所志，庶乎动心忍性，涵泳中和，赖天之灵，得遂变化其狂獗朴愚之质。则异时明公未忍终弃，犹欲熏沐而器使之，其或可以奉令承教而不敢辞也。”^⑩

时隔不久，乾道五年（1169）七月十四日，朱熹再次向陈俊卿表示自己短期内无法出仕，希望能够得到陈俊卿的理解。“不肖之身非敢自爱，诚惧仰负相公手书招徕之意，重玷听言待士之美，则其为罪大矣。伏况老亲行年七十，旁无兼侍，尤不欲其至于如此，日夕忧烦，几废寝食，人子之心，深所不遑。是敢再沥悃诚，仰干大造。欲乞检会前状，特与陶铸岳庙一次，俾得婆娑丘林，母子相保，遂其麋鹿之性，实为莫大之幸。情迫意切，不知所言，伏望慈俯赐怜察。”^⑪ 娱亲、躬行孝道，这在封建时代似乎是一个婉拒出仕的有说服力的理由，朱熹也以此来作为自己暂时不仕的理由。

淳熙五年（1178），陈俊卿除江南东路安抚使，赴阙奏事时途经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与朱熹相晤。不久，陈俊卿借入对之机又面荐朱熹。朱熹在《陈俊卿行状》中指出，“熹之不肖，公前后盖尝三荐之，而赴建康时对话尤切，然熹皆莫之知也。”由此可以看出，陈俊卿对朱熹的学识与才干评价颇高，一直求出山而不得，表明其是一个识才爱才的良臣。通情达理的陈俊卿虽然对朱熹的不仕很遗憾，但不好再做坚持。

宋代著名学人刘克庄是陈俊卿的莆田同乡，他在《朱

文公与陈丞相帖跋》中，对陈俊卿的力荐与朱熹的多次婉拒出山进行分析和推断。他认为“文公受孝皇知，当时元老大臣，多敬事公为天下学者尊师，惟不为时相王鲁公所喜。或云因按发唐台州而然。夫为天下宰，当平其心，愿以一乡人芥蒂胸中乎？文公与陈福国帖云：‘除书朝下，劾章夕闻’，亦足见其不容于时之大意。盖曰主眷，曰人望，曰公论，至此皆不足恃，而相权亦可畏矣。若夫上无人主之知，次无元老大臣之助，下无天下之誉，又值鲁公辈当国，止有山林一路，别无他法”^⑫。作为晚辈的刘克庄认为，尽管陈俊卿一再推荐，但不容于当政者的行事风格，使得朱熹对出仕一度意愿不高。

尽管如此，陈俊卿对朱熹的多次举荐表明其在识才方面确有过人之处。这样做不仅是因为与朱熹交好的缘故，更在于认识到对朱熹的使用有助于人尽其才，进而有助于改革朝政，匡正时弊。

四

朱熹在与陈俊卿的交往中，交流了对家庭教育及妇女守节等问题的看法，还应邀对陈家子孙进行教育。

陈俊卿重视家庭教育，出于对朱熹学识的景仰和彼此情感的相通，他将子女教育的重任委于朱熹。

淳熙十年（1183）十二月，朱熹到莆田住在白湖陈俊卿宅第东偏的仰止堂。陈俊卿的儿子陈守、陈定、陈宥，及孙陈厚、陈址等都执弟子礼向他问学，朱熹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孟子集解》赠送给他们。黄榦在《陈师复仰止堂记》中描述朱熹这位道学夫子与陈俊卿这位两朝元老的相知时说：仰止堂者位于丞相正献陈公旧第之东偏，朱熹尝在此设馆，堂之面其山曰壶公。壶公山乃莆田名山，黄榦认为其峻拔端重，若正人端士翔拱而进也。“文公之馆于此，正献公之子皆抠衣焉。”这表明，仰止堂是朱熹应邀对陈俊卿子孙进行教育的地方，后来更成了理学南传的重要所在。

陈俊卿多次邀请朱熹到莆田讲学论道，为子孙们授业，“凡三至焉”。乾隆《玉湖陈氏家乘》上册引《八闽通志》所载称，陈俊卿的儿子陈守、陈定、陈宥均受业于朱熹，所谓“子守、定、宥俱从朱熹受学焉”。陈守字师中，以荫历工部员外，“凡六受郡符，三持使节，以廉介称”。陈定字师德，早颖异，朱熹告以圣贤之学，认为必自近而易者始，遂反而求之。后以父荫任右承奉郎。

朱熹对陈俊卿子孙的教育很上心。在《与陈丞相别纸》中指出，“蒙谕第二令孙为学之意，乃能舍世俗之所

尚，而求夫有贵于己者，此盖家庭平日不言之教有以启之，非面命耳提之所及也。熹尝闻之师友，《大学》一篇，乃入德之门户，学者当先讲习，知得为学次第规模，乃可读《语》《孟》《中庸》。先见义理根原体用之大略，然后徐考诸经，以极其趣，庶几有得。盖诸经条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读《大学》《论》《孟》《中庸》，令胸中开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为学之初，尤当深以贪多躐等、好高尚异为戒耳。然此犹是知见边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资谈说，则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当谨守力行，乃为学问之实耳。伊洛文字亦多，恐难遍览。只前次所禀近思录，乃其要领。只此一书，尚恐理会未彻，不在多看也。《大学》《中庸》向所纳呈谬说，近多改正，旦夕别写拜呈。近又编《小学》一书，备载古人事亲事长、洒扫应对之法，亦有补于学者。并俟录呈，乞赐裁订，以授承学也。”^③在这封信中，朱熹提出了为学的几个著名原则，如道德行为方面的言传身教，治学方面的循序渐进，以及学以致用、学用结合。表面上看谈的是方法问题，实际涉及教书育人的本质。有意思的是，上述代表朱熹教育思想精髓且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教育原则的提出，是借与陈俊卿谈论子孙教育的时机提出的。

在《与陈丞相书》中，朱熹向陈俊卿强调了子弟“得师择友”的重要性。“井伯书云，廉夫有学《易》之意，甚善。然此书难读，今之说者多是不得圣人本来作经立言之意，而缘文生义，硬说道理。故虽说得行，而揆以人情，终无意味。顷来盖尝极意研索，亦仅得其一二，而所未晓者尚多。窃意莫若且读《诗》《书》《论》《孟》之属，言近指远而切于学者日用功夫也。抑尝闻之，元城刘忠定公有言，子弟宁可终岁不读书，而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极有味。大抵诸郎为学，正当以得师为急，择友为难耳。”^④文中的“廉夫”指陈俊卿的孙子陈址。朱熹这些关于子弟教育的观点，契合了传统的儒家教育理念。同时，针对时代特点而有所出新，主旨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加以表达，可操作性强，能较快收到成效。

因教育而结缘，朱熹与陈俊卿的子孙们便有了许多交谊，彼此间感情深厚。

陈俊卿的儿子陈定去世后，朱熹为之撰写《陈师德墓志铭》。指出：“师德莆田人，姓陈氏，名定。丞相信安公之第三子也。母曰福国夫人聂氏。师德生秀异，自孩幼已有成人之度。年十二三，则已知古人为己之学而不屑为举子之文矣。一日，以公命，因予友括苍吴君耕老以书来道其志而请业焉，予三复其辞而嘉之，然亦意其必已淫

思力索于空幻恍惚之场也，则报之曰：‘圣贤之学虽不可以浅意量，然学之者必自其近而易者始。’师德于是始欲因予言而反求之，既疲于宿昔思虑之苦而感疾殆矣。其后屡欲求见，且将遍求世之有道君子而师友之，竟以病不果行。且死，犹语其友方耒耕道，使言于予，以不及相见为深恨。明年，其仲兄守师中见予于建阳，遂以耕道所状行实一通属予铭其窆。予不忍辞也。”在朱熹的笔下，陈定对于传统的举业并不上心，而是在其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努力尝试着践行理学的一些理念。朱熹对陈定的德行、学识印象深刻，指出“状言，师德性至孝，事信安公及母夫人曲尽爱敬，剂和烹饪必躬必亲，左右周旋不违义理而未尝失颜色，于兄弟尤友爱。以公奏授右承奉郎。娶同郡林氏，朝请郎一鸣之女，年二十有五，以淳熙甲午七月乙亥卒。于其疾之革也，公夫人往视之，谓曰：‘生死有命，汝所知也。’师德拱手对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顾其兄，属以问学修身之意，越夕而逝。公夫人哭之哀，以其伯兄之子福孙后之，而葬之石泉祖莹之侧。”从朱熹的这段叙述可以看出，陈定虽身在相府，但没有贵家公子的习气，而是谦恭谨慎，临终前还与兄长讨论问学修身之事，这令朱熹很有感触。他指出“自周衰，官失而民无常产，士不知学。或者务为剽掠篡组之工以希名射利，盖本出于俯仰寒饿之迫，有不获已者。而后或更以为能焉，俗弊风讹，迭相夸尚，于是公卿子弟之才者往往亦慕而为之，无所于迫而徒取衒鬻之羞。顾反薄君恩、轻世禄，捐本学以从事于场屋无用之文，举世竞驰，恬不觉悟。而圣贤修己治人之方，国家礼义廉耻之教益泯泯矣。呜呼，斯其为弊也久矣！不有卓然高志远识之士，其孰能有以反之哉？如吾师德者，盖庶几焉。而又不及就其志而疾病以死，其亦可哀也已”^⑤。朱熹认为，自古以来世家子弟中出现两类人：或不劳而获、坐以守成，或陷于场屋之中以追逐科举出仕为人生目标。圣贤的修己治人之说，封建国家的道德要求，因此而逐渐被弃之不顾。在这种大背景下，陈定所具有的卓然、高志、远识便显得愈加珍贵。对他的英年早逝，朱熹表达了深切的哀悼之情。

朱熹不仅为陈俊卿的儿子写墓志铭，还为陈俊卿的孙子陈址也写了墓志铭。“陈廉夫，名址，莆田人，故少师、观文殿大学士、赠太保、魏国正献公之孙，今朝请大夫、新提举福建路市舶寮师是之子。厚重明敏，自幼即有志于学，正献公奇爱之。用致仕恩，奏授承奉郎，转承事郎，差监镇江府户部大军仓。未赴，丁母忧，再调监泉州南安盐税。庆元三年七月二十有二日卒，享年二十有

八。娶兵部侍郎岳公霖之女，女子一人。师是将以庆元四年十一月三日祔廉夫龙汲山正献公大坟之右，以其尝学于余也，使来谒铭。余以老病，久废笔札，恋悲廉夫之贤而不克就其志也，不能文，故记其实，请刻石纳圻中。”^⑧朱熹在这篇不长的墓志铭中透露了丰富的信息，从中可知陈址从小就展示出励志向学的良好状态，但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而是凭借祖荫担任了一些中下级职务，年仅二十八岁就去世了。此外，朱熹还透露陈址与他有师生之缘。在陈址的父亲将其葬于祖父陈俊卿墓旁之际，尽管朱熹因老病而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动笔，但还是满怀悲伤之情写下这篇文章。

从朱熹对陈定、陈址生平事略的介绍，可知他们没有参加科举考试。那么朱熹是否对他们进行过举业训练呢？日本东京大学的小岛毅于20世纪90年代撰写《闽南朱子学之形成》，指出：“陈俊卿的三个儿子，是守、定、宓，尽管朱熹授过举业，都终是不及第，除了二十五岁夭折的定，是由于父亲的恩荫任官。南宋时期，若是宰相的息子，虽然不登进士第，也可以得了相当高等的官职。”^⑨朱熹是否为陈家子弟授过举业，这有待查考。从朱熹一贯秉持的教育思想而言，其不屑于埋首场屋，可能更多地向陈家子孙传授传统的儒家学说，介绍自己的理学理念，多个事例表明这样做受到教育对象的欢迎。

除对陈俊卿的子孙进行教育外，朱熹还曾与陈俊卿探讨理学中的有关命题，如妇女的守节问题，并以陈俊卿的女儿守节一事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朱熹先是与陈俊卿的儿子陈师中进行讨论。朱熹指出：“自明之亡，行且期

矣，念之怛然，痛恨如新。不知向来所喻编次文字，今已就否？渠所立自足以不朽，然其议论曲折，亦不可不使后人闻之也。其家事复如何？朋友传说令女弟甚贤，必能养老抚孤，以全柏舟之节。此事更在丞相夫人奖劝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没为忠臣，而其室家生为节妇，斯亦人伦之美事。计老兄昆仲必不惮赞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伏况丞相一代元老，名教所宗，举错之间，不可不审。熹既辱知之厚，于义不可不言。未敢直前，愿因老兄而密白之，不自知其为僭率也。”^⑩不久，朱熹直接致信陈俊卿，就其女儿守节一事再次发表自己的意见。“自明云亡，忽将期岁，念之令人心折。其家想时收安问。熹前日致书师中兄，有所关白，不审尊意以为何如？闻自明不幸旬月之前，尝手书《列女传》数条，以遗其家人，此殆有先识者。然其所以拳拳于此，亦岂有他？正以人伦风教为重，而欲全之闺门耳。伏惟相公深留意焉。”^⑪陈支平教授认为，朱熹的这些言论之所以经常为后人引述评说，是因为内容涉及一个至今依然相当敏感的命题，即宋代理学家们所主张的妇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节问题。

“论者或以此为据，坐定朱熹主张妇女守节、禁锢女性的婚姻自由；或以为朱熹更主张士大夫们要有守节的品德，对于一般民众而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命题，‘诚为迂阔’。但是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封书信，则这封信里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是朱熹与莆田玉湖陈家的深厚相交之情。试想，陈俊卿之女守节改嫁与否，是别人的家

事，一般外人是便多提意见的，更何况涉及他人闺阁之隐私。而朱熹抱定‘既辱知之厚，于义不可不言’的心态，希望陈俊卿能够规劝女儿守节，成为社会的楷模、道德的标杆。这其中的殷殷之情不难想见。”^⑫确实，朱熹一再希望陈俊卿父子率先垂范，带头践履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表面看有其固执的一面，但从深层次探究，朱熹显然是希望通过陈俊卿这样的重要人物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坚守，来验证理学思想的



陈俊卿修建白湖顺济庙

合理性和可行性。

朱熹深度介入陈俊卿子孙的教育，及由陈俊卿女儿守节一事引发关注并与陈俊卿父子进行讨论，表明两人的交谊层次远在同时代的其他友朋之上。

五

陈俊卿逝世后，朱熹对其一生行迹进行全面总结，并给予高度评价，为两人的交往画上圆满的句号。

淳熙十三年（1186）十一月，陈俊卿去世。淳熙十四年（1187）正月，朱熹赴莆田吊唁陈俊卿。淳熙十五年（1188）十二月，朱熹撰写了数万言的《少师观文殿大学士致仕魏国公赠太师谥正献陈公行状》，详尽回顾了陈俊卿一生的行迹，着重总结了陈俊卿为政期间的主要贡献。如任殿中侍御史时，“首为上言人主以兼听为美，而存心必本于至公。人臣以不欺为忠，而论事必达于大体。反复推明，引今附古，词指温厚而正直之气凛然不可犯，上固异之。”^④任中书舍人等职时，主张整军备战，支持名将张浚北伐。同时，提出十条建议：定规模、振纪纲、励风俗、明赏罚、重名器、遵祖宗之法、杜邪枉之门、裁任子之恩、限改官之数、蠲无名之赋。“其杜邪枉之说曰：‘比年以来，左右近习稍有以名闻于外者，士夫奔走趋附，将帅纳赂买官，远近相传，道路以目。愿深察而痛惩之，无使或为圣德之累也。’”^⑤在“除吏部侍郎，寻兼侍读，同修国史”期间，向皇帝谏言应当革除积弊，起用人才，振兴朝纲。“‘今日积弊千条万端，朝廷非不知之，而不能革者，盖大臣受任不专，用事不久，不能以一身当众怨，而风俗颓弊，人各有心，上所建立有不利于己者，则兴讹造讪，百计倾摇，必罢之而后已。愿诏大臣力任此责，合群议而讨论之，力行坚守，必冀有成，则风俗变而纪纲立矣’。又言：‘人才者，国家之命脉也。而论人才者，又当以气节为主。祖宗盛时，作成涵养，名公巨人杰立角出，争以气节相高。’”^⑥任吏部尚书时，向皇帝谏言“‘今日人才衰少，士气不振，若必求全责备而后用之，则遗贤多矣。要当君臣一意，公听并观，略人细过而取其大节，去己私意而徇夫至公，则人才彬彬，出为时用矣。’又言：‘为政而不行甚者，必改而更化，此先儒之格言也。然臣窃以为一时之敝政可更，而祖宗之成法不可改也。就所当更，亦必计之审，议之熟，然后可更。既已更之，则当守之不变，而不可以屡更也。’”^⑦在变革朝政方面，陈俊卿不墨守成规，但主张审慎地进行改革，不可随心所欲，屡屡变更，应当保持改

革的稳定性。对于皇帝的出格行为，陈俊卿也能直言不讳地提出谏言。朱熹指出“时上犹未能屏鞠戏，又将游猎白石。公上疏立谏，至引汉桓灵、唐敬穆及司马相如之言以为戒”。担任宰相期间，陈俊卿“每劝上亲忠直、纳谏诤、抑侥幸、肃纪纲，讲明军政，宽恤民力。用人之际，随才任使，未尝求备”。同时，整顿军队，减轻地方经济负担，收到良好效果。“异时统兵官不见执政，无以别其能否。公日召三数人从容与语，察其材智所堪而密记之，以备选用。减福建钞盐岁额，罢江西和采、广西折米盐钱，且蠲诸道累岁逋负金谷钱帛以巨亿计。”^⑧后来，陈俊卿请求辞去宰相一职，“以观文殿大学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抚使”。在此期间，朱熹评价他“政尚宽厚而严于治盗”。如亲自指挥平定定海水贼倪郎，使海道恢复畅通。同时，去除“冒滥改官者三十员”。陈俊卿还反对推行加重百姓负担的税法，强调与民生息，增加百姓收入。在“改判建康府、江南东路安抚使，兼行宫留守”后，直言不讳地向皇帝进言，要求改变“坏朝廷之纪纲，废有司之法令，败天下之风俗，累陛下之圣德”的现象。朱熹对陈俊卿在建康任上的表现给予极高评价。“公去建康，至是盖十五年。父老喜公之来，所至相聚以百数，焚香迎拜，如见亲戚。公为政平易宽简，悉罢无名之赋。府有军屯，异时多为民害。公为出令，犯者当取旨以军法从事，诸军肃然。行宫扃钥别以宦者主之，留守待之如部使者礼。时节按行殿中，则宦者置酒自坐东偏，而留守顾为客，甚或邀去就饮其家。公悉数罢之，宦者浸不乐，而不能害也。”^⑨朱熹还披露了陈俊卿晚年作为朝廷重臣而受到尊崇的情况，指明其虽然享有很高的地位和声望，但始终不居功自傲，而是低调行事，尽可能地推辞朝廷给予的各种封号和礼遇。

朱熹十分详尽地描述了陈俊卿去世前的情景。“十三年十一月属疾，二十一日疾革。夜半，手书一纸示诸子曰：‘予病，恐不能自还。生死大数，无足悲者。白屋起家，致身三少。报国无功，叨荣有颺。获死牖下，尚复何云！遗表只谢圣恩，无得祈求恩泽。死之后百日入葬，不用僧道追荐等事。吾欲以身率薄俗，汝等不可违也。无功无德，无得立碑请谥。汝等力学善为人，惟忠惟孝，可报国家，此外无可祝。’命妇女出寝门，顾谓中子守曰：‘遗表惟以选用忠良、恢复竟土为请可也。’翌旦，整冠敛衽，神气静定，安卧而薨。先是，郡之镇山壶峰大石崩墜，声闻数里。是日，地复大震，乡人异之。”^⑩若去除其中的神秘文化色彩，则朱熹的这段描述既平实、客观，又极具冲击力，一个临死要求丧事从简，不用僧道追荐，

且不忘向上进言选用忠良、恢复中原的忠心耿耿的老臣形象跃然纸上。

陈俊卿去世后，朱熹还写有《祭陈福公文》，从多个层面对陈俊卿予以高度评价。有德方面的评价，如“大节昭然，善终善始，中兴辅相，比立豪英”。有学识方面的评价，“惟诚惟一，众善毕随。士于见闻，以为多富，公无不窥，不以博著。”有执政能力的评价，“执法于中，不专为直。大奸既除，国论斯一。承流于外，不一于宽。苛烧不作，闾里自安。中坐庙堂，宏纲是总。主德既修，民听不耸。”有忠诚度方面的评价，“从容一言，拔佞移宠。帝纳其忠，人服其勇。晚而告休，税冕遗绅。安车驷马，归卧里门。进不出位，退不忘君。”朱熹还对自己与陈俊卿的交往做了一番总结，并表达了深切的怀念之情。

“我从公游，出入三纪。晚途间关，遂托知己。千里赴义，一觞荐诚。想公如在，洒泪同倾。”^⑧字里行间，其义可见，其情可感，令人读后印象深刻。

显然，朱熹对陈俊卿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从政经历和主要贡献十分了解，于翔实的叙述中凸显了陈俊卿在南宋朝野中的重要影响，为我们展示了陈俊卿忠君爱国、勤政廉政的事迹。同时，表明朱熹与陈俊卿之间交往数十载，相知甚深，是志同道合的挚友。

随着陈俊卿的去世，两人的交往宣告终结，但朱熹与陈俊卿后人的交往，以及朱熹女婿黄榦与陈俊卿后人的交往都在持续。其中，陈俊卿的儿子陈宥拜黄榦为师，承继了朱熹和黄榦的理学思想，并将之推陈出新，形成理学发展中的一些新特点，被当今学人视为重要的朱子门人，也是福建朱子学的重要传承人。这一事实本身表明，由朱熹与陈俊卿播下的友谊种子，在下一代人的努力下结出了丰硕的学术之果。

六

通过对朱熹与莆田名儒陈俊卿交往这一命题的粗略探讨，笔者认为应简要厘清以下一些问题。

朱熹与陈俊卿交往，是否与陈俊卿在南宋官场上地位较高、身份多元有关？是否与陈俊卿多次推荐朱熹出任官职有关？笔者认为可能存在这些因素，但更多的是与两人理念相同，对大的朝政问题和人物的评价相对一致，以及有着重叠交叉的朋友圈等密切相关。

在朱熹与陈俊卿的交往中，有对朝政的具体建议，有对个人和家庭情况的交流，有许多推崇的话语，也有直言不讳的批评。如何解释这种现象？笔者认为这表明两人相

知很深，且交往方式颇具古风，双方在精神层面上处于平等状态。在类似朱熹和陈俊卿这样高层次人群的交往中出现这种现象应不是孤例。

朱熹视角中的陈俊卿是一位正直、敢言、廉洁、务实的有影响的朝中大员，还是一位能上能下的官员，既能在中央从政，也能在地方任官。朱熹对陈俊卿在官场上扮演角色的变动似乎并不在意，这是为什么？最大的可能在于朱熹本人入职为官的意愿始终不高，对于仕途看得很淡，在意的是谋求理念的施行和对封建国家一统的维护，这使其处于一种相对超然的状态，对陈俊卿官职升降的看法自然明显异于常人。

朱熹是否试图通过陈俊卿来影响朝政，从而发挥一种隐形的作用？不可否认有这种因素存在。陈俊卿长期在朝，相对而言朱熹长期在野。一个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官员，一个是名气很大的理学名家。两人在革新朝政、去除积弊等方面互通声气，互相扶持，试图有所作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后人而言，应当更多地关注他们这样做的良善动机。至于陈俊卿在多大程度上受了朱熹的影响，及朱熹受陈俊卿影响的程度有多深，都有待深入查考。

就现有能看到的相关文献而言，朱熹在与陈俊卿的交往中，谈论纯粹的学术与文化层面的内容不多，这对区域的学术与文化发展能有影响吗？笔者认为，由于朱熹所拥有的学术大师的身份，以及陈俊卿本人和家族成员笃信理学，使得两人交往的事实本身，对区域性的莆田学术与文化的发展，乃至学术源流的接续，都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意义。后来莆田成为学术名区，及出现多位有影响的理学人物的事实，都能为此提供佐证。

朱熹与陈俊卿在交往中是否只讨论那些相对严肃的朝政与社会问题？当然不是，两人的关系是多元的。如他们还是诗友，互有诗作往返讨教。淳熙十年（1183）四月，朱熹筹划许久的武夷精舍修成，陆游等人赋诗祝贺，陈俊卿也寄来贺诗，对此朱熹十分重视。在致林井伯的信中，指出“福公书来……又蒙寄惠武夷长句，平易宏深，真有德者之言也。欲作书和韵，附此便致谢，以‘零’字韵险，捏合未成，且俟后便”。在《答林择之》中又云：“福公为赋武夷诗，押‘零’字，更和不得，遂至今未得报谢其书。两日前方和得成”^⑨。也是在这一年，朱熹到福州与地方主官赵汝愚相会，并就开浚福州西湖提出建议。陈俊卿为此撰有《西湖纪游》，可视作为对朱熹、赵汝愚等人开浚之举的回应和支持。

朱熹视角中的陈俊卿是一位形象丰满的人物，这为

我们了解那个时期莆田籍重要人物的行为和影响力提供了难得素材，但意义远不止于此。对国是、朝政和恢复中原的共同关注和努力，对选贤任能的高度共识，使得两人的交往具有重要的时代内涵和历史背景，从而也具有了显而易见的积极意义，这值得充分肯定。还应当指出的是，在一个不大的区域内，两人的交往并不是一个孤例。同一时期，朱熹与莆田的多位名士（如林光朝等）都有所交往，这种现象值得进一步关注与探讨。

注释：

① ④ ⑪ ⑲ ④⑨ 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9页、345页、672页、366页、773页。

② ⑳ 邓广铭、漆侠：《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10页、210页。

③ ⑧ ⑳ ⑳ ⑳ 《朱熹集》二，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022-1025页、1031-1033页、1021页、1034页、1042页。

⑤ ⑥ ⑦ ⑨ ⑩ ⑫ ⑬ ⑭ ⑮ ⑯ 《朱熹集》三，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150页、1150-1151页、1152页、

1078页、1079页、1627-1628页、1135页、1152页、1127页、1128页。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朱熹集》八，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875页、4890页、4878页、4879页、4927页、4690页、4719页、4735页、4964页、4623页、4797页、4905页、4913页、4916页、4918页、4924页、4940页、4943页、4487页。

⑳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5年，第814页。

㉑ 《朱熹集》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451页。

㉒ ㉓ 《李纲全集》，岳麓书社，2003年，第1页、3页。

㉔ ㉕ 陈支平：《朱熹及其后学的历史学考察》，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17页、419页。

㉖ 《朱熹集》十，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822页。

㉗ 涂庆澜：《莆阳文辑·国朝莆阳诗辑》，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2页。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陈俊卿在家乡的白湖畔度过晚年岁月



位于福州三坊七巷的陈寿祺故居

陈寿祺对 林则徐的影响

■ 萧忠生

摘要 本文主要论述林则徐与陈寿祺的亲密关系，陈寿祺的爱国事迹、人品和学识等对林则徐的影响。

关键词 林则徐 陈寿祺 经世致用

作者 萧忠生，福州市社科院副研究员，原副院长（福州 350011）

林则徐善于与志同道合的人交朋友，且十分敬重自己的老师和长辈，陈寿祺就是其交往圈中的一位重要人物。

陈寿祺生于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是清代著名的儒学家，对汉学、宋学等都有很深的研究，人们还称他为教育家、汉学家和经学家。陈寿祺字恭甫，又字介祥、

莘仁，号梅修、左海，晚年游武夷，爱大、小隐屏峰，又号隐屏山人。陈寿祺是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家住城内黄巷，与梁章钜毗邻。其祖父陈起龙弃农读书。父亲陈鹤书有才能，以岁贡生主讲龙岩、仙游、邵武等县书院。陈寿祺幼承庭训，五岁开始读书，能过目成诵。六岁从名师周立岩学习。他“举止端重，性静且敏，成童即淹贯群

籍，一览辄解，文藻博丽，有六朝三唐风格”^①。十五岁时补县学生员，出闽中著名经师孟超然之门。孟超然六十岁寿辰时学生们做寿文以贺，孟超然都不大满意，最后才说：得陈寿祺的寿文便可以了。

乾隆五十二年（1787），台湾林爽文聚众起义，清政府派福康安率部前往平息。陈寿祺为此撰写《海外纪事》诗，为诗人萨玉衡所称赞。及福康安平台后返回，十七岁的陈寿祺又作《上福康安百韵诗并序》，传诵一时，人称才子。乾隆五十四年（1789），陈寿祺考中举人。嘉庆四年（1799），陈寿祺赴京参加会试，最初试卷被分房考官所遏，幸座师阮元向主考朱珪大力推荐才被录取。此后，陈寿祺便成为阮元的得意门生，其才华得到重视。陈寿祺对阮元的为人、惜才等非常敬重和钦佩。

陈寿祺考中进士后，初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嘉庆六年（1801），授为编修。在京时，与武进张惠言、高邮王引之等以治经学齐名。不久，陈寿祺请假回闽探亲，途经杭州。时阮元为浙江巡抚，便问道：大考期近，你应考后有授任机会，为何急忙回去？陈寿祺回

答说：祖父母和父母都年高老迈，家贫生活无着。阮元同情其处境，便留陈寿祺主讲杭州敷文书院，并教读经精舍生徒，又命其修《海塘志》。此间，阮元正聘请一批学者编纂群经古义为《经郭》数百卷，请陈寿祺担任主持，并拟定了义例。陈寿祺亦同时自撰《五经异义疏证》，后来此书成为经学名著。嘉庆八年（1803），陈寿祺回京。随后，到广东、河南担任乡试副考官。这两次乡试，陈寿祺都亲阅二、三场所有落卷，其认真查卷和选拔人才的精神实在可贵。嘉庆十四年（1809），任会试同考官，京察一等，记名御史。陈寿祺在京数年，还任文渊阁校理、教习庶吉士、国史馆总纂等职。嘉庆十五年（1810），陈寿祺丁忧，回福州为父亲守制。此后，他决定留在家中侍奉母亲，绝意仕进。其间，有人要向朝廷保举，陈寿祺都谢绝。嘉庆十七年（1812），福建巡抚张师诚入朝，皇帝命他将御制《全史诗》带回交学者编定，张师诚就请陈寿祺主持办理此事。陈寿祺按期完成任务，张师诚很满意。

陈寿祺在福建，先后执教仙游书院、泉州清源书



广东虎门林则徐像

院。他励行儒家的传统思想教育，以经学传授学生。道光二年（1822），母亲去世，陈寿祺回里守制。服满后，有人再荐举陈寿祺到朝廷任职，然其笃志学术，终老不仕。后来，他被聘主讲鳌峰书院，任山长，时间达十余年。他严定书院的管理制度，写有《拟定鳌峰书院事宜》和《鳌峰崇正讲堂规约八则》等。鳌峰书院地址在福州鳌峰坊，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由福建巡抚张伯行创建，为福州四大书院之一，是当时福建的著名学府。历任主讲多宿儒名师，闽人之出鳌峰而砥行立名者甚多。陈寿祺在鳌峰书院首重考核学生品德，后考文艺，订立规章，整顿课程。他发扬经世办学思想，提倡“儒者穷经将以致用”，认为“平日探索典训，辨核是非，讨论古今，通知时务，处可立言以传世，出开敷政而佐时也”。陈寿祺教育学生读书，不但要读“四书五经”，而且“经解策问尤皆诸生所当究心”。他把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杨士奇等的《历代名臣奏议》等都作为学生必读之书，认为“通知古今，可施实用，此皆问政之津梁也”。他思想开明，重视经世致用，在讲课时教诸生修身励学，以崇廉耻，践礼法，研经术为尚，并作《义利辨》《知耻谈》《科举论》以示学者。在《义利辨》中，他突破传统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维模式，认为“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惟以利物为利，无利非义矣”。这种义利观体现了经世派的主张。陈寿祺反对利己，“利己必至害己”^②。在《知耻谈》中，他强调“重廉耻而敦礼让，廉耻重而后有气节，礼让敦而后有发度”^③。他教导学生立世行事，要做到经世致用，廉洁奉公。在《科举论》中，陈寿祺指出“自隋唐而后，设科专以文辞取士，乃驱天下尽纳于利禄之徒矣，使学在卒岁穷年枉费日力以从事于其间，甚可惜也”^④。但是，陈寿祺并不否定科举制度，而是提醒学生不做利禄之徒，应多务经世之学，为民办实事，做好事。陈寿祺的这几篇文章，是为宣传经世致用而作，对优秀传统文化加以传承和弘扬，很有教育意义，被视为鳌峰书院的范文，“为诸生警心之助”。他思想开明，敦尚实学，尽量出书楼所藏经籍让学生博览，并鼓励问难切磋。在鳌峰书院十余年中，培养不少人才，如著名诗人张际亮、史学家王捷南、理学家梁文等。





陈寿祺居住的八角楼

陈寿祺热心家乡公益事业，举凡施赈，救助饥民，兴修福州西湖和莆田的木兰陂等水利工程，都热心支持和参与，使民众得到好处。福州贡院自乾隆初年修建以后，有百年没有修过，房屋破旧。陈寿祺见此状况，建议闽浙总督孙尔准、福建巡抚韩克均募捐改建。此建议被当局采纳后，仅用六个月就完成了修建工作。改建后的贡院面貌一新，不但加高了围墙，而且房间也增多了。

陈寿祺注重宣扬先贤与良吏的事迹。嘉庆末年，福建布政使李庚芸居官清正，因对总督汪志伊、巡抚王绍兰的腐败作风不满，遭他们陷害以致自缢身亡。对此，陈寿祺很愤怒，为李庚芸之死抱不平。陈寿祺动员学生林天光等上书向钦差申诉，使李庚芸的冤案得到平反，汪志伊、王绍兰也受到应有惩罚。陈寿祺还发动民众于怀德坊为李庚芸建祠纪念，陈寿祺作《李公遗爱祠堂记》记述此事。漳浦黄道周为明室忠臣，其道德、文章、书法等久为后人所敬重和赞扬。道光四年（1824），陈寿祺联合士绅，呈请督、抚将黄道周从祀孔庙。他广泛搜集黄道周著作，编成《黄忠端集》六十六卷，得到社会好评。

自清初的李光地、官献瑶以来，学者多钻研宋明理学，空谈心性。陈寿祺初从孟超然学习，颇受宋儒影响，后从阮元学，又接触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等朴学大师，学益广博，便专学汉儒治经，改以汉学解析经义。他精于今文，而于义理、名物又能融会贯通，为当时学人所信服，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

《福建通志》自雍正及乾隆间两次纂修以后，又过了六十余年未曾修纂和补充，地方文献散失很多，而旧志又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陈寿祺建议把修建贡院的二万余缗余款提供纂修新志使用。当局同意后请陈寿祺担任总纂，于道光九年（1829）在南后街吉庇巷通志馆开局。陈寿祺为通志创立义例，并自撰《形势》《山川》二门，及《东越儒林文苑后传》。经过数年的编撰，于道光十四年（1834）基本写成。《福建通志》后因种种原因，志局解散，未克终卷。林则徐对此寄予了关注和同情。

陈寿祺写有许多诗，收入《绉跗草堂诗集》共有六卷，近六百首。陈寿祺的诗在当时被称为学人之诗，其是乾嘉年间福建学人之诗的代表，很有影响。

陈寿祺藏书8万卷，藏书楼取名“遂初楼”“小琅



环馆”。他加强书籍保管，曾编撰有《小琅馆书目》（已佚）。他收藏的珍善本图书，多闽中藏书家所未有，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

道光十四年（1834）二月二十日，陈寿祺因病逝世于福州黄巷家中，享年六十四岁。其遗存著作宏丰，主要有《左海文集》《左海诗集》《东越儒林文苑后传》等，后汇编成《左海全集》行世。

林则徐（1785-1850），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字元抚，又字少穆，福建省侯官（今福州市）人，清嘉庆九年（1804）中举，嘉庆十六年（1811）考中进士，改庶吉士，习清书。他历任翰林院编修、杭嘉湖道，江苏、陕西按察使，江宁、湖北、河南布政使，江苏巡抚，湖广、两江、两广、陕甘等总督，两次受命出任钦差大臣，官至正一品。他为官清正廉洁，关心民生，主张改革开放和开展对外正当贸易。同时，兴修水利，发展生产，重视培养和选拔人才，反对腐败，严禁鸦片，坚决抗击西方列强的侵略，保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其政绩显著，贡献巨大，深受民众拥护和爱戴，被人们称为“林青天”“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及中国近代杰出的民族英雄和世界禁毒先驱等。其主要著作有《云左山房文钞》《云左山房诗钞》《林文忠公政书》等。

林则徐与陈寿祺都是福州人，他们感情融洽，志同道合。两人都喜欢撰文，写诗，藏书，主张经世致用、办实事，反对腐败，主张尽力为国为民办好事。

林则徐与陈寿祺的关系非常密切，陈寿祺比林则徐大十四岁，林则徐称他为长辈。林则徐非常敬佩陈寿祺的人品和学识，并向他学习。林则徐认识陈寿祺的时间比较早。嘉庆三年（1798），林则徐十四岁时进入鳌峰书院读书，通过父亲林宾日的介绍便认识了陈寿祺。后来他们经常交往，在一起共同探讨政见，抒发抱负，志同道合，成为忘年之交。陈寿祺回忆称：“寿祺与兵备（指林则徐），世有荀陈



虎门销烟池

之交，比数过从，通悃悫，讨文字，欢甚”^⑤。这里指林则徐赴京前，两人在福州的交往情况。

道光二年（1822）三月初二日，林则徐在父母亲及陈寿祺等好友师长的鼓励下，由福州北上赴京补官。临行前，写了《题陈恭甫前辈遂初楼》诗四首，前三首主要赞扬陈寿祺的渊博学识，同时表达钦敬的心情。最后一首陈述了自己为养亲而不得不再度出仕的苦衷。诗云：“惆怅衡门心事违，饥驱犹未答春晖。买山无计仍从仕，负米难言愧暂归。每侍高堂恋明镜，苦将慈线劝征衣。登楼倍触临歧泪，惭对诗人束广微（时予将北行）。”^⑥陈寿祺写了《赠行诗》三首回赠。第一首称赞林则徐在浙江任职的政绩，表达亲友对林出仕的期望。诗曰：“清如江流滔，惠如海波广。越人诵使君，多士勤作养。……四牡戒怀归，于义宜勇往，慈母缝征衣，亲朋劝行鞅”。^⑦第二首是赠行诗的主要部分，陈寿祺对林则徐日后任官提出了热切而诚挚的希望，希望他像古代的后稷和夏禹那样为民造福。同时，也抒发对当时社会腐败的憎恶心情。诗中贯穿经世致用的政治思想，这对林则徐具有启发意义。诗曰：“贪泉见夷齐，敝屣视韩魏。人爵安足荣，仁义乃富贵。君子行道心，诵古思仿佛。九罫歌鱗鲙，甘棠爱蔽芾。由来社稷臣，一诚通万汇。民俗凋敝余，若旱需灌溉。奸宄阴孽芽，若农莠秽莠。吏道患因循，人情多忌畏。苍生系安危，所尚在宏毅。吾乡两襄惠（明惠安张净峰总督岳、连江吴子彬尚书文华，皆谥襄惠），文武有经纬。安

溪本通儒，拥旄功泽暨。落落逾百年，后贤每歔歔。如君复几人，渊岳纳肠胃，公卿交口荐，雅故洽兰味。我独勤干秋，匪争时誉诽。至尊资股肱，上殿吐奇气。许身稷卨伦，志士何所讳。”^⑧第三首主要讲两家的世谊和推重林则徐父亲林宾日。诗曰：“君家资政翁，翼翼樞贞抱。畴曩庠序中，素交善先考。两家寒峻兴，隐约艰缔造。愧悌天所祐，朱紫侍耄老。勋业霄汉间，上贻令名蚤。嗟余誓墓还，北堂已华皓。况乏丁公藤，起疾徒请祷。鲜葩虽洁白，散木渐枯槁。才命判风花，遂初差自保。何由北山移，得傍南澗道。尚将寻蓬菜，春风拾瑶草。或奉君房书，平生永为好”。^⑨

林则徐针对陈寿祺的《赠行诗》，又写了《答陈恭甫前辈寿祺》五言长诗三首，感谢陈寿祺的推许和鼓励。第一首表达对陈寿祺的一向崇敬之情，“束发读公文，珍如觐鸿宝。”诗中记述了林则徐与陈寿祺的亲密交往。“去年栖衡门，晨夕倾怀抱。游目窥墨林，敷衽榷前藻。迹如云龙随，谈亦糠秕埽。”^⑩第二首反映了林则徐早期的政治思想。诗中写道：“昨枉双鲤鱼，发缄得赠言。奖借逮末学，誉扬及家尊。更慨吏道媮，期以古处敦。树立尚宏毅，一语诚探原。呜呼利禄徒，学氓何少恩。所习乃脂书，所志在饱温。色厉实内荏，骄昼而乞昏。岂其鲜才智，适以资攀援。模棱计滋巧，刀笔文滋繁。峻或过申商，滑乃逾衍髡。牧羊既使虎，吓鼠徒惊鹑。有欲刚则无，此际伏病根。于传戒焚象，于诗励悬狙。要在持

守固，庶几恻隐存。知人仰圣哲，弊吏扶元元。举措愆輿论，激浊澄其源。侧闻官方叙，驯致尼物蕃。不才乏报称，循省惭素餐。但当保涓洁，弗逐流波奔，三复吉人词，清夜心自扪。”^⑪这首诗还是林则徐对当时政治腐败的指斥之作。他谴责那些白天对百姓骄横，昏夜向权贵乞怜的利禄之徒，认为他们严酷赛过申不害和商鞅，浮滑空谈又超过能言善辩的邹衍和淳于髡，寡廉鲜耻，误国害民。他感叹廉吏受打击排斥，恶吏却逍遥得意。他意识到吏治腐败是封建社会出现危机的病根，但却寄希望于最高统治者知人善任，整顿吏治，来正本清源，医治病根。他自勉要做一个清正廉洁、百姓拥护的“好官”。这首诗贯穿着林则徐经世致用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要求革新政治的意愿，这与陈寿祺的思想相近。第三首推重陈寿祺的学术造诣，并期望有名山之作。林则徐还写有《钱舜举〈伏生授经图〉为陈恭甫太史题》诗^⑫，推崇陈寿祺的学术成就。

林则徐任官后，与陈寿祺经常互通信息。林则徐向陈寿祺介绍任职情况，还向陈寿祺请教为官之道和从政意见。对此，陈寿祺都给予热情支持和鼓励，既坦陈自己的观点，又不时对腐败现实表示不满和愤怒。林则徐对陈寿祺的学行和学术地位作了充分的肯定，将之与明清时的经学大师相提并论，“南抗朱与顾，北陵太原阎”^⑬。

道光十三年（1833）初，即陈寿祺去世前一年，林则徐从苏州写信给陈寿祺，通报许多信息。他向陈寿祺介绍了当时江苏的社会情况，有减轻灾情和兴修水利等方面的内容。指出江苏难治的要害，以“局面太大，积重难返”二语尽之^⑭。他还谈了对漕运乃至对黄河改道的主张。信中说：“欲救江淮之困，必须改黄河于山东入海，而以今黄河于淮泗出洪泽湖以为帝藉……”^⑮这是一个正确的主张和设想，也为日后黄河自然北归，经由山东入海的事实所证明。林则徐与陈寿祺互通信息，说明两人友情深厚。

林则徐与陈寿祺志同道合，交往密切。林则徐得到陈寿祺的激励和指点，认真研读陈寿祺的文章，进一步扩大了眼界，从中学到不少治学、做人、办事等方面的本领。林则徐非常尊重和敬佩陈寿祺，并以他的可贵品德和爱国事迹自勉。从林则徐后来从政的种种表现，特别是主张利他的高尚思想中，都可以看出陈寿祺

虎门销烟进程
PROCESS DIAGRAM OF OPIUM BURNING AT HUMEN
林则徐日记中逐日销烟数

时间 TIME	销烟数 AMOUNT OF OPIUM DESTROYED	时间 TIME	销烟数 AMOUNT OF OPIUM DESTROYED
6月3日	170箱	6月13日	1200箱
6月4日	230 (箱) 600 (袋)	6月14日	1200箱
6月5日	1400 (袋) 余	6月15日	端午节，暂停化烟
6月6日	900箱	6月16日	1600箱
6月7日	950箱	6月17日	1600箱
6月8日	1050箱	6月18日	1600箱
6月9日	1200箱	6月19日	1200箱
6月10日	1100箱	6月20日	1200箱
6月11日	1200箱	6月21日	1510箱
6月12日	1200箱		

说明:
Description: 林则徐日记中逐日所记销烟的总和是 19110 箱又 2000 袋，少于奏折中实销烟的总量 19179 箱，又 2119 袋，疑日记为约数，或有漏报，当以奏折中最后实销数为准。
It is reported that the total amount of the destroyed opium is 19,179 boxes plus 2,119 bags in the memorials, which is more than the amount of 19,110 boxes plus 2,000 bags recorded in Lin's diary. In which some number of the opium may be omitted, or the numbers noted in it are approximate ones.

藤花吟館

辛酉十一月
沈觀壽書

陈寿祺故居内的藤花吟馆

对他的影响。可以说，林则徐从政后建立丰功伟绩，成为近代著名的民族英雄、世界禁毒先驱，与受陈寿祺的影响分不开。

林则徐与陈寿祺都是清代著名人物，对社会都有显著贡献。了解他们的关系史，对于今天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展近代史和爱国主义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都很有意义。

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34页、23页、23页、20页、48页。

⑭ ⑮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78页、78页。

(本文图片由新权提供)

注 释：

① 民国《福建通志·儒林·陈寿祺传》。

② 《义利辨》，《左海文集》第三卷。

③ 《知耻谈》，《左海文集》第三卷。

④ 《科举论》，《左海文集》第三卷。

⑤ ⑦ ⑧ ⑨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08页、107页、107页、107页。

⑥ ⑩ ⑪ ⑫ ⑬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



陈寿祺故居内景





福建省尤溪县青年开展学礼活动

《朱子家礼》的 化民成俗作用

■ 黄柏翰

摘要 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对《朱子家礼》的化民成俗作用进行探讨，认为儒家思想通过礼的教化作用，将之应用于人文教育、社会问题的解决及人际关系的调整，以期达到彰显人性价值、创造和谐秩序的目的。

关键词 朱子家礼 化民成俗

作者 黄柏翰，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武夷山市 354300）

礼的本义是举行仪礼、祭神求福。礼的一般意义，指的是由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所形成的仪节，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准则，或指用于表示尊敬的态度和动作，或指为表庆贺、友好、敬意所赠之物。礼是东亚文化的传统，重视人际往来的礼节，和上下关系的区别，是形成社会文化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礼的一般意义，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礼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是古代宗法社会的产物，包含了典章制



度的建立和道德规范的仪节，也是儒家政治理想的体现与具体落实的方式，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

—

儒家礼学的发展经历多次重大的改造。周公制礼作乐，将德的精神注入礼，以礼统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上层社会的人们显得彬彬有礼。孔子删定《礼》《乐》，以仁释礼，将上层社会所行之礼改造为道德之礼，使天子与庶人在道德面前一律平等，使礼成为道德自发性的表现。朱熹编修熔铸古今、博采众长的礼学大全《仪礼经传通解》，提出“礼者，天理之节文”的观点，给礼赋予天理的内涵。此外，《朱子家礼》^①（简称《家礼》）吸收《仪礼》《唐开元礼》《吕氏乡约》和《司马书仪》已有的成就，制定了冠、丧、婚、祭等家日常用的仪节和实践方式，进一步促成礼落实于民间，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

从周公开始修礼，所修之礼适合上层社会，到朱熹修礼，所修之礼适合士庶阶层。《家礼》成功地将礼引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本文尝试对《家礼》化民成俗的几个关键作用进行探讨，即“礼”是“天理”的具体实现；具有凝聚家族向心力与社会整合的功能；满足社会生活的实际需求，体现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

“天理”这个观念始用于《庄子》和《乐记》^②，但使之成为重要哲学观念的是宋儒，尤以朱熹发挥最多。

“天理”是指先天的善性或伦理的法则。朱熹在修礼时即有意识地将“天理”注入“礼”。

他指出：“礼即理也，但谓之理，则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为礼，则有品节文章之可见矣。……问程子曰礼即理也。尹氏曰：去人欲则复天理。或问不取尹说以为失程子意，何也。曰：某之意，不欲其只说复理而不说礼字。盖说复礼，即说得着实。若说作理则悬空，是个什么物事。……礼谓之天理之节文者，盖天下皆有当然之理，但此理无形无影，故作此礼文画出一个天理与人看，教有规矩，可以凭据，故谓之天理之节文。”^③

在程朱的思想体系里，“天

理”对应“人欲”。朱熹提醒后学“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要于此体认省察之”^④。朱熹认为“有个天理便有个入欲。缘这个天理须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⑤。礼的设置正是要调节人欲，安顿天理。通过修礼治礼的工作，使无形迹的天理转化为可日常践行的礼仪，借由践礼来治人情，修人义以复天理。

“礼”的因革损益，应该要能与时俱进。对此，朱熹曾慨叹：“礼乐废坏，二千余年。若以大数观之，亦未为远。然已都无稽考处。后来须有一个大大底人出来，尽数拆洗一番，但未知远近在几时。”^⑥后来，朱熹还是自己担负起这个工作，在博采前贤构筑社会秩序的伟大思想基础上，改易变通，因事制礼，在中年修成《家礼》，并在晚年会通三礼^⑦，熔铸古今，建立起一个前无古人的礼学体系——《仪礼经传通解》。

有了“礼”为“天理之节文”，再加上尽德修诚，非礼不可的观念，我们便可以了解朱熹何以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礼”的编修与实践，认识到其目的就是要将“天理”具体落实为人类社会的伦理规范和社会运行的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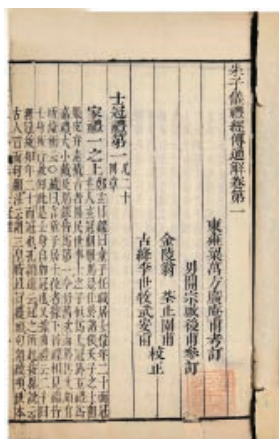
儒家文化是以家庭伦理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文化形态，以人和人之间的亲情这种自然情感，扩充至包含社会、国家乃至天下的道德关怀。家庭不但是社会、国家的基本组成单位，移孝做忠的政治思想更是把家国之间的关系形塑成一个有机体。在这样的思想形态下，家庭关系的和谐成为伦理的发端，以及国家强盛的基础。家庭关系的和谐不能仅仅依靠亲情来联系，因为古代所谓的“家”往



厦门同安朱子书院内的朱熹塑像



《朱子家礼》八卷



朱子《仪礼经传通解》

往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只有几个人的小核心家庭，而是几百个人在同一处聚居的大家族。这样一个大家族往往等于一个小型社会，必须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劳动和财产所得的分配问题。因此，拥有共同的文化信仰就成为凝聚家族向心力的必要条件，《家礼》就表现出此重要功能。透过家礼的举行，宗族成员的心被凝聚起来，自觉地形成一个生命共同体。

这种以一个个家族为核心组成的社会，以及由此建立起的庞大中央集权国家，其基础即需依赖于儒家文化所展现出的整合能力。在广土众民的中国传统社会里，限于人力、物力资源的不足，国家权力如何由中央延伸到地方，乃至广大的乡村，一直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宋代以后人口大幅增加，从唐代五六千万的人口规模，发展到明代的一两亿，清后期更高达三四亿。可是，人口总数增加如此多，官员总数却没有相应的扩充。^⑧ 仅仅依靠少量的官吏，如何维持王朝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是一个相当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中央政府的组织能力基本上仅能达于县级政权，除了交纳赋税，地方安靖等事外，余皆由民间自理。地方事务的管理，主要依靠儒家文化所形成的伦理观念和在野的儒生（知识分子）维持。儒家的家庭伦理，除了凝聚家族成员之间的向心力之外，也把“国”看成“家”的同构体，起到维持国家向心力的作用。“家”的放大就是“国”，因此，皇帝被视为“父”，而地方官员被视为“父母官”。“国家”^⑨、“君父”等观念的产生，都是家国同构观念的延伸。

儒家知识分子不但是官僚机构的官员，而且在县以下的地方行政事务上扮演着协助者的角色。特别是在程朱理学吸收了佛道思想形成新儒学后，从天道观的角度推出家国天下一体化的秩序架构，儒生便自觉地承担起道德精英

的责任，积极从事修身及以成圣为目标的精神境界追求。儒家知识分子进可以治国平天下，退可以居乡教化百姓，成为整合中央与地方政务的中坚力量。如同劳思光所指出的，宋儒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未登仕籍，已忧天下”，“以天下为己任，非以官职为谋生之道”，“对于道德文化之轨范，礼乐刑政之措施，无不欲作积极之努力”。^⑩ 儒家文化整合了个人精神层面的修身问题，现实层面以家族为运作核心的社会问题，政治层面的国家意识形态整合问题，是建构传统社会的思想模型。

在修身以教化天下的取向下，家礼和乡约得到推广。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礼治社会”的概念^⑪，认为中国传统乡村是由宗法家族所组成的熟人社会，主要依靠“礼治”而不是“法治”。法治主要依靠国家的政治权力，而礼治依靠的是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是一种自发的道德力量和来自伦理规范的约束力。在此，《家礼》起到构建中国乡村礼治社会的重要作用，是将儒家精神贯彻到民间的重要机制。程朱理学兴起之前，仅有官宦之家和世家大族才有祠堂和族谱。程朱理学兴起后，村庄中的普通百姓也普遍编有族谱，设立祠堂，形成以家族为核心的社会。家，不仅是人们生活的地方，也是一个共同劳动、财产共享的生命共同体。鳏寡孤独者可以通过家族的保护和协助而得以安身立命。例如，很多家族设有族田，并以族田收入作为家族互助和公益的资金。这样一来，从社会最小的细胞——家，到整个国家天下，都可在理学观念下安顿秩序，而这一精神都是通过《家礼》等具体的礼节得以深入民心的。通过礼仪，家族成员的情感与家族认同被激发出来，实现了儒家“齐之以礼”的社会管理和“养之成德”的理想秩序，成为稳定社会的重要力量。

二

朱熹身处的时代佛、道盛行，许多民俗礼节多受到佛、道的影响。即便是儒门子弟，在治丧仪式的选择上也常有所适从之感。曾有弟子向朱熹请教父母的丧礼应如何举行，是否可依父母遗愿采用佛、道之礼俗？由于当时儒学并没有针对平民的丧葬礼规范，朱熹除了火化一事不能接受之外，对于其余的仪节也只好不情愿地妥协。^⑫ 对于民间礼仪的空缺和无所适从，朱熹曾慨叹：“礼不行



武夷山市举行朱子诞辰祭祀典礼

于上，而欲其行于下者难。”^⑬朱熹编撰《家礼》正是为了弥补这个缺憾。

《家礼》是朱熹四十多岁，因母亲丁忧在家时所编着的。^⑭这份书稿刚完成即为僮所窃，直到朱熹去世后，人们为他筹备葬礼时，这部书稿才又重现于世。《家礼》于嘉定四年（1211）在广州初刊，其内容从世俗生活本身入手，重新在冠、婚、丧、祭生活起居，应对进退各方面，将礼的精神融入生活日用之中。同时，进一步对礼制进行整理考订，特别是融入人生各个阶段中会用到的礼，包括了冠、丧、婚、祭等家常日用的仪节和实践方式。其是中国近世一部重要的儒家礼书，内容精简实用，与生活密切结合，深刻影响中国近世社会的家庭结构与民俗礼仪。

在基层百姓的日常生活里都有婚丧喜庆礼仪的实际需求。从唐代之后，民俗多受到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常采用佛、道的礼仪。面对这种情况，《礼记·曲礼》的“礼不下庶人”古制就不得不改变。当时，司马光所编的《书仪》已经为礼仪的世俗化开启先河。但是，司马光对古礼的删削却颇为有限，仪式仍稍嫌繁琐，不便于实践，未能广为流通。朱熹在《书仪》的基础上，将繁复的仪节加以改造，力求简明通用。^⑮《家礼》将传统的“贵族之

礼”，修改成适应性更广的“庶民之礼”，完成了礼仪世俗化的工作。情感的表达需要合宜的表现形式，《家礼》的产生提供了一套社会普遍认同的行为仪轨，让儒家的核心价值通过礼仪表现出来，也抵御了佛、道礼俗的浸染。

此后，以《家礼》为基础的文人礼书、礼仪指南大量涌现，家礼的实践融入到社会基层的乡村礼俗建设。《家礼》提供建设家族组织的构想，借由家族组织来倡导孝悌的宗法思想，成为指导家族的行动手册。^⑯随着后世对朱子的尊奉，及《家礼》的刊刻和流布，士人阶层的实践和民间百姓的笃信遵行等历史因素的存在，到明清时期，《家礼》已成为民间的通用礼。

儒家礼学的理想是通过“礼”来形塑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往伦理，以形成文明社会的理想秩序。宋儒所处的时代，作为国家大法的礼乐制度已大致确立，唯民间家礼、家族宗法的修订和实践则尚未完备，这个空缺成为儒家知识分子的关注和用力之处。在“礼即理”观念的指导下，《家礼》从安顿天理的高度，思考家族组织建设的哲学基础。借由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的家族共同体，有收宗族，睦族人，崇孝敬，厚风俗的作用，对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带来极大的作用。《家礼》有凝聚家族成员向心力、贯彻儒家文化核心价值的作用，其目的虽标明是要为家立礼立法，但就端正社会礼俗、形塑社会普遍认同的行为方式而言，要说其具有为民间社会立法的目的也不为过。

《家礼》代表着敦厚、重亲情礼法的文化传统，对于亟须道德伦理教育的当代社会而言，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朱子编写《家礼》是在古礼的基础上修改的，原则是贵适时，不贵泥古。《朱子家礼》要在当代社会继续发挥作用，在于能够顺应时代的情境，重要的是把握“礼”的核心要素，即内在精神和体现的人文价值，而不在于外在的形式。

注释：

①《朱子家礼》是宋代家礼著述中的集大成者，基本确立了中国近世家礼的范式。《家礼》虽曾有作者问题的考辨，但目前学界大致公认现本《家礼》基本反映朱熹的礼学思想，是朱熹在礼学方面影响范围最为广泛，接受人群最多的著作。此可参见束景南及陈来的考辨。（束景南：《朱熹〈家礼〉真伪辨》，《朱子学刊》第1辑，1993年；陈来：《朱子〈家礼〉真伪考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

②“天理”在《庄子·养生主》中用以指称自然。

《庄子·养生主》：“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天理”在《乐记》中则指先天之善性。《礼记·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

③ 钱穆：《朱子新学案》第四册，台北三民出版社，1971年，第152-158页。

④⑤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三。

⑥ 钱穆：《朱子新学案》第五册，第140页。

⑦ “三礼”是儒家的经典礼书，分指《周礼》《仪礼》和《礼记》，其中《周礼》《仪礼》相传为周公所作，《礼记》则为汉时戴德（人称大戴）、戴圣（人称小戴）叔侄所删记。东汉末年郑玄为之作注，其后合称“三礼”，后世多沿用之。“三礼”对古代礼法、礼仪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有深远的影响。

⑧ 关于历朝人口变化和官民的比例，可参见《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84-87页。

⑨ 家国一体化思想也能从语言当中很清楚地表现出来。汉语的“国家”概念由“国”和“家”组成，两者间具有一体化的关系。英语“国家”的概念一般表述为“country”“nation”或“state”，这几个词都是表示地域或民族性的概念；而汉语“国家”概念则是地域性、民族性和家庭组织的总和。

⑩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3卷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54页。

⑪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4年。

⑫ “或问：亲死遗嘱教用僧道则如何？曰：便是难处。或曰，也可以不用否？曰：人子之心有所不忍，这事须子细商量。……或问：设若母卒父在，父要循俗制丧服，用僧道火化，则如何？……曰：其它都是皮毛外事，若决如此做，从之也无妨，为火化则不可。……火化则是残父母之遗骸。”钱穆：《朱子新学案》第五册，第128-129页。

⑬ 朱熹：《民臣礼仪》，《朱子文集》卷六十九。

⑭ Chan Wing-tsit, Chu Hsi: Life and Thought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49.

⑮⑯ 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60页、858页。

⑰ 研究《家礼》祠堂制度在福建的流传的几位学者，如郑振满、小岛毅、常建华等人的研究显示：“《家礼》刊行不久，福建仙游、南平市建阳区即出现依《家礼》祠堂制度而建的祠堂。这种形式的祭祖礼仪与家祭、墓祭和其他类型的祠祭并行流传。”见周鑫：《〈朱子家礼〉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2卷，2011年，第441页。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举办朱子敬师礼活动

南溪书院学术奖文艺晚会



福建省尤溪县南溪书院的古乐表演

儒家集会中 合唱诗歌的传统

■ 衷鑫恣 刘刚

摘要 中国存在一个源远流长的合唱传统，在雅文化界内，以歌唱《诗经》之《风》《雅》内容为多。儒家原典如《仪礼》，规定了燕礼、乡饮酒礼须有“登歌（或叫升歌）”仪式，由多位盲人歌工登堂合唱。登歌之仪，历朝皆行之，而人数不一。至宋代，道学家如朱熹等，都是音乐爱好者和乐教的推行者。在他们的推动下，道学家讲学圈子内演化成两种形式的诗歌合唱：师友之众乐游山水之际，兴之所至，同声歌诗；书院祭祀、讲学活动中固定化的合唱仪式，属于道学书院之礼的一部分，此种合唱至明末，在书院中已极为普遍。

关键词 合唱 登歌 书院 朱熹

作者 衷鑫恣，武夷学院宋明理学研究中心讲师，哲学博士（武夷山市 354300）

刘刚，中共三明市委党校讲师，哲学博士（三明 365000）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存在灿烂的音乐文化，但社会上却认为至少近几百年来中国音乐不行了。这被看作世界近代史上中国落后的表现之一，因而通常被归咎于近古儒学的强化，也就是宋明道学的兴起。几乎无人不相信，中国古代没有产生合唱，19世纪基督教唱诗班入华后才有合唱。这在世人眼中看来，可能会成为儒家文化

不敌西方文化的一大证据。实际上，这些“印象”充满谬误，与另一“印象”——中国乃礼乐之邦——也完全矛盾。

本文专说合唱问题。先来看一场明代的大型合唱。晚明某年中秋，文坛领袖张岱（1597-1679）参加苏州虎丘聚会。“在席者七百余人，能歌者百余人”，同声



朱熹所用的“太古遗音”琴

唱《澄湖万顷》，“声如潮涌，山为雷动”（《陶庵梦忆》）。如果说这是即兴为之，不足为训，那下面就追索一番有组织乃至完全制度化的合唱，这便是“礼”中之乐，恰是儒家的主流和强项。

（一）庙堂之合唱诗歌

无论儒家原典，抑或秦汉以降的国家礼制，宋以降的新儒学，都明确采纳并运用着合唱这种音乐形式。

《仪礼》中《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四篇所规定的嘉礼，都有合唱环节。合唱人数，有“工六人”“工四人”不等。工是歌工，郑玄注：“瞽矇善歌讽诵诗者也”，即善于唱诗的盲人。以《燕礼》为例，该礼“作乐”的部分，其仪程略分四步。第一步，在乐正引领下，工四人升堂（带有两把瑟），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属《诗经·小雅》）。第二步，堂下吹笙吹吹《南陔》《白华》《华黍》（属《小雅》）。第三步，堂上歌与堂下笙交替：上歌《鱼丽》，下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均属《小雅》）。第四步，堂上堂下“合乐”，演唱《关雎》《葛覃》《卷耳》（属

《诗经·周南》）和《鹊巢》《采芣》《采芣》（属《诗经·召南》）。

歌者登堂，谓之升歌，或登歌。依《仪礼》所示，燕射诸礼都会用到升歌。然而不仅嘉礼，作为吉礼的祭礼也广泛用到。《周礼·春官》谈到了“大祭祀”和“大飨”中的登歌：“大祭祀，（大师）帅瞽登歌，令奏击拊，下管播乐器，令奏鼓鞀。大飨，亦如之。……（小师）登歌击拊。”这里的大师、小师，是乐队之队长，应该也是盲人。如《仪礼·大射仪》，登堂而歌的乐工六人，其中就有大师、小师各一人。他们的“击拊”（拊似鼓），是起歌的指令。《春官》中“下管播乐器”一句，“管”指笙箫等管乐，是说管乐器在堂下为堂上之歌伴奏，与上述《燕礼》的布置一致。据周代之礼，登歌人数都是双数。后世朝廷、宗庙大典无不有登歌之仪，但人数并不统一。《宋史·乐二》总结：“魏晋以来，登歌五人，隋唐四人，本朝因之。”北宋元丰二年（1079）进行改革，“堂上歌为八”，规模扩大了一倍。其原因是琴瑟等乐器增多，为了保证人声不被掩盖，必须扩大合唱人数。同样不统一的还有歌词，例如《明史·乐志一》云：“明兴，太祖锐志雅乐。……其登歌之词，多自裁定。”不用诗三百，而是作新词，可能是为了显示天子制礼作乐的特权，也可能是有见于《诗经》乐谱难明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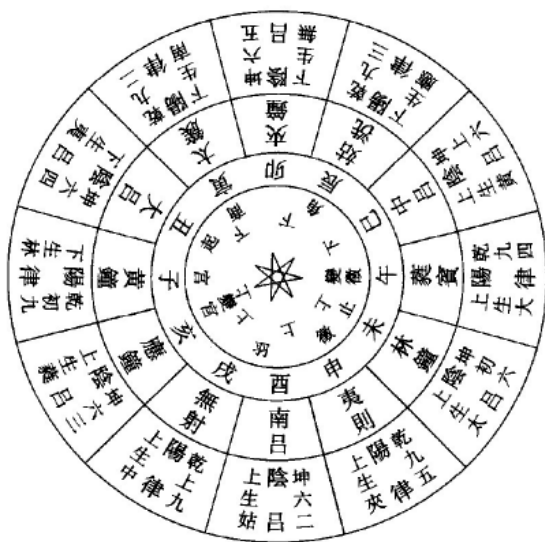
海峡两岸联合祭孔大典上的乐舞

从登歌的安排很容易看出来，人声最贵，器乐为声乐服务。《礼记·郊特牲》谈升歌：“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贵人声也。”汉代的登歌甚至取消了乐器伴奏，为的就是“不以丝竹乱人声”（《隋书·音乐下》）。后代流行的一句话是：“丝不如竹，竹不如肉。”^①反观今日，所谓民乐表演，实为单纯的民族乐器表演；各地祭孔复原释奠礼，音乐部分也是侧重钟鼓丝竹的演奏。它们都遗漏了古礼所推崇的人类自身的歌喉。人声的连续性、多样性，为打击乐器、管弦乐器所不及；更重要的，声乐有文词，如登歌之歌《鹿鸣》《关雎》等，每篇都有不同的含义。

合唱选什么人，是个有趣的问题，关系到古人认为谁人更有天赋，什么样的嗓音更动听，更能达到目的。上古歌者多瞽者，这是常识，前文多及之。秦汉以后，征选青少年的多了起来，其中汉高祖是先行者。《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回乡，与家乡父老子弟纵酒。“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也是在这次，他从沛中征选了少年一百二十人，教他们唱歌。相信这班少年的主要职责就是合唱诗歌，而且必唱高祖自作的慷慨之歌，其气势可以想见。是否也用于庙堂登歌之仪，则不得而知。后来汉惠帝保留了一百二十人的编制，有缺辄补，但“皆令为吹乐”，转为演奏器乐了。

（二）书院内外之合唱诗歌

宋代道学兴起后，除了将国家礼制层面继承过去，理学家个人对音乐的态度与了解程度如何？学者集会时有合



《仪礼经传通解·钟律》所载《律吕相生图》

唱吗？就此，作为理学集大成者、闽学第一人的朱子的例子至关重要。

毫无疑问，朱子喜爱吟唱。《朱子语类》记载，朱子每“领诸生游赏，则徘徊顾瞻，缓步微吟”。他与张栻等人同游衡山，留下《南岳酬唱集》，便属于此类。但严格说，唐以后盛行的近体诗吟唱，音乐性略低，还不是“歌”；宋人以长短句作歌，如“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永）词”^②之歌，才是“歌”。陈荣捷先生1980年代作《朱子之歌》一文，说他所知的朱子高歌，只有他二十一岁时回徽州，酒酣独歌《离骚》一次。^③这个认识，容易造成朱子不喜歌或不善歌的印象。

陈文提到，《宋元学案》记元儒许衡将死，“歌朱子所撰歌”，歌罢奄然而逝。歌曰：“睡起林风瑟瑟，觉来山月团团。身心无累久轻安，况有清凉池馆？句稳翻嫌白俗，情高却笑郊寒。兰膏元自少陵残，好处金章不换。”这首《和西江月》载《朱文公文集》卷十四，陈荣捷先生误以为文集未载。此外，应张栻之邀，朱子曾作《虞帝庙迎送神乐歌词》两阙：“皇朝为兮山之幽，翳长薄兮俯清流……”1182年，许进之挟琴来到朱子的书堂，月夜“挥弦度曲，声甚悲壮”。嗣后，朱子为琴曲《招隐操》作词二阙：“南山之幽，桂树之稠，枝相缪……”更有名的是游九曲溪所作《武夷棹歌》十首，相信用的是当时武夷山间的民谣曲调，今曲不存，而词犹在。实际上，朱子自小生长在浓厚的音乐氛围中。其祖父朱森，“时时为歌诗，恍然有超世之志。”^④朱子十余岁在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五夫，便从屏山先生刘子翥学琴。《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五载《紫阳琴铭》一则，知此琴为朱子所有。据悉，此琴仍存世，名“太古遗音”，琴铭落款“淳熙丁未新安朱熹书”，为《文集》所无。此琴曾为吴景略（1907-1987）所藏，2009年在北京匡时拍卖会上以2072万元人民币成交。^⑤朱子《精舍杂咏》回忆：“琴书四十载，几作山中客。”“精舍”指武夷精舍，建于淳熙十年（1183），时朱子五十四岁，距其十四岁移居崇安，正好四十载。

可以肯定地说，朱子对音乐是充满热情的。韩元吉（1118-1187）《武夷精舍记》：“（吾友朱元晦游武夷，）与其门生弟子挟书而诵，取古诗三百篇及楚人之词，哦而歌之，潇洒啸咏，留心数日。”门生辐辏于武夷，自是朱子中年以后事，特别是精舍建成以后事，也就是说，他青年高歌诗赋的兴致，日后并未抛弃。此等情怀，正是孔门“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浪漫传统。后来陈白沙之“或浩歌长林，或孤啸绝岛”（黄宗羲《明儒学案·白沙学案》），王阳明之“老夫今夜狂歌



发，化作均天满太清”（王阳明《月夜与诸生歌于天泉桥》），皆一脉相承。

朱子流连武夷山水，与门生“哦而歌之，潇洒啸咏”之际，同声合唱应是大概率事件。几百年后，王阳明在滁州也做了同样的事：他“日与门人遨游琅琊、灊泉间。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歌声震山谷”（钱德洪《王阳明年谱》）。可以想象，比之行军打仗的阳明一门，紫阳一门的歌唱，激昂之气或稍逊。无论如何，与张岱他们在虎丘合唱《澄湖万顷》一样，这些合唱由山水激发，遣怀

咏志，哪怕是集体行为，仍属个人自由意志范畴，而我们更希望找到制度化的合唱，一种常规的、超越个人目的的合唱。这就需要诉诸儒家礼制，一个异于山水之乐的不那么浪漫的传统。就宋明道学而言，除了对于家国礼法的意见，主要就是书院内部的礼仪活动。

宋明学校的诸生歌诗，始于胡瑗。作为宋初三先生之首的胡瑗（993-1059），在湖州州学、苏州州学、汴京太学总结的一套经验，成为后来学校、书院教育的典范。它具有多方面的创新，如课程分为经义斋、治事斋，如设



无锡东林书院道南祠

投壶、射艺（如今之体育），又如令学生歌诗奏乐。黄宗羲《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载：“先生在学时，每公私试罢，掌仪率诸生会于肯善堂，合雅乐歌诗，至夜乃散；诸斋亦自歌诗奏乐，琴瑟之声彻于外。”所谓“合雅乐歌诗”，不是偶尔为之，而是经常举行。《宋史·乐十七》记胡瑗在湖州事：“宋朝湖学之兴，老师宿儒痛正音之寂寥，尝择取《二南》《小雅》数十篇，寓之埙籥，使学者朝夕咏歌，自尔声诗之学为儒者稍知所尚。”当有宋之初，胡瑗等人抱着急迫的心情，意图复兴传统音乐文化，其中歌《诗经》就是一环。

如果说胡瑗令学校学生歌诗，多有存亡续绝背景下的演练性质，当其渐为儒者所知，开枝散叶，到明代则已被普遍吸收为固定的书院仪式。资料众多，兹举四例。

紫阳书院，徽州，主祀朱子。其祀典规定，亚献礼、终献礼之间及前后，“歌诗生”总共三次“升歌”，歌生八人或六人对立，歌《诗》某章（《紫阳书院志》）。歌诗的目的，主要是降神和送神。

姚江书院，余姚，主祀王阳明。有会规曰：会讲前，“同会就坐，鸣云版三下。赞：‘歌诗！’童子出班揖行则折旋。歌时或以小磬节之，歌毕鸣云版三下。”（《姚江书院志略》）歌童“出班”，即是升歌之义。会讲者来自书院内外，会讲之礼参照分主宾的燕礼。歌诗的目的，重在和主宾。

刘宗周的证人会。其会议规定：拜过先圣先贤，坐定后，“司赞者传云板三声，命童子歌诗，诗毕，复传云板三声，请开讲。……讲毕，命童子复歌诗。”（《证人会约》）此合唱模式类似姚江书院。看得出来，童子歌诗可前可后，可一次可两次。

东林书院，无锡，有道南祠祭祀“洛闽中枢”杨时。其会讲仪式为：“会日，久坐之后，宜歌诗一二章，以为开畅性灵之助。会讲毕，就听讲中推一人，朗诵嘉言善行一二，则其于感发兴起未必无补也。”（《东林书院

志》）无韵的文用来朗诵，有韵的诗用来歌唱，有分别。歌诗的目的，是活动血脉、开畅性灵。东林书院的歌诗队如何组成？规定：“习礼者充歌生，每歌，鱼贯升堂齐立对，圣像一揖，择年长声亮一人为倡，每句倡者先歌一声，众生齐和一声。”这段话信息丰富：歌生是书院习礼的学生；有人领唱；唱者要向孔子圣像行礼。

以上基本属晚明清初之事。较早，王襞（1511-1587）“每遇讲会，以童子歌诗，声中金石”（《明儒学案·泰州学派一》），应该也是童子合唱。明代书院俨然备有普遍化、制度化了的歌诗队，从形式上看，综合了庙堂的升歌礼和汉高祖选育童子的做法。有趣的是，朱子特意观察过童子的唱功，说：“向见一女童，天然理会得音律，其歌唱皆出于自然。”（《朱子语类》卷九十二）明清书院志留存较多，歌诗之出声法、伴奏乐器等细节斑斑可考，今日复原颇便利。^⑥

遗憾的是，朱子、王阳明二人，虽皆以讲学为事，均未发现留下这方面的资料。这是就成人讲学场所或提供高等教育的书院而言，至于蒙学、小学，二人则皆明文提倡童子歌诗。如朱子《小学》多处提到小学生歌咏舞蹈之要，指出歌以养性情耳目、舞蹈以养血脉，且援引程子之言：“（《诗经》）今人未易晓，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事长之节，令朝夕歌之。”程朱尚停留在纸面，至王阳明则已实行之。钱德洪《王阳明年谱》



无锡东林书院“洛闽中枢”额

载，王子平定南康、赣州之贼，随即“兴立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他留下的《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曰：“今教童子者，……务其培植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如果有人怀疑这些所谓童子歌诗，只是童子聚在一起学习唱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唱，那么再看一下王阳明同时人崔铣（1478-1541）为其家塾规定的功课。“日中令群立歌诗，一人倡之，众乃和之。诗用《孝顺》三十章及邵子《子养亲》六章，渐进之《二南》及《鹿鸣》。”^⑦时间定在正午，且需站立而歌，看得出来，仪式性是很强的。社学、家塾之类也可以行释奠释菜礼，把歌诗用于祭孔典礼是完全可能的。当然总的来说，跟成人场合的登歌比，小学之歌诗更多是预备性质。

由于今天不少人以为朱子单调，与音乐似乎无缘，所以关于他的音乐这里多说几句。朱子丰富的音乐实践前文以及之，而他的音乐理论在他的时代其实也是一流。读者具体可翻阅其长篇论文《琴律说》及诸多经注、语录。据郑俊晖的博士论文《朱熹音乐著述及思想研究》所言，^⑧中国最早的律吕谱《风雅十二诗谱》收入朱子及其门人编纂的《仪礼经传通解》，经过了朱子与作者赵彦素的切磋；而中国音乐学史上的重要著作、署名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实为蔡朱二人共同的智慧成果。相视其浩繁的著述，关于朱子本人音乐实践的文字真的是凤毛麟角。究其原因，相比于个人自娱的音乐，朱子更关心礼制层面的音乐，也就是他在《诗集传》序中说的“可以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的音乐。他对《诗经》乐谱、音律的大量讨论，正是基于乐教方面的无比热情。有研究者指出，由于朱子对音乐的主要功能强调它的社会教化，导致“会友之时，乐而放歌于

朱子是常有之事，但他却不说。”^⑨换言之，不是其他可能的合唱，而是上述周礼中的登歌才是他关心的合唱。

注释：

① 语出陶潜（365-427）《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

② 语出叶梦得（1077-1148）《避暑录话》。

③ 陈荣捷：《朱子新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1-92页。

④ 朱松《韦斋集》卷十《先君行状》。

⑤ 汤石香：《“太古遗音”和它打开的千万古琴时代》，《古典工艺家具》2016年12月刊。综合各路报道，朱子用过或收藏过的古琴，怀疑尚有三把传世：1947年，著名古董名家王世襄（1914-2009）于北京地安门外万宝兴古玩店购入一琴，琴池内右侧刻有“朱晦翁藏”（王世襄《自珍集》）；1963年春，部队离休干部王贛于北京宝聚斋古玩店购得古琴一张，琴腹刻有“大宋庆元己未年朱熹制”（1984年版《淄博市文物志》）；2011年8月19日，台北“琴为何物——历代传世古琴暨当代古琴大展”，展出朱熹用琴“冰磬”，有铭文“宫应商名、击玉敲金、怡情养性、中和且平、淳熙丁未秋日，晦翁自铭”（中新社当天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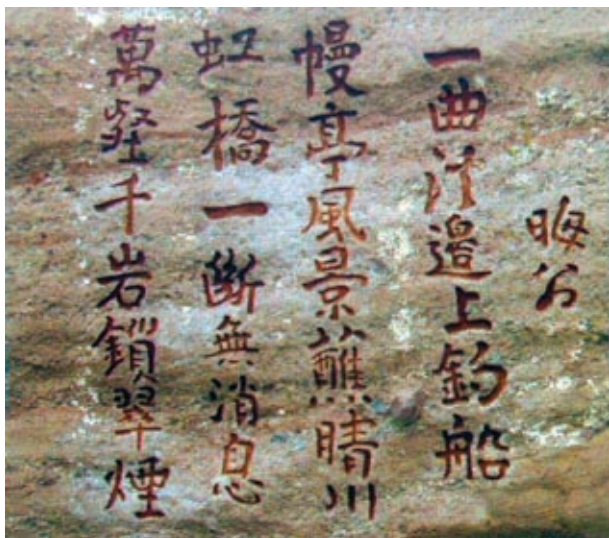
⑥ 参阅朱燕：《明代书院唱诗觅踪》，中国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⑦ 崔铣《洵词》卷七《休集·训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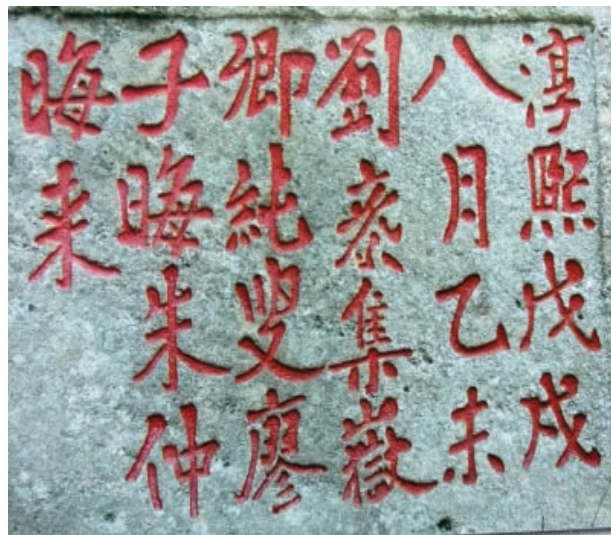
⑧ 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⑨ 郑锦扬：《朱熹音乐思想论稿》，《中国音乐学》1992年第3期。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武夷山《九曲棹歌》摩崖石刻



朱熹偕门人游武夷山九曲留下的石刻



福州鼓山摩崖石刻

元代福州摩崖石刻考述

■ 詹建林

摘要 历代官僚士大夫在福州的名胜地留下许多摩崖石刻。在宋、元、明、清四个朝代中，元代留下的石刻数量远远低于其他三个朝代，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元代存在多元的文化特质，元代科举制度规模的狭隘与汉文化官僚比重小，福建人民激烈的抗元运动和元政权持续时间短于宋、明、清等。探讨福州元代摩崖石刻相对稀少的原因，有助于我们理解元代政治、文化和社会形态及其在中国各朝代中的位置。同时，也为我们研究摩崖石刻的产生提供另外一种视角。

关键词 摩崖石刻 福州 元代

作者 詹建林，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福州 350007）

福州自古乃闽中“首善之地”，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作为福州历史与文化见证的载体，摩崖石刻记录下非常多的书法、文字信息，不仅能拓宽我们的历史眼界和文化畛域，还能让我们从中获得历史、文化和艺术方面的享受和启迪，值得保护和研究。目前，已查得的福州五个行政区域（鼓楼、台江、仓山、马尾和晋安）内曾有的摩崖石刻共有1476段，其中，现存1160段，佚

失316段；还查得岩画2处，摩崖造像12处。在现存摩崖石刻中，宋刻198段、元刻33段、明刻101段、清刻250段、民国题刻147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石刻92段、疑刻339段。^①福州摩崖石刻不仅数量非常可观，而且内容和形式十分多样，有诗刻、题名、榜书，也有楷书、行书、隶书等，其中也包含了一定的史料。如乌山霹雳岩的潘正夫题记，就记载了靖康之变后部分宋室后裔南迁的路



榜书“冰壺”

线。在这些石刻中，元刻数量远远少于其他朝代，这激起了研究者的研究兴趣。

—

福州现存的元代摩崖石刻绝大部分分布在乌山和鼓山，其中乌山有19段，鼓山11段。此外，于山和福州北郊分别有2段和1段。元代石刻数量虽然不多，但其内容和形式却较为丰富，主要有诗刻、题名题记和榜书3种。

(一) 诗刻

元代诗刻分布于乌山、鼓山和于山，乌山2段，鼓山5段，于山2段，共9段。这些诗刻顾名思义是指文人士大夫交游时将所题之诗刻于石上，如鼓山石门附近所刻元代闽海道肃政廉访使赵文昌诗刻：“海上诸峰剑戟稠，兹山盘礴甲闽瓯。天风下控三千界，岛月旁通十二楼。郡志昔常夸绝域，版图今始附中州。六朝而后多词客，谁得题诗到上头。总统三藏大事沙罗巴，监宪公脱脱木儿，签司陈锡、潘昂霄、秃满同予来游。大德二年春正月己未，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济南赵文昌题，时靖也侍行，长老在山杰公刊诸石。是年四月初吉，靖同耆宿吴绮、陈子修重来。”^②

此类石刻一般在所刻诗句下会有落款，记录题诗作者、时间以及交游人员等。有在诗句前面先交代时间、交游人员及题诗作者，如鼓山灵源洞的郝彦泽诗刻。也有在诗前记录所题诗的题目，如鼓山石门郑至诗刻所题“谨用先祖日湖文靖韵”^③字样。除个人所题诗外，还有多人联句、共咏一诗的情况，如乌山道山亭旁的僧家奴等联句：“追陪偶上道山亭，叠嶂层峦绕郡青（子迪）。万井人家铺地锦，九衢楼阁画帏屏（元卿）。波摇海月添诗兴，座引天风吹酒醒（本初）。九立危栏频北望，无边秋色杳冥

冥（文卿）”，诗刻后附有说明性文字。“右宪使崑山僧家奴元卿公，金宪奥鲁赤文卿公，申屠驹子迪公，赫德尔本初公暇日宴集联句也。谭忝备宪幕重，惟诸公皆文章名士，南北隔数千里同仕于闽，以道义相处，文字为娱，诚一时之嘉会，因勒岩石以纪我元文物之盛云。至正九年八月望日，经历赵谭识，知事任允书，宪副朵儿只班善卿公继登斯亭，览山川之胜概，睹群公之赋咏，曰此盛事也，遂题于其后。”^④该石刻不仅将所题诗句作者刻于石上，在落款处将联句缘由，题刻的作者、时间及过程都交代得十分详细。由此可知，这类诗刻大多是士人相携而游，睹山川盛景有感而咏之诗，后刻于崖石之上以作留念。

(二) 题名、题记

福州元代现存石刻中，题名、题记数量最多，乌山题名、题记14段，鼓山题名5段，福州北郊题名1段，共20段。因数量较多，这里仅选取几段有代表性石刻以作说明。

鼓山灵源洞西向的朵儿班等题名：“至正庚寅五月十有九日，宪副朵儿只班善卿，金宪奥鲁赤文卿，赫德尔本初公余出郭阅稼，因游灵源洞，勒石以纪岁月云。译史廉丑斯，书吏刘濬、黄齐贤、王德政、马居礼、吕鼎、李玄逮、元臣，奏差辛元振、程廷壁侍行。时住山海翁长老。”^⑤

乌山道山亭旁焦德裕等题名：“岁元莫敦牂中秋后之二日，闽省参政易阳焦公宽甫自清源归觐，道福唐，又三日宣慰秀岩石祥甫载酒会于乌石之道山亭，申隐信云甫，省郎镇阳毛汉卿，提举东平古纯甫、寓客南洲卞仲元、住山释绍玉与焉。时秋雨霁，金飏荐凉，秀壁苍崖，云烟掩霭，如助献酬者。而行波长陆，平畴远水，皆隐现于履舄之下，真奇观也。盖自开辟既有此山，阅几千年而有今日，其可无以纪岁月。笔之者申隐云甫，摹之石者释绍玉也。”^⑥

乌山天章台边李世安题记：“至正壬辰冬，余以柏府之命如广海，经三山，止神光寺，明年正月朔寇逼郡城，是日与廉使许希文共守南门，董督备御越二十六日。建



榜书“乘云”

部分宪金事郭继先率援兵南下，贼遂败溃宵遁。迄秋，余自广回，复假禅榻之寓者弥月，凡山川之形胜，民物之殷庶，无不在心目间也。噫！人生等浮沤，世事如转蓬，是以登兹山而增感慨，抚故实而兴嗟。后之纪斯游者，亦必览是而有感焉。至正十三年良月九日，前大兴府尹海道都漕运万户燕山李世安识，时侍行吏吴人葛思让也。”^⑦

以上观之，题名一般只记录刻石时间、人物以及大部分“以纪岁月”的目的，少部分省去时间，只留下人物以及“笔者”及刻字者，如乌山的“孟诚等题名”。也有小部分内容较长、记录相对详细的名，如上文提及的道山亭焦德裕等题名。题名字数少的如乌山“林君则等题名”仅二十七字，多的有一百多字，如焦德裕题名。总体来说，题名字数较少，记录相对简单。题记内容则相对详细，如上文李世安题记记录了“朔寇逼郡城”的有关农民起义的情况，同时叙述了登山时所抒发的感慨，文末还记录了时间和随行人员等，内容颇为详尽。再如，乌山天秀岩西侧的“揭泐题记”所题《东壁亭》题记，记录了东壁亭的由来、东壁亭周围的景色、书写题记的目的，以及题记作者和刻石者，全文两百多字，内容十分详细。

(三) 榜书

福州元代摩崖石刻的榜书现存仅有3段，其中乌山2段，鼓山1段。

乌山天秀岩榜书：“天秀岩，至正甲辰四月题。”^⑧

乌山霹雳岩清冷台榜书：“清冷台。”^⑨

鼓山观瀑亭边王用文榜书：“乘云，王用文书”。^⑩

这些榜书字较大，内容简单，仅记录地名或一个词语，部分有落款，3段皆为楷书。

综上所述，福州元代摩崖石刻数量虽少，但种类繁多，涵盖了诗刻、题名题记和榜书三种类型，且每个类型有不同的形式，记载的部分内容和所刻造型结体蕴含不小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为研究相关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提供了依据和史料。

二

为了深入研究福州元代摩崖石刻及其价值，笔者将之放在整个福州摩崖石刻的层面上，做了一个更详细的福州各朝代各地现存摩崖石刻的分布情况表。福州摩崖石刻大多为宋及宋以后所留，仅有少数为唐代所留，且摩崖石刻成为最普遍最常见的现象要到宋代以后。^⑪考虑到可比性，只统计宋至清的现存数量，且疑刻不计入统计数据。

表1 福州摩崖石刻朝代和地区分布

	宋	元	明	清
乌山	40	19	28	24
于山	32	2	22	12
鼓山	89	11	32	176
福州东郊	9	0	2	6
福州北郊	8	1	3	13
南台岛	7	0	7	6
马尾、亭江、琅岐	9	0	5	3
北峰	4	0	2	10
合计	198	33	101	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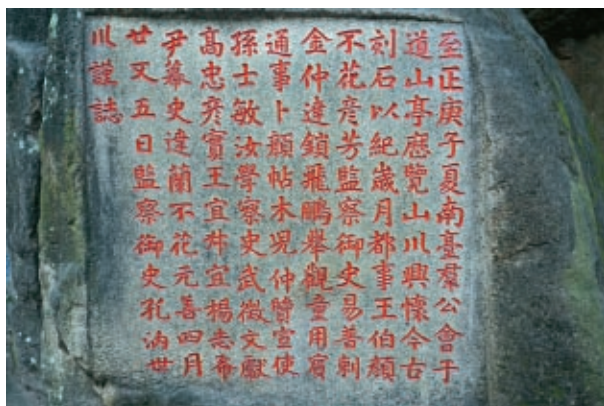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于黄荣春：《福州摩崖石刻》（增订本），福建美术出版社，2011年。

从表1数据来看，不管横向还是纵向，元代石刻的数量都低于其他朝代，部分地区数量的差距还非常大。历史上虽然出现过明代把北京孔庙保存的元代进士题名碑磨掉改刻，^⑫或上一朝代碑刻被下一朝代改刻的情况，但从福建相关史志和摩崖石刻的一些研究资料来看，没有发现元代石刻被大量人为销毁改刻的记载。因此，排除后人故意损毁的因素，元代的石刻不论是数量还是内容都远远少于其他各朝代，这种现象值得探讨。

(一) 与元代以蒙古文化为主导，多元文化并存，汉文化特质不明显有关

摩崖石刻的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以“名山之最”的泰山摩崖石刻为例，其内容包括历代帝王封禅告祭文、寺庙创建重修记、石经墓铭、颂岱诗文、题名及楹联等，其文字既有真草隶篆，也有四体揉融；既有如斗大字，也有蝇头小楷，等等。这些内容、形式与汉文化息息相关，虽寺庙创建重修记和石经与佛教有关，但其形式或内容亦离不开汉文化。因此，摩崖石刻的产生离不开汉文化的熏陶。

唐以后，随着文教事业的发展，福建文化进入国内文



伯颜不花等题名



乌山刘顺老等题刻

化最发达区域的行列。^⑬至宋代，闽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闽学集濂、洛、关三学之大成，把儒学推向极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⑭这一时期，形成了极盛的集会交游风气，文人士大夫寄情山水，且留下了许多交游活动的史迹，摩崖石刻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福建摩崖石刻在宋代以后数量多起来的主要原因。福州三山之一的乌山，因其秀美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了士大夫的眼球，成为交游集会胜地，有着“得古人之遗意”的美名。士大夫在集会交游的同时，也留下许多崖刻石书，这也是乌山目前现存石刻高于其他几个地区的重要原因之一。明代儒学经历了程朱理学、王守仁心学和王学左派为主三次学术思想的变化，每一次变化后的儒学思想都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潮。^⑮清朝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满汉交融，清代儒学继续发展。先是顾炎武针对宋明理学的弊端，主张经世致用，提倡朴实学风，开启了清初儒学新风气。到了乾嘉年间，以四库全书馆为大本营，乾嘉考证学派迅速发展起来，形成吴和皖两支学派，^⑯明清摩崖石刻可观的数量与此不无关系。

相比于宋、明、清三个朝代，元代汉文化所处的位置有很大的不同，比其他各朝代文化更具有兼容并蓄的特点，草原、中原、伊斯兰等文化在元朝得到广泛的交流与传播，在元文化中留下了各自的印记。^⑰这种多元的程度，同样是少数民族占统治地位的清朝未能达到的。虽然统治者部分接受了汉民族文化，但元朝没有放弃蒙古文化的主导地位，而是采取了多种措施来保存、发展和弘扬本民族文化。元统治者在宗教信仰上所持的也是多元并行的政策，崇尚藏传佛教，对汉地的佛教、道教、萨满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也采取保护政策。这一时期，佛教禅宗和律宗的势力很大，而道教兴盛程度也已超过唐、宋。

摩崖石刻的产生离不开汉文化的熏陶，且福州摩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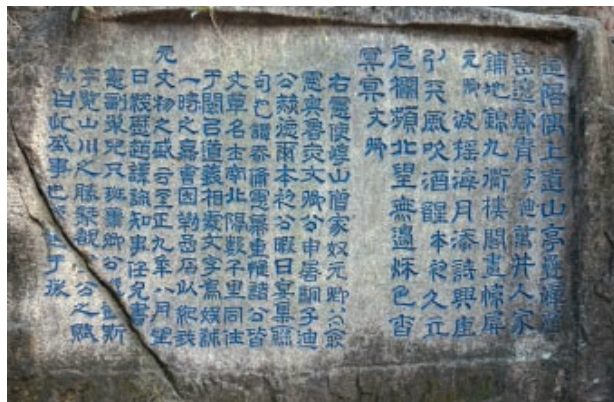
石刻多是硕儒俊彦们集会交游、流连山水时书写题签所留下的产物，是众多文人学者的兴至之作。这些作品文采纷呈、众体兼备，彰显着汉文化独特的魅力。一般来说，在文化受众数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文化影响的种类越多，各文化的影响程度就越小。故在元代多元文化并存情况下，汉文化的影响力相比于宋、明、清小得多。元代崖刻石书数量相对稀少，是这种影响力减小的后果的表现之一。

(二)与元代科举制度规模小，汉文化官僚比重也小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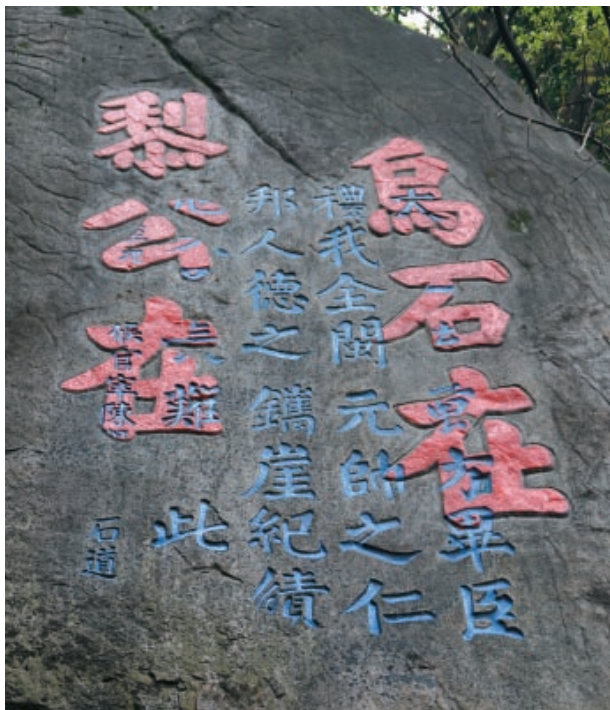
摩崖石刻的产生与汉文化脱不开关系，而汉文化的传播与发展离不开其承载的主体——人。综观全国各地著名的摩崖石刻作者，历朝达官贵人、文人骚客占据了绝大多数。如泰山有苏轼、蔡京、康熙帝、乾隆帝等的题诗词，武夷山石刻中朱熹及其友人、弟子等交游论学的石刻数量十分可观，汉中褒斜道石刻中著名的“石门十三品”就有曹操等人所书石刻。再看福州，其摩崖石刻作者可考的大部分为历代的达官贵人、文人，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北宋福州知州程师孟、南宋参知政事孟庾，以及李纲等等。因此，摩崖石刻与接受汉文化的达官贵人、文人骚客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隋唐以后，科举制与以儒家文化为主的汉文化相结合，成为知识分子入仕的重要途径之一。科举制推行的规模与接受汉文化官僚的比重有非常大的关系，而汉文化官僚及文人恰恰就是留下这些摩崖石刻的主体。因此，科举制度的规模大小与汉文化官僚的比重多少，对摩崖石刻的产生有着间接或直接的影响。

科举制是隋唐以后知识分子入仕的重要途径之一。尽管隋唐至明清历代都推行科举制，但各个朝代科举的取士数量和进士的地位各有差别。据《续文献通考》卷三十四统计，从元世祖忽必烈1271年定国号为元算起，有元一代98年间共开科16榜，举士计1135人。而两宋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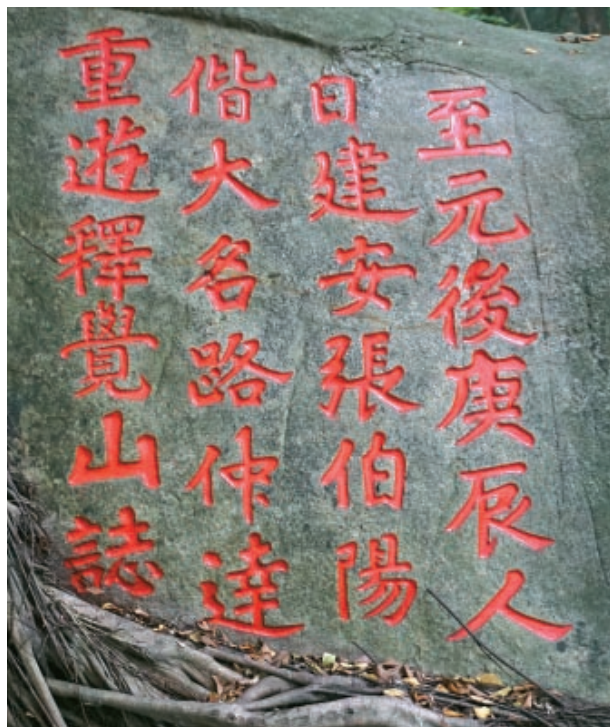


乌山僧家奴等联句题刻



陈石道残刻

过科举共取士 115427人，去除武举、宗室应举之外，亦有 110411 人。明代一共开科88榜，取士24590余人。^⑧清代从顺治元年至光绪三十一年的一百六十二年间，开科取士112榜，共录取进士26832人。^⑨从数字上看，元代科举录取的人数远远低于其他各朝，官僚出身科举者的稀



张伯阳等题刻

少便可以想见。进士出身的官僚，恰恰是留下福州崖刻石书的主要人物。在分布于乌山、于山和鼓山的元刻中，作者可考的诗刻、题名题记和榜书全部为元代官员，且部分为进士。其余部分即使是元朝皇室成员，其汉文化水平也相对较高，才有可能以诗赋、词句等形式留下石刻。对比宋、明两代纯粹由汉族官员组成，及清朝满汉官员的汉文化水平较高，元代石刻数量相对稀少便不足为奇。

(三) 与福建人民展开的激烈抗元运动有关

据《元史》记载，1277年至1294年元朝全盛时期，发生在福建境内的抗元运动就达到十三次，超过全国总数二十三次的一半以上。如果以各种典籍、方志等统计，福建的抗元运动有三十四次之多，这是其他朝代所未曾有过的。^⑩频繁的兵灾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从至正十七年至二十六年，福建沿海地区的兵灾人祸持续十年之久，影响十分深远。福州作为福建首府，是中高级官员处理各地政事的中枢及主要调兵之地。激烈的抗元运动和各种兵灾人祸，使得元统治者及福建大小官僚花在镇压人民反抗运动和处理各种矛盾上的时间相对增多，像宋代文人士大夫经常性的集会交游的现象就很难重现。据笔者考察，福州现存的元代33段摩崖石刻中，除去无实质内容的榜书和因其他原因所刻的石刻外，有22段石刻为元代官僚士大夫登山交游所留，占元代福州石刻总数的三分之二，这表明元代石刻的产生与元代文人士大夫的交游息息相关。福建人民激烈的反抗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文人士大夫的交游风气，也间接影响了元代福州摩崖石刻大量产生的可能性。

(四) 与元代政权的持续时间大大低于宋、明、清三代有关

从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政权开始，到朱元璋于1368年称帝建立明朝，元王朝存在仅98年。北宋、南宋政权享国时间分别是167年、153年；明朝享国294年，清朝享国276年。对比可看出元朝政权存在时间大大低于宋、明、清三朝。如果除去从元朝建立到灭掉南宋那段时间，元朝实际统治福建的时间只有90年不到，达不到宋、明、清的三分之一。如果按照四个朝代每年平均产生的石刻数量来算的话，两宋时期共320年，平均每年0.62段；元代98年，平均每年0.37段；明代294年，平均每年0.34段；清代276年，平均每年0.91段。就每年平均数来看，四个朝代的数量差距相对较小，且元代每年产生的石刻数量排第三，还在明代之前。宋、明、清三代，各自在两三百年时间里提供了创造这些崖刻石书的充裕时间，这



鼓山“喝水岩”题刻

同样也是元代所未能有的。因此，元王朝的短命，间接排除了摩崖石刻大量产生的可能性。

福州元代摩崖石刻数量相对稀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与各朝代政治、经济、文化、风俗观念和官员士大夫所处环境，及内在心理息息相关。除此之外，也与摩崖石刻自身所特有的文化内涵密不可分。探讨福州元代摩崖石刻相对稀少的原因，有助于我们理解元代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形态，及其在各朝代中处于怎样的一种比较特殊的位置，为我们研究摩崖石刻的产生提供另外一种视角。福州历代摩崖石刻是先人留下的珍贵遗产，给我们带来历史文化和艺术上的启迪与享受。同时，也是我们研究历史人物、事件的实物资料。不管其数量多少，都是福州摩崖石刻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摩崖石刻多样性和整体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记载的历史信息与彰显的文化内涵，值得我们进一步予以保护和发掘。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黄荣春：《福州摩崖石刻》，福建美术出版社，1999年，前言、第116-117

页、118页、20页、119页、20页、24页、26页、27页、121页。

⑪⑫ 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09页、115页。

⑬ 徐晓望：《论唐代福建儒学教育的发展与文化的兴盛》，《教育评论》1996年第2期。

⑭ 汪征鲁：《闽文化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

⑮ 王平：《明代儒学的嬗替与小说的流变》，《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

⑯ 宋志明：《论清代儒学的再整理》，《文史哲》2005年第5期。

⑰ 汤晓方：《论元朝文化的历史地位》，《内蒙古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

⑱ 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5期。

⑲ 郭培贵：《明代科举各级考试的规模及其录取率》，《史学月刊》2006年第12期。

⑳ 林祥瑞、刘祖陞：《福建简史》，国际华文出版社，2004年，第102页。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鼓山榜书“灵源洞”

尤溪县桂峰村文化建设 中传统文化的价值

■ 胡志明

摘要 本文以福建省尤溪县桂峰村为个案进行研究,认为农村文化建设要立足农村实际,发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丰富农村文化建设的内涵。同时,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关键词 农村 文化建设 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

作者 胡志明,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科员,文学博士(福州 350003)

农村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家书屋、广播电视网络、农村文化活动中心等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不断完善,农村文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农村文化内涵越来越“新颖”,农民文化生活越来越“时尚”。不过,深入乡村,不难发现

当前农村文化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文化建设内容与农民实际文化需求脱节,各种文化设施利用率不高,优秀传统文化缺位,等等。

本文就笔者在尤溪县洋中镇桂峰村驻村蹲点期间的观察,谈谈家训文化、耕读文化、祠堂文化、祭祖文化等传统文化样式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价值。





桂峰村家训

一、传承家风家训，引领文明乡风

家训，是家中长辈关于治家教子的训诫。家训文化源远流长，内涵十分丰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先秦时期的“五经”开始，传承下来的家训数不胜数。其中世人比较熟知的有：周公《诫伯禽书》、诸葛亮《诫子书》、颜之推《颜氏家训》、唐太宗《诫皇属》、包拯家训、朱熹《朱子家训》、袁采《袁氏世范》、朱柏庐《治家格言》等。这些家训著作蕴含着丰富的人生观、价值观，在我国古代的家庭教育和家风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历代先辈通过家训告诫子孙后人如何立身处世、持家治业，这既是对家训这一传统文化样式的肯定，也是利用家训文化建设优良家风的持续实践，其本身亦是一种家庭文化建设和对家训文化的传承。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文化建设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文化建设。农村亦是由一个个普通家庭聚集组成的。家风正，则民风淳；家风正，则政风清。农村的文化建设必须着眼于一个个家庭的家风文化建设，只有每个家庭的家风建设好了，农村文化建设才会有根基、有成效。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家风建设，重视传统家训在家风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习近平主席强调，“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子女教育得好，社会风气好才有基础”。“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良好家风和家庭美德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的直观体现。”开展当代农村文化建设千万不能遗忘了家训文化的存在，不要忽略了家训文化的价值作用，要积极发掘和充分利用家训文化，建设好家风，为农村文化建设服务。优秀的家风家训能够引导村民自觉地承担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履行法定义务，在乡村社会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好氛围，培育知荣辱、讲

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新风尚。

传承家风家训，建设农村文化，我省走在全国前列。早在2014年，福建省委文明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省妇女联合会就联合编纂出版了《福建家训》，并安排专项资金配发到全省的农家书屋，服务农村文化建设，得到广大村民的喜爱。尤溪县桂峰村历来重视家家家训，传承历代祖辈的家训，民风淳朴。从第一次修族谱开始，桂峰村就把家训写进了族谱，历次重修都未落下。后来村里搞文化建设，更将家训全部摘录制作成字幅悬挂在祖庙、祠堂，时刻提醒每一个村民不要忘了祖辈的教导，学会立德修身、勤俭持家、睦亲礼法。现实生活中，村民常常把祖辈的家训挂在嘴边，学习家训中的为人处世道理，利用家训教育子女、处理家庭关系和家庭事务。村里的干部在处理村中事务时也不忘祖辈的家训，经常利用家训调解一些家庭矛盾、邻里纠纷。

农村文化建设要善于发掘家训这一文化样式价值，特别要发挥其在家风建设、道德教化以及维护乡村秩序等方面的效用。利用好家训、建设好家风，有助于提高村民自身的道德素养，增强村民对乡村集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营造和谐淳朴的乡村氛围，涵养乡土文化，提升农村







村前梯田

文化建设水平。传承家风家训，要重引领，树典范。每镇重点抓好几个村，每个村着力抓好若干户，发挥典型的带动辐射作用。传承家风家训，要重展示，建载体。除了在村里的公共场所悬挂家训外，还要指导每户家庭以镌刻、镶嵌、墙绘、摆台、牌匾等表现形式在家居显要位置展示家训，也可以通过举办朗诵、书写等村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提高村民的参与热情。传承家风家训，要重深入，促长效。农村不缺优秀文化，也不缺好做法，农村文化建设缺的是将优秀传统文化持续传承的具体实践。传承家风家训，建设农村文化，要持之以恒。

二、传承耕读文化，倡导自立自强

耕读，即农耕与读书相结合。“耕”，可事稼穡，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是为生存之本；“读”，可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是为教化之路。在传统农耕社会，通过“耕”百姓可以致富，通过“读”可以接受教育。在我国很多农村的建筑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对联。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关于耕读结合的主张。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提出“要当穡而食，桑麻而衣”。清初理学家张履

祥的《训子语》提出“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耕读不是简单的半耕半读的生活方式，而是一种价值追求、一种文化传统。

耕读文化是传统社会中以乡村为空间、以家庭为单位，村民自发耕种与读书相结合的教育习俗与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的软实力，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样式，耕读文化的内涵丰富。耕读文化提倡勤俭生活，因为勤俭是居家的根本，特别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社会，只有勤俭才能保证生活的不匮和做到量入为出，维持长久生活。耕读文化倡导勇毅刚强的品格，因为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只有勇毅刚强、敢于担当，遇到逆境才能坦然面对、不屈不挠。耕读文化提倡广泛学习各种知识，因为只有善于吸收各种文明成果，才能不断进步。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耕读文化正在被慢慢抛弃，特别是村民对耕作和读书的认识越来越浅显和功利，“种地不致富”“读书无用”等观念慢慢流行，很多耕地被抛荒，杂草丛生，不少适龄学童弃学打工，村民也不爱阅读、学习。因此，在农村文化建设中要努力倡导耕读文化，重塑宜耕宜读的农村田园生活方式。

桂峰村历来重视耕读，有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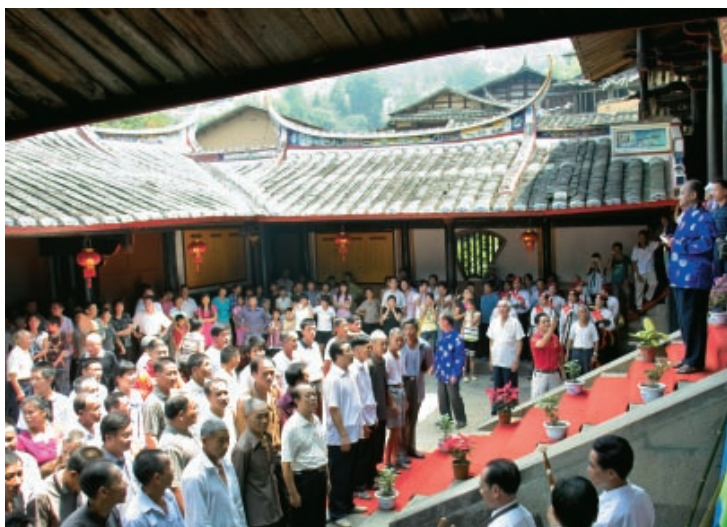




祭祖大典

上出了很多读书人。据族谱记载，明清两代有进士3名、举人12名、秀才412名。这些读书人，为村里留下了丰厚的文化积淀，也传下了崇文尚学的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桂峰村走出去的读书人有数百人之多。为了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村里把这些读书人或写进族谱，或在祖庙、宗祠张贴历年大学生名录，悬挂“父子

举人”“兄妹硕士”等牌匾；还设有专门的奖学金，奖励每年新考上的大学生；修复了村里的玉泉书斋，经常组织小孩举行私塾开蒙礼、农田采摘、收割稻草等活动；建立耕读文化展览室，让小孩感知耕读文化，让青年人感受耕读文化，让中年人感悟耕读文化，让老年人感怀耕读文化。



祭祖大典·颂祭文

当前，在农村建设中传承耕读文化，不仅是为了单纯地传承，而是要从耕读文化中寻找新的启示，从传统耕读文化中找出适应现代生产生活的新因素。除了传统的耕种养家、读书为官，在工业化和社会转型加速推进的今天，对“耕读”应有新的解读。“耕”不仅仅局限于农业耕种，而应理解为各种勤劳生产；“读”不是简单的读书，而是终生的学习、不断地创新。所以，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在强调村民勤劳生产的同时，要培养村民的阅读习惯，拓宽村民的信息接收渠道；要经常性地组织村民学习培训，特别是学习先进的生产理念和科学的耕作方式，提升村民生产技能。传承耕读文化要从娃娃抓起，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在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小学开设耕读文化地方课程教育，要让小孩亲身体验传统耕作的方式和传统教育的形式。

三、传承祠堂文化，构建和谐乡村

祠堂文化是村民获得文化归属感与共享感的直接媒介。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祠堂、祖庙具有祭祀、修谱、教化、兴学、司法、抚恤等功能，在乡村治理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在中国这样的大国，特别是在交通和资讯不发达



儿童学习传统礼仪

的古代社会，统治者要想有效地治理国家，在乡村更多的需要依靠祠堂这种家族组织实现自治，即乡村的精英阶层通过祠堂这个空间有效地管理地方事务。可以说，古代社会的统治者除了运用正式制度外，还依靠包括祠堂在内的非正式制度，实现有效治理国家的目的。^①然而，长期以来社会普遍认为宗祠、祖庙属于封建糟粕，要从整体上予以否定。通过走访一些乡村，我们发现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很少有祠堂的位置，经常忽视对祠堂的保护和利用，有的村庄甚至将其拆除，为其他建筑让位。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很多村庄开始重视祠堂这个载体，积极发掘祠堂资源，合理利用祠堂文化，把祠堂变成农村文化建设的阵地。一些地方的祠堂设立了老人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民间管理机构，为宣传思想道德和科普知识、调解邻里纠纷做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有利于乡村基层的和谐稳定。有些村庄则积极引导祠堂活动，请走祠堂内原有的菩萨、神位等，取而代之为成年宣誓仪式、尊老爱幼、移风易俗教育等各种宣传教育活动，培育时代新风尚，为引领先进文化进入农村祠堂、祖庙作了有益探索。还有不少地方把村里的功德榜、成才榜、家训民约等引入祠堂，在祠堂设立棋牌室、电视室、阅览室等公

共文化活动现场，对村民开放，节假日还举办各种文化活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村民生活观念的变化，个别有条件的村庄还充分发挥祠堂、祖庙的旅游资源，对一些年代久远、保存较好、有一定建筑文化价值的农村祠堂、祖庙进行保护和开发利用，形成旅游景点。通过图片、文字等方式展示祠堂文化，加深村民、游客对祠堂历史、文化的认识，同时也增强了村民对祠堂的保护意识。

桂峰村有一座蔡氏祖庙和一座蔡氏宗祠，是村里最重要的建筑。特别是蔡氏宗祠，村里人都引以为荣。据老人讲，祖庙每个村都会有，但要建宗祠必须是祖上有人中了进士才有资格。桂峰村的祖庙和宗祠历来是村里商议大事、要事的场所，现在村里的一些重要事项除了在村务公开栏公示外，还要在祠堂公示，特别是每年的蔡氏祭祖（是村里的重大活动）都必须在祠堂举行。另外，村里编修族谱、老人协会开展工作等也都在宗祠。村民形象地称其为村里的“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在祖庙和祠堂决定的事，村民会坚决拥护和支持。

可见，当代的祠堂其名称或许还沿用了旧制，但文化内涵却有了新的变化。祠堂可以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阵地。在农村文化建设中，要正确认识祠堂文化的历史意义，发掘祠堂文化的现代价值，继承和弘扬祠堂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矛盾，在农村文化建设中，我们的认

识要与时俱进，改变对祠堂文化的传统偏见，充分利用宗祠文化，增强村民的文化归属感与共享感，提升村集体的凝聚力。特别是一些村部办公条件差、村民诉求多的村，要充分发挥祠堂的拓展社会公共空间、综合表达村民利益等功能，为农村文化建设服务。

四、传承祭祖文化，弘扬孝道传统

祭祖是中华文化中一个极为重要且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不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祭祖是每个中国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传统仪式。

就现有资料来看，我国最早的祭祀行为在殷商甲骨文中就有相关记载。如，甲骨文中有“岁”“报”“又”等文字记录，是商王为了禳祓避祸、祈福求吉而祭祀历代先公先王的。他们定期通过举行祭祀活动，向祖先奉献各种规格的祭品，取悦祖先，祈求祝福。正如胡适所言，看殷墟出土的遗物与文字，可以明白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这个宗教根本上是一种祖先教。祖先的祭祀在他们的宗教里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②。到了周代，关于祭祖有更完整的记录。《仪礼》就对周时的祭祖仪式作了全面、系统的记载。从中可知，当时祭祖有各种仪式、各个程序，完成一次祭祖要耗时费力，足见周人对祭祖的高度



村民观戏



村中的清代茶楼

重视。朱熹言“盖人之生，无不本乎祖者，故报本返始之心，凡有血气者之所不能无也”。朱熹认为“报本返始”是做人的基本要求。曾国藩也将祭祖列入治家八诀——“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其中“考”，就是祭祀先祖。可以说，祭祖体现的是个人、家庭、家族对传统文化和传统礼仪的继承和发扬。

中国人祭祖不是单纯的仪式表达，而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在祭祖的过程中，融入了祭祀者自己对祖先的崇拜、感恩、怀念等多种复杂情感诉求，确认了祭祀者的孝子孝孙的身份，并告诉自己开始承担延续家族历史、家族文化的责任。祭礼既是对祖先的祭祀，更是祭祀者对生活价值的探求。在农村文化建设中传承祭祖文化，不是刻意追求祭祖仪式的外在表现形式，而是要彰显祭祖文化的内在价值，弘扬中华文化的传统孝道，增强村民的归属感和凝聚力。正如清代孙希旦所言：“夫祭之为物大矣，其兴物备矣。顺以备者也，其教之本欤？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是故明君在上，则诸臣服从；崇事宗庙、社稷，则子孙顺孝。尽其道，端其义，而教生焉。”

桂峰村的祭祖文化深厚，除了遇传统节日各家各户自己祭祖外，村里每年都会举行全村人参加的祭祖仪式，并且每三年会格外隆重地举行一次，所谓“每年一小祭，三年一大祭”。大祭时，村里的老人会要提前几个月筹备各项事宜，在外工作的村民也都会回到村里，场面非常壮观，已成为当地一种特色文化景观，常常吸引周边群众和许多摄影爱好者前来观看。桂峰村的祭祖文化既是对过去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利用传统文化建设当代农村文化的实践。对桂峰村来说，祭祖就是全体村民文化生活中的大事，是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中国人历来重视血缘亲情，祭祖扬孝是中华民族固有



玉泉书斋

的优秀文化传统，祭祖不会过时。当前，在农村文化建设中，要善于利用各种传统节日、冠婚丧祭等特定时间，鼓励村民集合家人、族人举行祭祖礼仪，不断培植后人的孝道观念与感恩情怀，传承优秀的历史文化，建设先进农村文化。

注释：

① 吴祖鲲、王慧姝：《宗祠文化的社会教化功能和社会治理逻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4期。

② 胡适：《说儒》，载《胡适论学近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美术爱好者在桂峰写生



绍兴故居前的蔡元培塑像

蔡元培与国文教育改革

■ 颜 禾

摘 要 蔡元培是我国近现代占有重要地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主持并参与教育改革和活动的同时，一直关注国文教育，参与国文教育改革，并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这些见解精辟独到，新人耳目，回答了国文教育提出的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关键词 蔡元培 国文教育

作 者 颜 禾，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福州 350003）

蔡元培（1868-1940），浙江山阴人，毕生献身教育，贡献卓著，是我国近现代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中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蔡元培于1907年赴德国留学，广泛接触并研究西方的哲学、美学和心理学，1912年9月再度赴德研修，1913年10月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1912年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成为民国教育的设计师。他对中国的封建教育进行改革，亲自主持制定并颁布“壬子癸丑学制”，取消忠

君、尊孔的课程，废除毕业生奖励科举出身的制度，要求教育联系实际，适合儿童身心发展。这个教育制度具有反封建意义，建立起了“国民教育”的新体制。1916年至1923年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28年8月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作为民国文化教育事业方面的一位举足轻重的领导者，他在主持并参与教育改革和活动的同时，一直关注国文教育，参与国文教育改革，并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

蔡元培早年曾在南洋公学担任国文教师。南洋公学于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由盛宣怀奏请设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增设特教班，蔡元培应聘任特教班总教习。他指导学生，参考并采用书院的模式，即学生自由阅读，写出札记，由教员阅批；月终由教员命题考试，评出等级，送交鉴定。这种札记实际上就是读书笔记，由他为学生规定修学门类及应读的参考书，学生按其规定自认一门或两门，每天写读书笔记呈交，他亲自批改，隔一两天发下。每月作文一篇，也是由他出题和批改。他注意与学生的直接交流，一般每夜召集两三个学生进行个别谈话，有时对学生提出问题，有时让学生讲述学习心得，有时请他们谈论对时事的感想。全班42人，每人隔十来天都要到他房里谈话一次。课余时间也被利用起来，主要用以指导学生自学国文。他认为，学生今后要引领社会，发动群众，必须擅长口头表达。因此，要求学生练习口才，讲好国语，并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进行演说、开展辩论，自己则从旁予以指导。这就是蔡元培早期的国文教学实践，既吸收传统的方式，又引入了新的元素。

1912年2月，蔡元培与诸位同事起草学校法令，筹

备召开高等教育会议，但他认为其中有关教育方针的论述较少，应当对此发表意见。同年4月，蔡元培向参议院作了有关教育方针的政见演说，系统全面地阐明了其对新教育方针的主张。他批评封建主义的教育思想，要求对清朝末年“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旧教育宗旨进行改造，提出“五育”，即“军国民、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及美育”并重、和谐发展的新方针。他指出，这五种教育在国文教育中应占一定的比例。按他的意见，“国语国文之形式，其依准文法者属于实例，而依准美词学者，属于美感。其内容则军国民主义当占其百分之十，实利主义当占其百分之四十，德育当占其百分之二十，美育当占其二十五，而世界观则占其五。”^①就是说国文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就形式而言，语法文法的教学，在智育范围内，是主张学习知识和技能的“实利”所要求的，而修辞技巧的掌握，相当于进行美育，因为关涉到美感问题；就内容而言，对涉及的各个方面的具体分量应作规定和安排。蔡元培对国文教育实施“五育”的阐述，把实用知识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对德育和美育也给予充分的





蔡元培夫妇新婚照

重视。这样，国文科作为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可以为实施教育宗旨服务，贯彻教育方针的任务也能在国文教育中的各个方面得到落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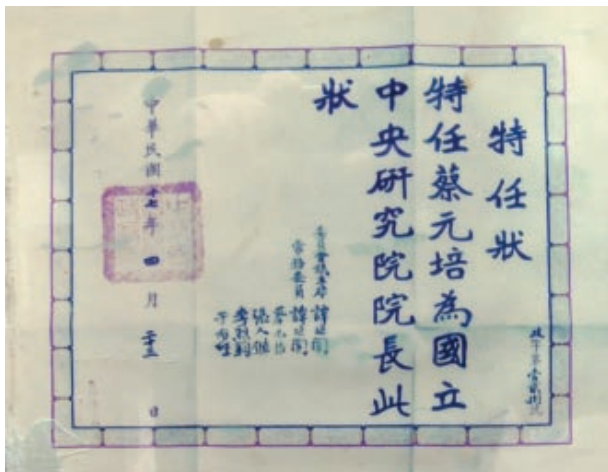
1916年3月，为了筹备设立华工学校，推广在法华工的教育，华法教育会开设师资班，招收教师24人。开学定于这一年的4月3日，入学新生由蔡元培考核检验，该班的德育、智育讲义也由其编写，名为《华工学校讲义》。他亲自讲授，以便通过这些师资转授华工。同年8月起，这一讲义分编陆续在《旅欧杂志》上发表。1919年8月，汇编后在巴黎印刷成书。此后，全国通行的中学语文教科书，均选取其中若干篇为课文，如《舍己为群》《理想与迷信》等。在智育“文字”篇中，蔡元培说，借助文字的记忆和传达的助力，一切以往的思想，可以留存传递到将来；而交换知识的范围，可以不受远近、时间的限制。他写道：“积字而成句，积句而成节，积节而成篇，是为文章。”^②他认为：文章有三类，一是叙述文，二是描写文，三是辩论

文。叙述之文，或叙自然现象，或叙古今人事，以及记载自然科学和历史等；描写之文，抒写人类感情，诗赋词曲属于此类；辩论之文，用以证明真理，纠正谬误，如孔孟老庄的著作，古文中的论说辩难等属于此类。三类文章，互有出入，如叙述历史常加入论断，诗歌中有的也讲述故事。写信时或叙事，或言情，或辨理，三类文章，随时采用。当今报纸，有论文、新闻和诗歌，三类文章兼而有之。他对文体进行分类，指出不同文体的主要功能，并说明其间的相互关系。

国语，指的是全国统一使用的共同语言。国语教育，是向全民族普及语言的教育运动，其主要任务为推广国语，特别是推广到学校教育中去。国语教育对近代国文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蔡元培是国语教育的提倡者和推行者。1916年，一部分语文工作者在北京成立国语研究会，其任务为研究汉语语音，推广注音字母，提倡国语统一和言文一致。1917年，在该会召开的第一次大会上，蔡元培当选为会长。他领衔发表征求会员书，呼吁学界为统一国语而共同努力。蔡元培指出国语教育主要有四项内容：第一，小学教科书都不用文言，全部采用国语；第二，民众教育课本全部采用国语；第三，注音符号加注于国语的字旁。最初的课本，全用注音符号，不必参照旧文字；第四，教员需受过国语训练。他认为，建立国语一是可以实行对国外的防御，二是可以求得国内的统一。人们在求知识、谋职业和为社会服务中都需要运用国语，因而进行国语教育是非常必要的。他们一方面建议当局实行适宜的国语教育，通令各书坊实行“国语案”：不合标准国音的出版物应停止印行；注音符号一律加注于小学教科书内；一



蔡元培与家人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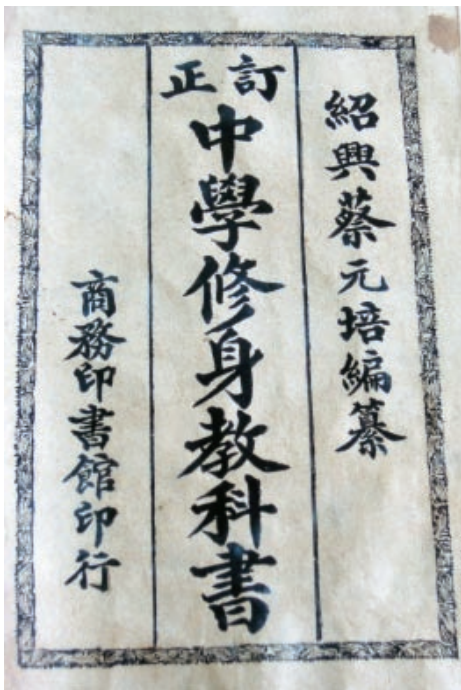


律用国语文并附注音符号编辑儿童读物及民众读物；印刷品应加注音符号，各种书籍、杂志等至少在名称上必须予以标明。另一方面，他们举办国语传习班，录制国语留声机片，用国语播音演讲，采取各种方式促进国语教育。1919年1月，蔡元培呈交“国语研究会请立案”，指出“夫教育不普及，语言不统一，实为吾国之大患”^③。1920年6月25日，他在国语传习所对此又作了一次重要讲演，着重阐述“用哪一种语言作国语”和“提倡国语的顺序”两大问题，建议从语音、语法和国语文章三大关键处着手建设国语。1929年1月，他受教育部之聘，与吴稚晖等32人任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委员，后又任国语教育促进会会长，大力提倡国语运动。1930年4月，他在国语教育促进会作《三民主义与国语》的演讲，宣传提倡国语的重要性。1934年1月，他代表国语教育促进会呈教育部，就如何推行国语教育提出四条意见：一、社会教育人员应认识注音符号，能作国语文，各级教育机关考核录用时必须以此为标准；二、民众学校首要任务在于帮助识字，注音符号作为重要内容，应首先予以教授；三、应用国语文，并在文字旁边加注注音符号，编辑民众读物以及各项文告；四、在公共场所如民众学校教育馆、图书馆、阅报处等，应设法购办陈列，广为传习，积极推行国语图表注音书报等。1935年2月，蔡元培代表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在上海发表广播演说，主要讲了三点：为什么要国语？什么是国语教育？我们怎样促进国语教育？为了推行国语教育，蔡元培始终不渝，奔走呼号，不遗余力。

夏宇众，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国文教员，后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18年6月，其著《中学国文教授之商榷》一书由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会出版，这是我国

现代最早的一部语文教学法专著，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学国文教材教法和学程的见解，可供担任这一学科教学的教师参考。蔡元培为之作序，并在序文中历数当时国文教育的种种弊端：第一，所读的是“死语”，并不在现今语言中通行；第二，一味地读若干篇“模范文”，并没有考虑读本适当与否，文法是否建立、是否符合语言运用实际，学生是否领悟；第三，很少选用合于逻辑的实用文章，大都选用偏于文学的、诗词歌赋之类，即所谓的“模范文”；第四，忽视教学法，学生不知寻根问底，停留静听接受和肤浅的模仿，教师只讲现成内容，不讲为何如此以及如何形成结论，停留于浮泛的评改。这些问题是他根据出国考察教育，进行中外比较，并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而提出的，切中要害，很有针对性。而“夏宇众有鉴于此，以西人治活语之法，应用于吾国之死语，作《中学国文教授之商榷》一篇，其于教者、学者之通病，既为极精确之抉摘，而于是所提出之标准与方法，皆循自然之次序，而语可以实行。”认为此书：“足矫专己残之习惯，使中学国文教员能循是说而实行之，则中学生国文之进步决不至如今之迟缓，可断言也。”^④蔡元培在这篇序文中对夏宇众的著作作了肯定，也表明了其改革国文教育的意愿。

在“五四”新文化浪潮的推动下，白话文逐步深入到文化教育领域。蔡元培提倡并支持白话文。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和国文部主任曾对其发出演说邀请，1919年11月17日，他欣然到校，并以《国文之将来》为题作了演说。他预言，白话的优胜是一种必然趋势，并提出实现言文一致的构想，即各地方言以国语来统一，以注音字母推进这种统一。他说道：“国文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白话和文言的竞争。我想将来白话派一定占优胜的。”^⑤又指出，白话是直接表达，语义明确，文言则间接传达，今人可能无法理解。用文言读写，要将文言译成白话，颇费一番工夫，显然是没有必要的。他主张学习白话，而对文言则应按文体区别对待。他说：“所以我敢断言白话派一定占优胜。但文言是否绝对的被排斥，尚是一个问题。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⑥他对应用文和美术文的语体作了阐述：应用文的作用很明显，就是记载和说明，一是记载自然现象或社会经历，让人有所了解；二是说明真伪美丑善恶的道理，引发讨论与思考。记载和说明重在明白与确实，没有必要多加修饰、增添色彩。诗歌、小说、剧本三类文体称美术文，白话也都适用于这三类文体。从美术的眼光来看，旧式的五、七言律诗音调铿



锵，十分合适；骈文对仗工整，非常匀齐，仍具有一定的价值。国文教育应着眼于学生，以实用为主，学生将来走上社会，研究学问或从事其他工作，离不开实用文，所以教学中宜采用白话。1928年8月，他在大学院院长任上发布通令，宣布小学一律用语体文，废除初中入学的文言文考试。他对国文教育的未来预见，可谓高瞻远瞩；对白话文在这一领域的渗透与推进，可谓亲力亲为。

一味“呆读经文”，往往造成学生脑力窒碍，造成国文教育死水一潭。对此，蔡元培主张打破沉闷局面，引入美育滋养。他认为，美育就是美学理论在教育中的应用，

“以涵养感情为目的者也。”^⑦他又指出美育可以培养感情，使人日趋高尚，可以去私忘我，超脱利害；可以使人寄托于美的享受，去掉生活恶习，从而美化人生。美育与德育有着相通之处，它所采用的手段、所借用的路径就是把美的景物和美的人事展现出来，以引起美感并感染和陶冶性情。音乐、美术是美育课程，国文科本身就有美育元素，也是美育的最基本课程。因此，在上述各科教学中都应该体现美育。1920年6月，他在国语传习所演说时说，古诗文有整齐的句读，抑扬的音韵，由于这种句读、音调悦耳动听，“是与人类审美的性情相投的”，所以变得更加完美。^⑧显然，它在美学上具有审美之处。又如，国文教材中有的内容能激发高尚情操，有的教材形式能激发愉悦情趣，它们都能引起美感，应将其视为美育的因素，在国文教学中充分利用。显然，把美育作为国文科一项重要的教育内容，发挥国文教育的审美功能，以美感染学生的情绪，打动学生的情感，启发学生的心智，有利于全面完成其教育任务。

学科之间互有交错，蔡元培主张沟通文理两科，使之相互渗透。1920年10月国文学会开会，邀请他去演讲。他就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国文的性质，国文和外国文、各门科学的关系发表见解。他反对中学实行文理分科，也不同意中学采用选科制，意在打好全面基础，加宽学生知识面。他主张学习国文应与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紧密联系起来。“可见研究外国语，是很益于国文的。治国文的人，不能不研究文字源流。”^⑨他说，学习国文的人，不能不研究文法。马建忠因学了法文和拉丁文，把外语语法应用在国文上，写成《马氏文通》，所以学国文的人不学外国



蔡元培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务年会



绍兴蔡元培故居大门

文，恐怕就永远没有文法书。譬如英国学者穆勒·约翰就曾说过：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文字、语言不能也。这都说明国文与外语有着密切的联系。国文与科学也有重要的关系，“照旧法学国文的人，若是单读几本《唐宋八大家文钞》，便止能作几篇空架子的文。要是多读了《史记》一类的书，《尔雅》释草、木、鸟、兽、虫、鱼等篇、《本草纲目》一类的博物书，便能作内容丰富的文了。何况新出的科学书和研究科学的方法，比古书丰富得多，岂不更有益于国文么？况科学的作用，不但可以扩充国文的内容，并且可以锻炼国文家的头脑。”^⑩他风趣而形象地说明国文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认为高等师范学校中的国文、外国语、科学等学科，既分工又合作。学科之间没有高下之分，作用各不相同，正如人体各器官如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能力不同，各有所长，却又血脉贯通，价值平等。各学科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若说会了国文，就可以菲薄外国文和科学，难道有了眼，就可以菲薄耳、鼻、舌么？”^⑪在蔡元培看来，国文科与其他学科相关交融，学好外语和科学等学

科，对学好国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国文教育中常见让学生死读硬背的现象。蔡元培提出改变这种状况，教员要深入了解“儿童心身发达之程序”，有针对地选择适当的方法，特别要反对“注入式”，采用新的教授法；学生应当改变被动依赖的思想，力求做到自动、自学、自助、自己研究，把自学能力的培养起来。1920年蔡元培出国考察，当年12月7日，应邀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作了题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讲演，阐述了自己的教育主张。他认为，教师教书，应当注意养成学生健全的人格，把教学当成注水入瓶，注满完事，就会窒息学生脑力的发展，不利于学生智力的开发，是十分有害的。为此，他认为应当处处使学生具备自动能力，这是根据当时欧美各国流行的“自动主义”理论提出的。具体说来，一是要吸引学生，让他们对所学感到趣味无穷，感到读书的兴味悠长。要达到这一要求，教学方法必须符合学生认知事物的规律，教学内容必须切合学生的身心特点和生活需要。二是加强自学指导，引导学生自己研究，教师不能唯我独尊，强加于人，帮助学生要适



故居大厅

得其时，恰到好处。三是抽出“公例”，掌握“公例”。书本不过起着举例、示范作用，学生要能举一反三，由此及彼，学以致用。四是根据学生各种不同的个性特点和智力水平，因材施教，活用教法。他说：“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就是要求尊重儿童个性，让其自由发展。他指出教员关键在于掌握火候，而不是一味灌输，全力倾倒。“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地，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竟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所以在学生方面，也应自觉，教我的先生，既不能很知道我，最知我的，便是我自己了。如此，则一切均须自助才好。”^⑫他希望学生发扬主动学习的精神，指出教员课堂讲课和学生听课虽然重要，但一个学生不能局限于学好课堂上的功课，不能只依靠教科书和教员，而应当“自动自习，随时注意自己发现求学的门径和学问兴趣，更为要紧。”^⑬他强调是，在教师的引导下，自动自助，受完普通教育之后，使体育、智育、德育、美育等“四育”达到“平均发展”。

蔡元培对语文教科书的编写也颇为关注。1933年

12月，他为《当代国文》题词，认为这套教科书“选择谨严，编列适当”，在语体文与文言文的衔接，内容与形式的均衡等方面颇费苦心，而且“指示文法，间附注释”，特别方便读者学习，是中学国文科最适宜的教科书。1934年8月，他为上海儿童书局的国语教科书题词，指出该书分编的北、中、南三部国语，都选择彰明较著的名词，并且将耳熟能详的歌谣穿插其间，“这对儿童的领会，必有极大的助力”。

蔡元培反对中小学生学习读经。早在1912年1月，他主持下的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提出废止小学读经。此后，有人主张自小学起，凡学生都应在十三经中选出一部或一部以上作为读本。针对这一说法，1935年5月，他在《教育杂志》发表《关于读经问题》一文。指出经书里面许多内容既不合于时代，又不易为人理解，用来教现代的儿童是不相宜的。经书中一些很好的格言可以给人教益，使人受用终身，因而那些主张读经的人认为要熟读它。不过，这些格言的教学，不一定要通过原文，可以用其他方式予以阐释说明。呆读经文，只会窒碍儿童的脑力，没有多大益处。小学生读经有害，中学生读整部的经

也是有害的。他认为，读经要看年龄，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要求，为中学生编写文言文读本，选读几篇经传的文章未尝不可。如果要小学生像中学生一样读经，既无益又有损，很不妥当。在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已将引用经书中的话语翻译出来，新时代仍然让小孩子读经书原文尤其没有必要。他一再强调“呆读经文，没有多大益处”^⑩。明确表明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也是对读经论者的一个有力回应。

蔡元培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摆脱封建桎梏，向革新之路迈开步伐的时代。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蔡元培以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勇于批判、迅猛行动，或制定方针议案，或演讲著文，除旧布新，进行教育改革，其中包括回答国文教育提出的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探求，为国文教育注入生机，引来活水，开辟新路径。他年轻时与国文结缘，从事过国文教育，曾编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也曾在南洋公学、爱国女学等初等、中等学校和当时的译学馆教过国文。这些经历虽时间短，但正是有了亲身的体验和

教学实践，使之产生了对旧式教育的深刻认识。他多次出国留学并考察教育，善于吸收当时日本、欧美的一些先进学说充实自己的主张，从而形成了系统的国文教育观。其观点精辟独到，新人耳目，在当时产生巨大的影响，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注释：

①③④⑨⑩⑪ 高平叔：《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6页、159页、153页、192页、193页、194页。

②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7页。

⑤⑥⑧⑭ 欧阳哲生：《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蔡元培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67-268页、267-268页、299页、559页。

⑦⑫⑬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195页、116-119页、132页。

（本文图片由新权提供）



故居一角



海上丝绸之路 的历史见证

■ 丁清华

摘要 本文通过对《丝路帆远——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七省联展》中的策展过程、内容、设计等多个方面的论述，从实物的角度，展开对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描述。

关键词 丝路帆远 海上丝绸之路 合作共赢

作者 丁清华，福建博物院副研究员（福州 350001）

《丝路帆远——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七省联展》是福建博物院主导的历时三年倾心打造的顶级文物大展，于2014年开始先后在国内各大博物馆展出。2014年4月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展出、8月山东省博物馆展出、10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展出、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展出；2015年2月珠海市博物馆展出、5月福州市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展出、5月厦门市博物馆展出、8月天

津市博物馆展出、11月泉州市艺术节展出、12月海南省博物馆展出；2016年4月新疆博物馆展出。与此同时，展览还先后赴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澳大利亚、英国、法国、西班牙、泰国、印度尼西亚、荷兰、比利时、希腊、巴西、智利等多个国家，及澳门等地区展出，深受业界内外的的好评。

2014年5月18日，经过严格的评选，《丝路帆

远——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七省联展》荣获第十一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精品展的荣誉称号。

2016年9月18日至9月27日,《丝路帆远——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图片展》在希腊的比雷埃夫斯考古博物馆、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市文化局、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心举办。

2017年3月10日至3月22日,《丝路帆远——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图片展》,分别在巴西圣保罗亚洲文化中心、智利圣地亚哥孔子学院拉丁美洲中心和阿根廷友城波萨达斯州立博物馆成功举办,又获广泛赞誉。

“丝路帆远”已然成为一张代表着合作共赢的名片,它犹如一艘承载着千年海丝文化的航船,为世界各地的人们送去中华文化友好的问候。

1877年,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此后,学术界又延伸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从而跨越时空地将全球各地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串联起来。2013年,我国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将为世界打造出连接欧亚、辐射40多个国家、30多亿人口,世界上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文化大走廊。

福建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依托悠久的历史背景,结合丰富的学术成果的积累,

福建博物院联合沿海7省51家博物馆,通过严格筛选与审慎研究,从全国数十万件文物中选择展品,打造出《丝路帆远——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七省联展》。其分四部分,按时间顺序依次介绍了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发展、繁荣的全过程,展品涵盖了瓷器、丝绸、陶器、金银器、香料、青铜器、古钱币、玻璃器、古代装饰品等门类。展览以珍贵的文物为载体,以物说史,将观众带入古代东南沿海先民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的艰辛历程,用具有代表性、艺术性的文物,集中向世人展示先人们在贸易、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的智慧和力量。比如,来自福建博物院的烟色梅花罗镶花边单衣,其出土于福州的南宋黄昇墓,从该墓葬发掘出一批刺绣技法完整的南宋刺绣品,这些单衣不仅展示古代中国丝绸业的发达以及古代繁复而奢华的刺绣技法信息,也表明在宋代,中国在栽桑、养蚕、缂丝、织绸各个方面的生产技术都得到全面的发展。

为了让观众通过展品领略展览的主题思想,展览突出展示与海洋相关特性的文物或者背景资料。在编写陈列文本时,福建博物院力求详尽,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邀请参展博物馆的专家先后6次对展览文本进行重要的讨论和修正。强调要抓住中国海洋文明中“计利当计天下利”的儒家济世情怀与理想精髓,以试图通过挖掘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价值为目的,以此展示人类的





创造文明，促成共同发展。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观展后表示，“本次展览是我国文博界的一项重要展览活动，也是我国文博界围绕中心、配合大局的一项具体举措。”

通观中国历史，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部分，航海事业得到充分发展的时代，正是中国最为强盛的时代，表明航海兴则国家兴。这方面的内容在展览中有鲜明体现。

对话和开放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海上丝绸之路是这种对话和开放的象征，《丝路帆远——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七省联展》用一个个精美的文物默默地展示这场讲信和睦的对话历史。一千多年前，来自印度或者马来西亚的刺桐遍植泉州，进而成为泉州的别称；歌曲《茉莉花》成为中国民歌代表，而相传茉莉花是随着阿拉伯人蒲庚寿进入泉州的云麓山庄。中国以“海纳百川”的情怀接纳一切异域的优秀文化。展览用一目了然的图表告诉世人：没

有海上丝绸之路，舌尖上的中国就无从谈起。50多种农作物从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其中玉米、花生、番薯在明清人口大发展时造福了中国人。300多件展品都在共同诉说一个主题：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史上，中国人与丝路沿线国家的人民在经营海上交通和东西方贸易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福建自古就是我国对外通商贸易的重要门户，西面高山险川将福建环抱，沿海的省份没有一个像福建这样依赖于海洋，这里的人唯有“耕海为田，讨海为生”。文献记载，汉代以降福建就承担起开展海外交通贸易的重任，“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迅海而至”。唐代，福建已呈现“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的繁荣贸易景象。至宋、元，泉州一跃成为“东方第一大港”。除了随处可见的物质文化遗产，南音、妈祖文化、宁德廊桥、侨批等一系列优秀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深深潜藏于八闽大地的脉络之





中。海丝印记不仅藏于故纸文献中，更活在城乡的每一寸肌理之中，镌刻在大街小巷、古建筑、碑刻之上。遍布全省的窑址、港口、碑刻、海神庙宇，都在诉说着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不可分解的情缘。

1300多年前，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因商贸而大交融，来自各国的使节、商人、留学生云集长安。不仅有大批遣唐使来到中国，也有从中国走出去的鉴真、义净等高僧到国外弘扬佛法。佛教通过海、陆两道传入我国，其中海路是佛教由印度半岛传入我国沿海的山东、江苏等省，进而传入中原，再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的重要途径。收藏于山东博物馆的“蝉冠菩萨像”，从宗教艺术的角度反映出当时海上丝路的繁荣。

700多年前，在元代，西方最伟大的旅行家之一马可·波罗跟随商队游历过中国许多城市，所著《马可·波

罗游记》详细描述了当时中国的文化、历史、艺术、风俗等，为西方人构建出东方世界的梦幻与繁华，促进了东西方彼此的认知与交流。

星移斗转，岁月沧桑，历史更迭。明初，福州港的风采再次回归，郑和七下西洋的舟师将福州闽安、长乐太平港等作为休整补给、招募水手、制造船舶的基地。在全球大航海时代全面展开之前，郑和的下西洋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实践推向了又一高峰。“丝路帆远”展览中所展示的“三宝大人”刀、天妃碑、宝船厂遗址、浣泥国王墓遗址等，都是海丝历史中的见证者。

《丝路帆远——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七省联展》以波澜壮阔的气势，回望中国跨越千年的古老海洋记忆，将海上丝绸之路这条承载着商贸、人文的文明之旅、





和平之路全景式地展现于世人眼前。在展览中，可以看到伊斯兰教的圣墓、基督教的踩石、印度教的碑刻、摩尼教的造像，以及佛教的砖塔、道教的宫观和谐并处。在中国古人制造的瓷器上，可以看到摩羯纹、海兽葡萄纹、鹦鹉纹、狮子和胡人造型等各种来自异域的形象。

这次展出的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利玛窦编绘的《坤舆万国全图》，系彩色摹绘本地图，全长3.8米，宽1.92米。标注有各大洲、大洋，使用了赤道、回归线、南北极等概念，将地球分为5个气候带，各大洋中还绘有不同类型的帆船及鲸、鲨等海生动物。这幅地图向人们直观展示了地球的原貌，改变了中国传统“天圆地方”的观念。该图在西方习惯基础上，将本初子午线向左移动了170度，使中国居世界之中，成为此后中国出版世界地图的最早范本。

这次展出的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清代广彩开光人物故事图（潘趣）大碗，高16厘米、口径42厘米、底径22厘米。碗内外口沿、腹部装饰开光人物故事图，色彩华美富丽，纹饰繁密。由于以外销为主，广彩瓷器在经济贸易的过程中承载了大量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内涵，也成为向我们展示当时西方社会生活面貌，以及中西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方面信息的载体之一。

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海上丝绸之路不仅将古代世界各地人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也将当下世界经济、文化联系在一起。“丝路帆远”展凝结了海丝沿线各省市的文物精品，也凝结了各地文博人的智慧结晶，展示出“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古“丝绸之路”的精神内涵。



“四书译注”的若干特色

■ 骆承烈

沈阳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刘兆伟先生撰写的“四书”研究著作，包括《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书的译注与评论，分别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后，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统一编校，或增补或删除，体例统一，思想体系统一，形成了一套完整新颖的“四书译注”，于2016年2月全部出齐。面世后，一再加印。此套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资深编审刘立德先生、胡兰江女士与精益求精的冯卫斌先生共同审校编订。真是做到了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对全书思想体系的把握，直到一个字一个词的源头的追查、核对，对书中每个新观点的反复推敲，都慎之又慎，凸显了高度而谨慎的学术精神和责任意识。尤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理念与措施的落实，刘立德先生下了大量的工夫。正因为此，刘兆伟教授的“四书译注”才得到社会的欢迎，学者的肯定。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郭齐家教授为此套四本书分别写了序言，对其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作了充分肯定。如在《论语译注》序中，郭教授说：“刘兆伟教授历时数载，苦学苦修，广纳古圣先贤终身求道之精神，以鼓进攻治《论语》之勇气，译注了《论语》一书。这本书以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本的《论语注疏》为底本，参以朱熹的《论语集注》，以定分章断句。全书采纳了何晏《论语集注》保留下来的孔安国、马融、郑玄、包咸、王肃、陈

群、周生烈、何晏等古注，着力参考了皇侃《论语集解义疏》、朱熹的《四书集注》，还参改了王夫之《船山遗书·论语卷》、刘宝楠《论语正义》、康有为《论语注》、杨树达《论语疏证》、钱穆《论语新解》、杨伯峻《论语译注》以及南怀瑾《论语别裁》等。作者在此基础上综览总纳，融会贯通，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及体悟心得。所有这些，自然有助于读者对《论语》原汁原味的理解与把握，进而有利于读者对孔子思想与儒家学说的深远意义作进一步的深入挖掘和探讨。这就是刘兆伟教授为重塑孔子形象和重估儒家学说而作的可贵努力。”在《大学译注》序中郭教授说：“刘兆伟教授负责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四书的现代教育价值’研究工作终于全部完成了。刘兆伟教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潜心学问，历时十余载，他的‘四书译注’本弥足珍贵，深入浅出。透过这四本书，读者可领悟‘四书’的人生智慧、理想境界、核心理念、文化精神、生态伦理、思维模式、管理方略、教育价值、学术思想的恒久魅力。”在《中庸译注》序、《孟子译注》序中，郭教授对两书的价值与意义也做了满怀热情的宣达。

刘兆伟教授传统化学养深厚，青年时代就学于伍心镇先生门下，伍先生乃硕学鸿儒，饱学儒道佛之先达，对刘兆伟教授多有导诲，为其奠定了经史子集的研究基础。在《先秦文学》和《中国教育史》的教学过程中，



刘兆伟教授指导学生研究传统文化



刘兆伟教授看望前辈学人

逐渐积累了研究资料，且尝试做些研究。三十岁以后的十年间，对《楚辞》下了一番工夫，发表了十九篇文章，于1986年结集出版，观点多有独到之处，名其书曰：《屈原异说》。于研究《楚辞》过程中，他深切体悟到儒家学说之永恒。1982年始，陆续发表《治民之纲在治官，治官之要在恩威》《论董仲舒以教化治国之方略》《论儒家政教思想的渊源与精髓》《论儒家政教思想为历代封建王朝所必需》《〈尚书·大诰、康诰、酒诰〉是周公治国、施教之三部大策》《〈尚书·召诰〉实为周公教训召公之训词》《以乐施教论》《先秦教民“愚朴”思想辩》《孟子“倡井田”与商鞅“废井田”均为因地制宜的土地制度改革说》《孔子“忠恕”之道与世界和平》《孔子与苏格拉底教育思想比较》《孔子“正名”思想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孔子求索的是天下和平》《论儒家思想与和谐社会》等研究儒家思想的文章二十余篇。1992年，出版《儒家教育施政考》。1994年，出版《中华传统文化大略》。1996年，出版《儒释道与东北教育史》。1998年，出版《中华传统道德论稿》。随后，申报了“四书”研究的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国家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并获得批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四书译注”，即《论语译注》《大学译注》《中庸译注》《孟子译注》，就是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及国家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研究成果。

“四书译注”套书，力图集两汉魏晋唐宋逮及明清研究成果之大成，将上下两千年的主要观点梳理贯通，并钩玄提要，阐发了作者的见解。本套书对于读者贯通“四书”之学脉，了解其主要意旨大有裨益。

刘兆伟教授的“四书译注”具有显而易见的鲜明特点。

一、突破了传统孔子研究的思维模式，提出了新的观点和看法。比如：《论语译注》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

乎”（《论语·学而》）中的“学而时习之”理解为“教而时习之”。意为：一边作教育工作，一边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学习，益于更好地教，教的过程中不断有所感悟，有利于深入地学习，这其中含有“教学相长”之意。这样理解确有前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之处。

二、力求恢复孔子教育思想的本来面目。如《论语·子路》中“樊迟请学稼”一段：“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不敢不服。上好信，则民不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译注》认为，孔子的教育本来就不是培养劳动者的，更不是培养种粮或种菜的人。孔子不懂种粮、种菜。樊迟问他，他答以“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等。这是孔子实事求是的内心表达，并且道出了“术业有专攻”的事实。

三、体现儒家思想的原则性与灵活性。比如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论语·卫灵公》）《论语译注》认为，孔子所指的花言巧语必然损害道德，具有一定的混淆视听的迷惑性。日常生活中此类事情很多，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而巧言之徒多不是凶暴的坏人，只是好耍伎俩的小人。对此类人识别是必要的，但无需去斗争。

四、体现儒家思想的辩证性。比如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论语译注》认为，此“谲”的一义乃诈、诡、骗；二义乃权谋。权谋适度，用来自卫、防敌是积极的。此“正”之一义乃端正、正派、规范；二义乃为板滞、不灵活，缺少权变。孔子总是辩证地评价一个人，不会完全否定晋文公或完全肯定齐桓公，而是说二人各有长处，各有短处。

五、注重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有些体现了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诸如：《孟子·滕文公下》第9章的“译文”与“诠评”，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深入地挖掘中华文化的积极进取精神与担当精神。《诠评》指出：孟子认为孔子的治国兴邦的伟大思想，没有圣王去推行，所以天下邪说横行。杨朱大谈“为我”，利天下之事不去作为；墨子主张“兼爱”，不分亲疏、君臣，都是导致天下孔道不昌、伦常毁亡，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根源。所以，必须辩明谁是谁非，使孔子思想得以重放光



北京师范大学郭齐家教授为刘兆伟教授的著作写序

芒，以利天下人有所遵循，进而恢复纲常伦理，形成良风美俗，几近均、和、安。这个历史阶段的重任就自然地落在孟子身上，“舍我其谁也”，不能，也不应退缩。所以，孟子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去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孟子说：“这哪是我孟轲好辩论争强呢？”而是不能不这样做，并且必须这样去做，才能完成历史使命。此章极鲜明而充分地反映了孟子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孟子·离娄下》第11章“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诠评》认为：有影响的大人物不必在小非上讲究“信、果”，而要在大多数人利益上做到仁义。大人要抓大事，而人民不要在小事上去苛求他们。要看大局，要看他们对全体人民大利益的态度与实际作为。

六、在历代解析与评论基础上，深入揭示圣人的真思想。如《孟子·滕文公下》第10章《诠评》：此章以陈

仲子为例，论述了任何高洁之士、任何高尚思想，都不应却他人于千里之外，都不应脱离群众。

七、思想的统一性、系统性、传承性。在评论《论语》部分章节时，刘兆伟教授强调了其思想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在评论《孟子》时与之相观互论。如《孟子·离娄上》第17章的《诠评》：孟子思想理论宏放大观，而又具体入微。既讲原则，又反对僵化教条。此章非常具体生动地论述了儒家思想理论的高度辩证性。

八、引用资料厚重精到，尤其《大学》《中庸》二书所参考的《四库全书珍本初编》及有关诸书，如康有为著作、张居正著作、张岱著作、梁漱溟及其老师的著作。充分尊重各家的精到观点学识，且将其分别注明，让后人知晓他们的见解，避免了只循一家之言，孤陋寡闻的缺憾。

九、“四书译注”结构简洁，文字清晰，易于阅读，多有独到见解，且又平实质朴。

十、“四书译注”具有学术上的正本清源、拨云驱雾之功效，体现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思想本真的价值与意义。使读者读后，明白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弘扬什么？传承什么？有利于积聚社会正能量。

以上种种说明了刘兆伟教授“四书译注”套书研究过程之艰辛，所下工夫之巨大，研究成果之坚实，这也是其受到社会欢迎、学者赞扬的重要原因。我乐于向海内外学界介绍刘兆伟教授的“四书译注”，期盼通过广泛传播，以期发挥更大的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效能。

（本文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图片由刘兆伟教授提供）



刘兆伟教授参加第三届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福建恒达教育装备工程有限公司是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会员单位；福建省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福建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副会长单位。

恒达公司以教育装备为主营方向，致力于现代教育装备的研发生产和集成推广，不懈追求优异的产品品质与技术创新，服务教育发展。产品包括：地理园、生物园、地理专用教室、历史专用教室、动物标本、标本馆、模拟生态馆、自然博物馆及教学仪器设备的生产、集成销售。

恒达公司来源于教育，也必将服务于教育，“客户满意”是恒达公司一如既往的服务宗旨。恒达公司将以优质的产品、一流的服务为现代教育做出贡献。







PRODUCTS
智能投影一体机

简便. 智能. 环保

光学触控科技 教育新锐器

The new sharp optical touch technology education

博采星教育科技简介

唯智汇 VEH

福建博采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教育装备协会会员单位、福建省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博采星教育科技是一家从事多媒体教室、多媒体会议室、录播系统研发制造及服务为一体的科技型企业。博采星教育科技致力于用光改变中国教学（会议）环境，以简单便捷、智能环保的研发理念打造唯智汇绿色、环保的智慧课堂和会议空间，是智慧校园、智能会议的最佳选择。

主要产品：唯智汇多媒体教学（会议）系统—智能投影机、多功能演讲台、智能语音、智能录播、实物展台等。

企业使命：助力中国教育。



PRODUCTS
智能投影一体机

全国统一
服务热线

4009-975-979

公司网址：www.vezihui.com

公司地址：福建泉州台商投资区南山路精品园 邮编：362100



唯智汇公众号



灵渠位于广西兴安县境内，主体包括铤堤、南北渠、秦堤、陡等，于公元前214年凿成通航。其通三江、贯五岭，有效沟通了南北水路，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

兴安灵渠 新权 摄

海峡教育研究 2017年第2期（总第17期） 2017年6月28日出版

主 管：福建省教育厅
 主 办：福建省教育学会
 协 办：福建省教育装备行业协会
 台湾省教育会 台湾中华中等教育学会
 福建博物院 武夷学院
 厦门大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编委会主任：王豫生
 编 委：王豫生 孙捷敏 吴志跃
 张品端 杨竣宇 张平忠
 徐小敏
 主 编：张平忠

编辑出版：《海峡教育研究》编辑部
 福州市梦山路福建教育学院内

邮 编：350003
 电 话：0591-83792590
 邮 箱：fjyxxh@126.com
 印 刷：福建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订 阅：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内总发行：福建省邮政公司
 刊 号：CN-35(Q)第0120号
 邮 发 代 号：34-36
 定 价：35.00元